◎世界史精览◎

拉美的新世纪

——玻利瓦尔与圣马丁的功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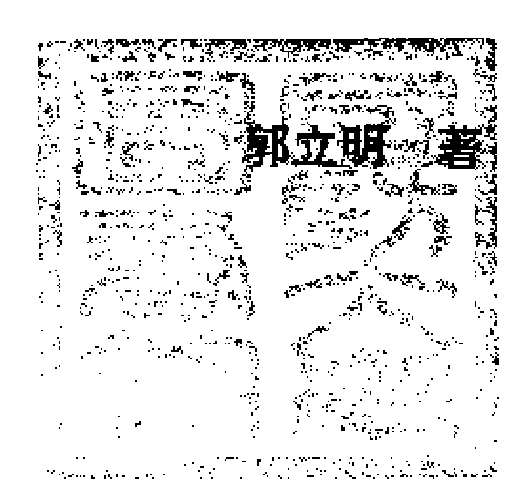
长春出版社



世界史精览

拉美的新世纪

——玻利瓦尔与圣马丁的功勋



郭立明 著

长春出版社

(吉)新登字 10 号

世界史精览
拉美的新世纪
郭立明 著

责任编辑：张耀民　　封面设计：王国擎

长春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长春市建设街43号)　　建平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张:11.125　插页:4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6 000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604－220－2/K・16

定价:12.50 元　(全 32 册)358.00 元

《世界史精览》编委会

总策划 杨德宏　王占通

主　编 申晨星

副主编 王恒伟　夏保成　张耀民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占通　王亚玲　王国瑞　王洪玉
王恒伟　冯　超　申卫星　申晨星
刘　泓　阴　玺　巩英春　李松梅
李　健　李焕栋　李曦瞳　杜宇峰
陈文海　宋洪章　杨德宏　张耀民
周　杰　郑淑芬　夏保成　鄂淑燕
颜海英

序

人，无不憧憬明天，也频频回顾昨天。从总结昨天得到启发，汲取教益，变得聪明。个人如此，群体亦如此。作为类，人类也是如此。这个昨天，就是历史，是不可追回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家去研究它，表述它，写出来的，人们也称之为历史。

历史家的历史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客观”的历史。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试想，你逛过一个商店归来能把万种商品千人顾客百般陈列一一状写得“客观”无疑吗！何况人类历史的复杂性那是商店的琳琅满目无法比拟的。而且，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这一点，个中道理不言自明。每个历史家都从不同的时代视野、不同的方位视角去审视客观的历史，写出不雷同的历史，得出不同的见解：或灼见、或偏见，或深邃，或表象。

今天不是历史，而是现状，一旦到了明天，今天的现状就成了昨天，成了历史。于是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时代、文化大革命，海湾战争等等便相继进人了历史家的视野，历史不断增添新的、需要从头研究的领域。今

天的历史家写出一部最成功的史著，明天的历史家也会感到不足。因为总会有新资料的发现，新研究手段的出现，更重要的是认识的前进。比如，一个阔别几十年的游子重新回到家乡，村边小溪所引发的思绪，必然与他儿时同小朋友戏水时的感受迥异。那么，一代代历史家之间对历史长河的理解又怎能一致。难道还会有哪位现代历史家以“宗周”“据鲁”的原则去写春秋么！不唯如此，在历史家的历史中还有历史的伪造，尽管历史伪造者在史学史上极少（不能把或由于疏忽，或由于资料不足研究手段落后造成的失误列人此类）。且说那部曾被推崇备至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罢，如不论其历史观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多少共同点，仅就史实而言，这部大作中充满了大量伪造，并开了一代谤史的先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一批批列宁时代的老战士被污为“帝国主义走狗”、“奸细”、“间谍”。谎言即使由钢铸就那也是脆弱的，如今那些污陷阴谋已真相大白。历史家当然要重写这段历史。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因素，从孔丘、司马迁、希罗多德到今天，古老的历史学还在开拓前进。人类只要拥有明天，就不会忘怀昨天，历史之树常青。

历史学的功能，因写史人的眼界不同而不同。司马光把他主编的那部名著题名《资治通鉴》，目的了然：“资治”，为君王提供统治术，达到一家天下长治久安。封建社会的“正史”大抵都奉行这一最高宗旨。随着近代

民主政治的推进，以维护专制统治的统治术为中心内容的封建史学逐渐被抛弃。本世纪 20 年代末兴起于法国而后波及全世界的新史学学派一反传统，冷漠政治史，热心"长时段"的、普通人参与的历史问题，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态史备受青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极为重视。他们稔熟古代史，他们对古代农村公社、国家起源、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研究巩固了哲学唯物史观，确证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确证现存制度的历史暂时性。现实的阶级斗争史更受到他们的重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篇幅不大，但却不能不列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它成书于 1851 年底至 1852 年初，却预报了下一次法国革命即近 20 年后的巴黎公社革命的主题：打碎官僚国家机器，代之以社会公仆的政府。这个主题至今光辉不减。

垂范史坛的大家大手笔毕竟是少数。以一般的教化功能为主的史著则是大量的。这其中有的明确限定主题，如爱国主义，国际主义，英雄主义，等等；有的则是一般历史知识。我国向有重视历史通俗读物的传统。《三字经》从"自羲农，至黄帝"开始，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历史。宋元时人陈栎的《历代蒙求》、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以历史普及读物常传不衰。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国家走向改革开放，普及现代科技常识，加强外语学习，都十分重要，今人的知识结构也不应照搬古人。但是具备一般历史常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近年来中国历史普及读物编写和出版都有可喜成绩，有的工程浩大，有的富有新意。世界史方面的同类读物相比之下略嫌不足。长春出版社的同志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倡议、组织编写这套丛书。倡议得到一批同仁响应，有学有造诣的师友鼎力合作，有在读学位的青年朋友热情参与。历时近二年，丛书即将付锌，如果它能在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方面能起一定作用，将是几十同道的极大欣慰。

编写这样一套通俗历史读物，在我们是初尝，没有设计成规，只提出一般原则：科学性与可读性。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具体处理，则由每册作者自夺，文责自负。至于风格，更没有追求划一。倘如常言所道文如其人，那末，30 余人本就各异，何必一律严肃、一律微笑呢。从几千年的世界历史长河中，选出 30 个左右题目，当然只是举起算算大者。但也有些重要题目因有关通俗著述较多，本套丛书就没有再重写，好在读者也不是把它作为教材来谈。

全体同事虽付出很多劳动，但纰漏在所难免，敬希方家和读者指正。

申晨星

一九九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章　新大陆梦寻

怪胎：两个世界交汇的“早产儿”

当“圣玛丽亚”号、“平塔号”和“尼尼亚”号帆船载着哥伦布和他的水手们到达汪洋中的那个小岛时，他们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次航行将改变此后的整个人类历史。

人们往往容易忘记，在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人们自建立起第一个定居点起用175年的时间争得独立的时候，美洲其它地区的人们也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为了自由曾苦苦等待了300多年。

哥伦布带回了财富及由此而来的荣耀。黄金的诱惑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探险殖民狂

潮。西班牙近水楼台。到1521年，埃尔南多·科尔特斯已征服了整个墨西哥；没过20年，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也占领了秘鲁，并派军直抵今天的智利和厄瓜多尔地区。其它一些探险队则沿南美东海岸向南运动，在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建立了殖民地。

自此，北起墨西哥格兰德河南到美洲最南端，广阔的美洲大陆上飘扬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王国的旗帜。这两只体小心大的"章鱼"野心勃勃地伸展开巨大的触须，其势似要吞下整个新大陆。但是，它们能消化得了吗？

我们的故事，就是在这片广阔的天空下展开的。

美洲被发现时，这里已具有复杂的人种和文化。

自今墨西哥向南到智利北部的广大地区，曾孕育了美洲最发达的文明。它文化最先进，人口最多。这片辽阔的土地又包括了一北一南两重要地区。北部，从墨西哥到尼加拉瓜；南部，从厄瓜多尔到玻利维亚及阿根廷北部。在北方，阿兹特克人的文化虽经西班牙征服者百般摧磨践踏，但其劫后余生者到今仍令现代文

明为之折服倾倒。早在公元前一千年，玛雅人就在这里君临天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他们有比较完善的文字系统、水平很高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玛雅人之后，这块土地几易其主，最后落在阿兹特克人手中。1325年，他们建立了特诺奇蒂特兰城，奠定了今天墨西哥人雄伟壮观的首都的第一块基石。

南方广大的印加帝国，创造出了南美洲最重要的印加文化，它以其社会制度方面的先进性雄踞玛雅人和阿兹特克人之上。不幸的是，它同样也没能逃脱西班牙征服者的铁蹄和魔掌。

连结以墨西哥和秘鲁为中心的这两个最发达地区的是中等发展程度的地区。当地人口数量可观，有较发达的农业，手工艺品令人叹为观止。但其文明与艺术细腻有余而雄浑不足，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宏伟的建筑。

剩下的地区几乎完全是蛮荒之地。发展程度最低。文化形式简单，政治社会结构最原始，人口也最稀少。其中有些是极其分散的游牧民族，语言、宗教、风俗习惯迥然各异。部落之战无休无止，战乱频仍、鲜血横流，动荡不止。

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纵横驰骋的历史舞台，即今天的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共和国，包括了美洲这三种类型的地区。

15、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正值国力最强的鼎盛时期，海上力量亦十分强大，拉美殖民地主要由它们两家瓜分。然而，它们自身固有的弱点即便在其如日中天的时候也预示了日后无可挽回的衰落。

美洲大陆，辽阔寂寥，景象万千。当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刚刚踏上这块神秘莫测的土地时，他们委实不知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这并非一块处女地，它已有自己的主人——印第安人。然而，后来白人征服的事实和印第安人的悲剧再次证明了这个强盗世界的强盗逻辑——强权即是真理。弱肉强食，这是一条铁的生存法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概莫能脱。真正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不一定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伊比利亚王国的强大——即便在当时它们也远远够不上是最先进的——而是印第安人的驯顺、孱弱和不堪一击。曾经那么辉煌的一种文明倏忽间灰飞烟灭，只

留下几截断壁残垣述说着昔日的辉煌和悲伤。辉煌确曾是辉煌过的，只可惜时光不可倒流。这辉煌带给今人的更多的似乎是无名的惆怅。

但更有趣的是，同为殖民地，南北美洲的境况却有天壤之别。对比之下，可以发现那么多耐人寻味之处。

今天的美国，名副其实的移民之国，各民族各种族的“大杂烩”。当初的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整个社会全然由来自欧洲——主要是北欧和西欧的移民组成，盎格鲁——萨克森人成为社会的主体，其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响当当的样板。这样一个社会，彻底排斥了原有印第安土著社会的一切影响，在一张白纸之上建构了完全由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而来的近代美利坚社会制度。没有封建因素，绝少等级观念，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嫡传。

而这个大陆的那一半又如何呢？

就一个民族而言，其文化的衰落是种族灭绝的开始。封闭内向的古老文明遇到西方开放流动极富张力的近代文明时大都难逃此劫。南美土著印第安人所吟唱的正是这一样一曲悲歌。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冒险家和开拓者最初到达美洲大陆时，当地的情况异常复杂，千差万别，使人无所措手足。有些地方文化发达，人烟也比校稠密，如墨西哥和秘鲁高原地区。而大部分地方则是旷野千里，荒无人烟。在那些印第安人聚居的地区，他们已有了很牢固的社会组织。征服者到来了，可他们如何消化这些战利品？

西班牙和葡萄牙，本身就是两个封建色彩极浓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对他们来说，最简单，也是最自然的莫过于把自己最熟悉的国内制度远涉重洋地移植到殖民地去。

当王权的触角还没有伸展到拉美大地时，那些最先到达的白人——冒险家和探险队，征服队的首领自然而然地取代新大陆的旧主人而成为它的新主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主人”，因为这片天地是他们打下来的。国王也奈何不得他们，只好与他们订立协议，使他们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拥有了行政、军事、司法大权，可以分配土地、役使印第安人、任命下级行政官员，发布政令。他们自恃功高盖主，对国王也是不理不睬，甚而征服的成果也子承父业、世

代相传。“天高皇帝远”，他们俨然已是这里至高无上的主宰了。可是，这样的“诸侯”是不会见容于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的。

1516年卡洛斯一世登上西班牙王位，从此开始了哈布斯堡王朝对西班牙及其美洲殖民地近200年的统治。

卡洛斯一世即位后的头一把火就烧到了这些“土皇帝”身上。他削弱他们的权力，建立起直接隶属于他本人，由“王家最高西印度事务委员会”负责领导的殖民地地方政府机构。主要政府官员由国王从西班牙派遣。但是，这些新政策虽然剥夺了征服者及其后代和部属的特权、维护了宗主国的利益，却引起了征服者和早期殖民者及其后人的强烈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又演变成了日后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美洲殖民的是西班牙人而非西班牙；因此土生白人——西班牙人的后代理应成为美洲的主人。仇恨和离异的第一粒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除旧布新，卡洛斯一世着手建立自己的殖民统治机构，在美洲殖民地建立了新西班牙和秘鲁两个总督区，分设首府于墨西哥城和利

马。1535年，卡洛斯斯一世任命了新西班牙总督，管辖今墨西哥、中美洲和西印度群岛；1542年，任命秘鲁总督，管辖除委内瑞拉沿海地区和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洲。1560年，又根据需要向危地马拉城派了一名都督，建立了危地马拉都督区，专门管辖中美洲。总督和都督代表国王在殖民地执政，权力极大，是殖民地的最高统治者。

总督区以下又划分为若干检审庭辖区，再下又有若干行省，最后是最低一级的市镇辖区。

自18世纪开始，波旁王朝开始统治西班牙。历代国王，特别是卡洛斯三世(1759～1788年在位)为强化对美洲殖民地的直接控制，对殖民统治机构作了重大变革。美洲殖民地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重大调整，设置了新总督区、都督区，并开始实行郡县制。

1739年新格拉那达总督区正式建立，首府设在波哥大，管辖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等地区。1776年，设拉普拉塔总督区，首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管辖今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地区。此后

又增设了三个都督区：1777年设委内瑞拉都督区，管辖今委内瑞拉地区；同年设古巴都督区，管辖今古巴、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北美的佛罗里达和路易斯安那地区；1778年设智利都督区，管辖今智利地区。都督由西班牙国王直接委派，拥有与总督相似的权力。

这种移植嫁接的结果如何呢？殖民地总督专横跋扈、横征暴敛、刮尽地皮。当时总督的职位是权力与财富的化身，当然也就成为西班牙贵族们孜孜以求的令人垂涎欲滴的肥缺。而若有哪个总督没在任上搜刮聚敛而腰缠万贯，那么他的名词就会成为低能的代名词，他自己也会被上流社会视为蠢货笨蛋，成为沙龙里的笑料。

窥一斑可见全豹，美洲殖民地成为封建神坛前的又一个牺牲品。

金钱与权力：永恒的“魔杖”

新大陆最初的灵光，是金子的光辉对无数阴暗灵魂的诱惑。殖民开拓者历经磨难，于惊涛骇浪的大西洋上颠簸数月，将身家性命系于

一叶孤帆之上，其实也正是因为黄金可以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可以使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追求财富，即是追求新的生活，这足以使坚强的人抛却一切恐惧、忍受一切艰辛。因而当黄金之梦破灭、当致富希望化为泡影时，那种绝望与失意所产生的愤怒的风暴是足以吞没一切的。不幸的是西班牙航船在美洲正是这样沉覆的。

从16世纪开始在西属美洲殖民地发现了大量银矿，接着在智利中部和新格拉纳达等地又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金矿。美洲的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

现代的拉美国家，大都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国计民生建立在以单一的原料出品为基础的畸形经济上。这早已成为拉美人民的切肤之痛。追根溯源，祸根就是美洲开发之初由殖民者们种下的。这个时期，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简直就成了宗主国的一头大奶牛。

随着采矿业的兴起，一个个矿业中心出现了。人口增加，为这些采矿者服务的农牧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殖民地的农作物中，诸如小麦、玉米等当时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粮食作物的

生产是有限的，宗主国要求其仅仅能够满足殖民地的需要而不能同本国产品竞争；而甘蔗、棉花、烟草、可可等经济作物则因可以加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进行贸易而得到大力发展。

18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工业原料和经济作物等有了更大发展，甘蔗、可可、咖啡、棉花、烟草、小麦、葡萄等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激增。这种状况，流毒甚为深远。许多拉美国家沦为单一的原料出口国，进而又成为工业品进口国。这些国家被宗主国家压得极不合理的低价与工业制成品的高价这把“大剪刀”几乎切断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命脉。殖民主义的恶果至今还要由这些国家的人民来吞咽咀嚼。更残酷的是，几乎所有的经历过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的国家都共有这种厄运。

自18世纪中叶开始，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振兴殖民地的矿业生产。90年代初，新西班牙和秘鲁分别创办了“矿业学校”培养当地的技术人才。这些殖民地新人们不仅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技术，更从中吸收、接受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

先进思想。日后，他们将成为争取本大陆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中的急先锋、马前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恐怕当初西班牙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正亲手培育着自己的“掘墓人”吧。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工业和商业在南美殖民地是西班牙殖民者要着意控制的。殖民地作为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根本不能发展自己的工业，而贸易又被西班牙所垄断。当时西班牙对殖民地实行重商主义政策，控制其对外贸易，对其实行重利盘剥。但是，随着殖民地愈益成熟和西班牙国力日渐衰微，西属美洲殖民地和英法等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其它美洲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日增，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美洲殖民地开始走向世界。在这个过程中，殖民地逐渐形成了一个活跃的商人阶层，在以后的独立运动中成为一支重要力量。

经济利益，是宗主国在殖民地要攫取的主要目标，而对政治权力它也同样毫不放松。但宗主国的一整套统治政策恰似一把双刃剑，挥向殖民地的同时也砍伤了自己。宗主国在殖民地实行新行政体制的目的在于加强对殖民地的

控制，整顿殖民地的财政、税收秩序，以保证王室的收入。但其结果却是激化了殖民地人民与宗主国的矛盾。大批殖民官吏从西班牙涌入美洲殖民地，取消了土生白人担任公职的权利，剥夺了他们原先在地方上所掌握的一点点政治权力。土生白人原有的对宗主国的不满更强烈了。夺取政治权力，是土生白人逐渐开展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斗争的重要原因。

种族融合，“新人”

西属美洲殖民地地广人稀。早期殖民开拓者很少有携妻抱子举家前往美洲的，因为美洲之旅艰险万千、前途未卜，他们到达之后，当安身立命已不成为问题时，人类自身繁衍的需要就很迫切了。

殖民地早期社会的人口构成就相当复杂多变。但大体上还能够做一个简单的划分：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黄种人；从西班牙国内来的白人征服者和殖民者；最后是从非洲贩运来的黑奴。要知道这样一种划分是非常粗略的，更大程度上只是为叙述方便。因为混血现象不是

在某个时刻之后才突然变得显著起来的。比如来美洲的西班牙人本身血统的纯度就很值得怀疑，因为此前的几百年中，伊比利亚半岛曾几易其主，阿拉伯人、摩尔人等异族统治者虽已被赶走，但半岛上人种混杂的现象却早就开始了。

因此，种族隔绝的藩篱从开始就没有树立起来。虽然也有过种种禁止异族通婚的禁令，但从未被认真执行过。

印第安人是美洲大陆的主人。当第一批西班牙殖民者只身来到美洲时，他们只能并且也愿意与印第安妇女通婚。这样便产生了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特有的一个混血人种——梅斯蒂索人。其后，奴隶贸易勃兴于美洲大陆，非洲黑人开始来到美洲。西班牙人和黑人通婚的后代即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以及黑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桑博人相继产生。而随着殖民进程的加剧，大批西班牙人继早期殖民开拓者之后来到美洲，其中已有很多妇女了。因此，西班牙白人在美洲的自己的后代——一种新的白人，即克里奥约人出现了。他们生于美洲、长于美洲，与这块大陆有着微妙、特殊的心理情结，故被

十分形象地称为土生白人。

殖民初期，种族融合的结果明显地从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桑博人和土生白人身上体现出来。然而时间不会凝固，一切都如水之归海，生息不止。这个种族融合的过程始终是处在动态的稳定之中的。这些新的种族集团在体态、生理、心态等方面都有别于西班牙人，是新型的"美洲人"。

人种的融合只是为"美洲人"的产生提供了体质上的基础；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是文化的融合。这两种融合互为表里、和谐统一。

美洲人：他们是谁？

印第安人创造了神秘莫测充满野性的原始文明，西班牙殖民者带来了文艺复兴以后欧洲新的文明以及此前更久远的文化；非洲人又带来了他们的黑色文明。三种文化在新的社会、地理环境中汇合，终于生成了一种新型的美洲文化。

创造了这种文明的人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白人，印第安人和黑人了，他们都意识到自己身

上的美洲色彩。他们对这片土地已经有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美洲对他们来说已经意味着“故乡”和“根”了。

与这些美洲人不同的是那些直接来自西班牙国内的殖民官吏们。他们人数不多，但惹起的怨恨极大。他们对美洲无一丝一毫的贡献，但却在从它那肥沃的土地中掠夺无尽的宝藏和财富，贪得无厌，永不满足。他们占据了殖民地社会的金字塔尖，而殖民地真正的主人却无法得到应得的地位和财富。土生白人在美洲人当中地位最高，但同样要受西班牙殖民官吏的压迫。他们虽然也能在政府和军队中任职、服役，但职位低、任期短，根本无法与西班牙人抗衡。整个殖民地时期，西班牙美洲地区曾有过 [illegible] 名总督和 588 名都督，而其中只有 18 个土生白人，总督 4 人，都督 14 人。

虽然同为美洲人，但这个群体也并非温情脉脉利益永远一致。土生白人是美洲人当中的上层，拥有财富和权力。混血人、黑人和印第安人除了要忍受西班牙国内来的殖民官吏的欺压以外，还要对土生白人的特殊地位再加忍耐。土生白人对待这些自己的“同胞”的感情和

态度也是十分微妙和复杂的。当面对来自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者时，他们可以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土生白人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美洲兄弟呼号呐喊；但当外部压力稍稍缓合，他们中间的矛盾就变得很明显。土生白人不愿看到更不能容忍自己的社会地位受到来自下层的“兄弟”们的威胁。他们要做这些“兄弟”的救世主。但土生白人却无法容忍这些人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因为这些人身上的一部分枷锁正是土生白人给戴上的。

第二章　从奴隶到将军

白人的天堂，奴隶的地狱

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历史的误会，拉美殖民地争取自由的第一次成功斗争所发生的地方也正是哥伦布当初第一次发现美洲的地方——海地岛。

海地岛在加勒比海中，是西班牙的第一块美洲殖民地。哥伦布给这个岛取名埃斯所尼奥拉，但当地土著印第安人称它为海地。当西班牙人跨向大陆之后就把这个弹丸小岛抛在了身后。法国人乘机而入，逐渐蚕食了西班牙的领地。最后在1697年，西班牙被迫同法国签订条约，将该岛西部三分之一的土地割让给法国。

法国人称海地岛为圣多明各岛，故将这块割让地称为法属圣多明各。而东部仍属西班牙的地区则称西属圣多明各。1790年，法属圣多明各的奴隶揭竿而起举起了争自由独立的义旗，14年他们终于胜利，建立了自己的新国家，改称海地共和国；而西属圣多明各则成为今天的多米尼加共和国。

今日的海地是一个动荡、贫穷的小国，但当时它却是新大陆最富饶的国家之一。那时它供应着欧洲需要量一半的棉花、咖啡和蔗糖。它是法国最丰饶的殖民地，它的两个主要城市海地角和首都太子港在当时甚至胜过美国的纽约，繁华、喧闹，商店林立，游人熙熙攘攘。

圣多明各岛虽不大，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今天它和古巴、波多黎各一起自西北向东南伸展，宛若一副铰链，紧紧锁住了巴拿马运河经加勒比海通往大西洋的交通要道。可以说，谁控制住了这里，谁就扼住了这条“海上生命线”的咽喉。

海地岛地形中间高四周低，沿海为热带低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它成为热带经济作物，特别是甘蔗等的天堂。当时，这个岛的大

部分地区分布着许多以甘蔗为主要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欧洲白人征服者来到这里，他们带给土著印第安人的不仅有血腥，暴力和极端繁重的强迫劳动，更有很多致命的传染病，如麻疹、天花和性病等。因此岛上的印第安人几乎完全消失了。后来，随着罪恶的奴隶贸易的兴起，大批被掳掠来的黑奴涌入圣多明各取代了印第安人。全岛居民中大约有50万黑人和黑白混血种奴隶，另外还有7万自由人。这7万自由人中，一部分是土生白人地主，称为"大白人"，另一部分是黑白混血种地主，称为"小白人"，以及少数的自由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

也许在新大陆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其它殖民地，居民会有如此强烈的种族观念，存在着这样严重重的种族隔离。"大白人没能阻止小白人"由于继承肤色不同的父母的遗产而拥有土地。但是，根据法律，任何有黑人血统的人都不得担任公职。种族制度是如此严格，一个黑白混血种的奴隶在社会上的地位竟然高于自由黑人。

圣多明各虽远离欧洲大陆，但这并没有稍稍减弱它浓重的欧洲色彩。许多最富有的种植

园主宁愿住在法国，而把种植园交给管家管理。留在岛上的种植园主则过着象欧洲贵族那样骄奢的生活。他们的家俱、服装以至餐具都是从欧洲进口的。由于拥有奴隶的数量成为衡量土生白人地位的标准，所以在吃饭时，每个家庭成员或客人的背后都有一个穿制服的奴隶站立侍候。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奴隶的极端贫困、悲惨的生活。奴隶分成家奴和田奴两类。家奴一般是在岛上出生的黑人。他们的境遇要比田奴稍好，少挨些打，有时主人还会让他们受点教育，甚至偶尔作为对其某种特殊功劳的报偿，还可能赐其自由。大部分自由黑人就是原先当家奴的黑人。

田奴却决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他们的生活比种植园主的耕畜和良马还不如。他们每天被迫劳动16到18个小时，收获季节时间则更长。他们动辄遭鞭打，如果再严重些就会受到令人发指的酷刑的折磨，如用滚烫的糖水浇身，割耳、割舌或割鼻，以至活埋或活活烧死。奴隶们黎明时分在劈啪作响的皮鞭声中醒来，夜晚在受刑的同伴的惨叫和痛苦的呻吟中昏沉

睡去。长夜漫漫，暗无天日。他们的出生率很高，但死亡率更高。因此，需要源源不断地从非洲抓来新的奴隶，以补充当地日益减少的劳动力。

奴隶既然被视为奴隶主的财产，所以法律在规定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和随意使用权的同时，也要求奴隶主要保证奴隶的生存，负责其衣食住行等等。但这一规定往往并不被遵守。奴隶的吃穿都要自己去挣。种植粮食作物会影响种植园主更赚钱的蔗糖、棉花和咖啡等出口商品的生产。通常的做法是分给每家奴隶一小块贫瘠的土地，让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粮食。衣服也靠用剩余的粮食从附近的村庄换来。这种额外的劳动奴隶们只能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干。

法律也要求对一切奴隶进行天主教洗礼。一般都是在奴隶刚抵达时进行集体洗礼。还戴着枷锁的奴隶们在管家手中的皮鞭的威胁下，被迫跪在地上接受匆匆忙忙的洗礼，得到一个教名，烙上主人的标记。此后，很少有种植园主注意到向奴隶们宣讲天主教教义，因为他们怕讲授基督精神会鼓动奴隶们起来反抗，使他

们错误地认为有权得到人的待遇。相反，奴隶们反而常常被允许信奉统称为“布杜”的自己部落的宗教，只要这不影响劳动和主人的利益。

在海地岛北部靠近海地角的地方，有一个名为“布雷达”的种植园。它拥有一千多名奴隶，是岛上最大的种植园之一。种植园主是一个不在岛上的极富有的法国贵族，管家是位心地善良的土生白人，因此布雷达的奴隶得到比大多数种植园的奴隶较好的待遇。

1743年，布雷达种植园中一个奴隶家庭的男孩降生了，取名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根据奴隶的后代生而为奴的原则，杜桑理所当然地刚一出生便成为布雷达种植园的一名奴隶。而正是这名奴隶成为拉美殖民地中第一个独立国家的“国父”。

杜桑出世前，一位有名的女巫师曾预言他将是个男孩，将来会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但是，杜桑小的时候体弱多病，以致于起初人们并不期望他会活下来。并且，在他48岁率领一支黑奴起义队伍揭竿而起之前，他最多也只是一个聪明的奴隶，运气好的奴隶，在奴隶当中有着较高的威信和地位。似乎他的一生只能这

样结束了——虽然幸运，但终究还是一名奴隶。

杜桑生性聪颖机敏，求知欲很强。他会讲当地土语，还学会了法语，也懂得天主教教义。他还学了用草药治病的方法，使他在田奴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少年时代，由于身材削瘦，别的年轻人给杜桑起了个外号叫"火柴棍"。这使他下决心要克服身体上的缺陷。他每天坚持锻炼几个小时，掌握了娴熟的马术，几年后成为岛上最好的骑手之一。同几乎所有奴隶的孩子一样，杜桑在童年时要在种植园放牲口。由于他早熟，又有驯服牲畜的熟练技巧，引起了土生白人管家的注意，最后被提升为令人羡慕的马车夫。

杜桑因为处境优越，并受过教育，就认为自己比其他奴隶高一等。但是，他 15 岁时的一次经历使他懂得了海地所有的奴隶都是兄弟。

一个假日，杜桑同一位在耶稣教医院工作的朋友乔治·比阿苏一起去海地角。虽然身无分文，但单是在街上摩肩擦踵的人群中走走，看看衣着五光十色的人们，欣赏一下市场上的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商品，对这两个青年来说，也是一次引人入胜的旅行。可是，这天他

们被围聚在一个广场上的一大群人吸引了。

海地的奴隶们对他们所受到的虐待只有两种反抗的办法。在一些种植园中，大批奴隶集体自杀，用这种悲惨的方法摆脱贫穷和痛苦，并认为这样也可以损害他们的主人，因为这样做既减少了劳动力，又有损于主人声望。另一种更直接的办法是投毒。种植园使用大量的砒霜来消灭害虫，一个家奴可以很轻易地在他主人的食品里放进一种致命的毒药。残暴成性的种植园主们非常害怕被毒死，因而在吃饭前总要让别人先尝一尝。

如果一个奴隶投毒成功，往往逃跑出去同山上的逃亡奴隶们会合。有一个叫麦坎达尔的逃亡奴隶被指控阴谋分发毒药，企图消灭海地角的全部法国居民。后来，他被殖民当局捉住，被判处火刑。

当瘦小的杜桑和比阿苏挤进广场中心时，正在处决麦坎达尔，杜桑恐怖地看着刽子手举起手中的火把点燃了火刑台。他平生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奴隶被活活烧死。

对几乎从未受过主人鞭打的杜桑来说，这个场面真是触目惊心。多年来，他曾听到过其

它奴隶私下议论在别的种植园发生的拷打和刑罚。曾听说过有的奴隶被主人的恶狗撕成碎片，有的被绑在车轮下压死，有的被活活扔进煮沸的糖水池里，或者被主人用烧烫的白蜡灌进耳朵而变疯。那时，杜桑觉得这些离他在布雷达的生活很遥远，他不相信这些传闻。现在他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情。

沉默寡言的杜桑永远没有忘记这一天。正是这残暴的一幕不知不觉中促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次彻底转变。

此后几年，杜桑继续在布雷达种植园辛勤地劳动，也越来越博得管家的信任和好感。他当上了糖厂厂长，后来又总管全种植园的牲畜，这样的职务是过去奴隶从未担任过的。在这个要职上，他领导着布雷达的一千多名奴隶。杜桑娶妻生子，一家人和和美美地过着平静的“好日子”。如果不是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巨变，很有可能他的一生就这样消磨掉了。

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杜桑已经 46 岁了。他那牲畜总管的位置相当保险，他的生活道路似乎已经固定了。按当时的标准看，他的年纪也够老了，以至于他的奴隶伙伴们都称

他为“杜桑爹”或“杜桑大爷”。

法国革命立即在殖民地引起反响。土生白人，即“大白人”，怀着复杂的心情注视着这场革命。他们对被派来统治这个岛屿的那些法国官员的飞扬跋扈早已深恶痛绝，对由外来人统治自己家园的做法极为不满；更对政府征收的重税忍无可忍。因此，他们对有可能摆脱这种压迫感到庆幸。可是，在法国国内的大街小巷上人们高呼着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却让他们不那么舒服。他们不愿意让黑白混血的种植园主在政府中拥有发言权。但是，革命却给那些黑白混血种人，即“小白人”，许下了种种动听的诺言：减轻赋税，和土生白人平等。后来，随着岛上土生白人和黑白混血种人冲突的加剧，战争终于爆发了。

血染的自由花环

战火开始在海地岛燃烧，这个热带海岛很快就将接受血与火的洗礼。

主要力量集中在南部的黑白混血种种植园主把他们的许多奴隶武装了起来。政府代表站

在土生白人一边，甚至当法国政府颁布了给予黑白混血种人平等的公民权的法令时，他们竟擅自撤销。但几个月后，当他们看到法国君主政府注定要灭亡时，又转而呼吁大小白人和解。不久，更令他们惊恐的消息传到这个岛国：新成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也打算给黑人自由。无论是土生白人种植园主，还是黑白混血的种植园主，都不愿失去自己的奴隶。在这个共同的新威胁面前，他们联合起来，同意停战共同对付黑奴。但一切已为时太晚，黑人奴隶要用自己的双手解放自己的革命激情一经自由之火所点燃，就再也无法扑灭。

1791 年 8 月 22 日，一名牙买加逃亡黑奴布克曼率领黑奴正式举行起义。他们一路杀向海地角，但殖民军终于在黑白混血种人的帮助下打败了布克曼。布克曼自己被枭首示众，数百名奴隶也一同被害。让·弗朗索瓦和乔治·比阿苏接替布克曼继续领导奴隶起义。

在这两年多动荡的岁月中，杜桑一直在静静地观察。比阿苏就是那个曾经和杜桑一起目睹麦坎达尔被烧死的杜桑的朋友，他几次写信催促杜桑参加他们的起义队伍。杜桑观望了一

个月才做出决定。这是折磨人的踌躇不决的一个月。因为他对政府恢复法制和秩序的能力尚抱有一定的信心。但斗争在继续，人民仍不断遭屠杀，于是，他对法国政府的信心减弱了。当他最后决定跟人民站在一起时，他这种决心再没有动摇过。1791年10月，杜桑烧毁布雷达种植园，率领一千多名奴隶参加起义队伍。

由于他迟迟才参加起义，其他领导人，包括比阿苏在内，对杜桑都有一定的怀疑。虽然他带来了增援力量，但开始时并没有给他任何军事指挥权。然而不久他就用自己的才能赢得了他应得的尊重和地位。他在军事和组织方面所表现出的极大才能使他在起义队伍中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大。虽然黑人的数量很大，他还是对那种驱使装备低劣的原始黑人直接向敌人发起正面进攻，从而导致成千人丧命的战法很反感。他开始用游击战术来训练部队，教会他的部队分成小股埋伏在森林里，把法国兵完全包围后再发起进攻，最后用缴获的敌人的武器装备自己。即使这样，在战斗激烈时，许多奴隶还会突然间把缴获来的武器扔掉，而宁可用长刀或匕首来进行战斗，因为他们比较熟悉这些

武器。为了不让敌人的大炮打响，他们竟天真地把自己的手臂伸进炮口，结果自己被炸得粉身碎骨。如果幸运地缴获到一门大炮，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这样复杂的武器，以至错误地想在炮口点火开炮。

杜桑发现不可能把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都训练好，于是集中力量组织一支可以完全信赖的、有战斗力的 600 人的部队。依靠这支精干的小部队，他很快控制了整个起义队伍。

此时，起义的消息已传到欧洲。1792 年 9 月，从法国派出 3 名文官代表和 6 千法军来平息殖民地的战乱。短时期内法军很快取胜，仅在一次战斗中杜桑就损失了一半部队。但不几天后，据说当他率领重新组织起来的士兵攻击驻在几英里远的地方的另一支法军先头部队时，法国将军拉沃不得不钦佩地喊道："这个杜桑，到处打开缺口！"杜桑闻知，颇为得意。"卢维杜尔"这个法语词的意思是"开，打开"，所以不久杜桑便用"杜桑·卢维杜尔"来签名了。

法国人的胜利并没有维持太久。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起义军最后终于攻占海地角并焚毁了整个城市，几千名白人殖民者逃亡。许多土

生白人逃到古巴和波多黎各，他们对于起义军所造成的破坏的恐怖描绘可能对这两个岛国的未来起了某些作用，因为当后来大陆上的美洲殖民地都掀起独立革命的高潮时，波多黎各和古巴仍效忠于西班牙。为数较少的难民在美国安置了新家。虽然他们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到来加深了美国南部许多奴隶主认为绝不应该让奴隶获得自由的信念。

海地南部的一部分土生白人越过边界逃到了西属圣多明各。1793 年，法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西班牙和英国向法国宣战，在海地的法国军队突然被支持他们的土生白人抛弃，而且不得不既对付奴隶起义，同时又面临一场同西属圣多明各的西班牙军队的新战争。

法国将军们把奴隶部队及其军官看成下等人，而在圣多明各的力量较小的西班牙军队却用提供武器弹药以及同西班牙士兵平等的地位来争取他们。杜桑同让·弗朗索瓦和乔治·比阿苏一起站到了西班牙人一边，声称愿为仍然有国王的国家而战。由于杜桑已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单独同西班牙人交涉，接受了陆军上

校的军衔，带去了他的600精兵。不久，又有数百奴隶越过边境来投奔他的队伍。

法国驻海地的代表竭力想组织一支军队来对付东线的西班牙人和还在袭击沿海港口的英国人。为此，1793年8月29日他颁布法令宣布奴隶自由。但杜桑并未因此而动心，他不太相信这样的法令在法国会获得通过。

形势的发展开始使杜桑感到不安。并非只有他在打胜仗。西班牙的盟友英国人正派兵在海地沿海登陆。杜桑没能从西班牙人那里获得解放奴隶的保证，而在英军重新占领的各个城镇中，奴隶制立即被恢复了。杜桑开始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清醒过来。

1794年5月，法国政府已批准驻海地代表所颁布的法令的消息传到海地。所有海地的奴隶都被宣布为自由人。这正是杜桑为之奋斗的目标，即有法律依据的解放。获悉这个消息后，他对西班牙的效忠即告结束。他立即秘密写信给他的宿敌拉沃将军，表示现在他的人民已经获得解放，他愿意重新归附法国。几天后他接到复印信，欢迎他返回法国的土地，并授予他中将军衔。

杜桑目前需要夺回过去一年中替西班牙人攻克的数十个城镇。已有 5 000 多名士兵逃出西班牙营地来投奔他。而且，他现在还有两位年轻有为的军官——让·雅克·德萨林和亨利·克里斯托弗——的帮助。这两人后来在海地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欧洲，优柔寡断的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开始认识到当初不应该做出反对法国的决定。1795 年，他签署了“巴西莱亚条约”，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由于法、西两国重归于好，英国就成为尚未被赶出海地的唯一外国列强。此外，还有一个内部敌人。

海地角的被烧毁结束了“大白人”的统治。但“小白人”决心不让黑人取得政治权力。在一次混血种人的政变中，拉沃将军在海地角被捕并被监禁起来。于是，杜桑命令他的部队北上去营救这位法国将军。那时，杜桑已成为所有黑人崇拜的偶像。在向北进军的过程中，那么多昔日奴隶蜂拥前来投奔他，杜桑兵不血刃地就攻下了海地一角，救出了这位法国将军。

从政治上看，这是杜桑到当时为止使用的最成功的手段。不久，当拉沃将军被任命为海

地总督时，他就任命杜桑担任副总督，并当众宣布，事先未同杜桑商量，他决不单独行动。

杜桑成为海地最有实力的人物。由于他支持过法国军队，在欧洲他也成为一位英雄，他的孩子被送到法国去受教育。但是，在海地还远没有实现和平。英国人还控制着首都太子港和沿海许多城市，黑白混血种人还很有战斗力，他们在南部还有一个据点。经过5年的战斗，杜桑只有一个目标：为海地人民——不论白人或黑人——争取彻底的自由。

在学会成功的战争艺术的同时，杜桑也学会了运用政治手腕。当时，海地需要选举出两名出席在巴黎召开的法国国民议会下院会议的代表。杜桑巧妙地操纵选民，使拉沃将军和另一个法国驻海地的主要掌握经济和行政大权的代理人当选。他们两人都找不出什么可以拒绝赴会的理由，而当他们乘船前往法国时，杜桑就使海地摆脱了这最后两个有影响的法国人。

那时，有一种倾向，白人历史学家和军事指挥官往往把他们在新大陆的失败归咎于热带黄热病。黄热病确实使许多欧洲士兵丧命，但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太低估了黑人作战时的勇猛

和顽强，因为他们是为自己而战。1798 年 4 月 14 日，杜桑胜利地开进太子港。

杜桑不同于他手下的将领德萨林和克里斯托弗以及许多革命初期的黑人领袖，他从不企图对白人采取报复行动。他认为黑人受奴役不是由于他们的肤色，而是由于他们太软弱。他注意到，许多黑白混血种奴隶主，尽管身体里也流着黑人的血液，对待奴隶却比白人还要凶残。他认为，黑人在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阶层之前，需要一切对他们友好、支持他们的事业的白人的帮助。

占领太子港后不久，杜桑主动同已经北撤到另一个港口的英军指挥官们通了一次信，提出如果英国人撤出该岛，他就释放俘虏，并实行其它宽大的投降条件。他的政策得到了积极反响。1798 年 10 月 5 日，最后一批英国军队乘船离港，海地岛上彻底肃清了英军。

赶走英国人这件事使普通法国人又一次高度赞扬杜桑。但是，法国的政治家并不愚蠢，法国政府内已有许多人对那口头上表示忠于法国，而行动上却象解放者的“黑色拿破仑”开始失去热情。

1799年雾月18日，拿破仑·波拿巴推翻督政府上台，就任法兰西第一执政。杜桑的所作所为已不能再哄骗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们了，而杜桑本人也不想给拿破仑增添新的光荣了。虽然英国士兵已撤离海地领土，但海地的大部分港口还处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封锁下。杜桑知道一旦战争结束，国家必须重建。在革命的第一年，海地角附近种植园被烧毁所造成的饥荒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每当这支由奴隶组成的军队牢固地控制了一个地区后，他就命令一部分士兵复员回去重新务农。他认识到一个岛国没有贸易是无法生存的。1799年7月13日，他同英国签订了允许它在海地各港口自由通商的条约。

法国政府没有上杜桑的当，在英国人撤走前已派法国将军泰奥多尔·埃杜维尔侯爵到海地，表面上是为了帮助平定岛屿，其实是要遏制杜桑。同以前的其他欧洲人一样，埃杜维尔轻视杜桑的才智和机敏，认为自己只是在对付一个原始黑人。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副官去吹捧杜桑，竭力劝说杜桑离开海地去欧洲，让他相信在欧洲会得到极高的荣誉。这个副官禀承主

子的旨意大肆奉承杜桑，说什么“如果我能随同杜桑·卢维杜尔回国，我会感到多么高兴呀！……杜桑将在法国得到对他效忠的深切感谢、荣誉和应有的休息。”

但杜桑十分清醒。他回答说：“还没有一条大得可以容纳我的船。”见这名副官还在喋喋不休地白费口舌，杜桑干脆指着一棵刚栽上的小树说：“等这棵树长到可以建造容纳我的船只时，我就去。”

最后，绝望之中的埃杜维尔就在黑白混血种人和黑人之间煽动起敌对情绪，企图以此来削弱杜桑的力量。杜桑于是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埃杜维尔来海地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恢复奴隶制。人民愤怒了，杜桑继而领导人民成功地赶走了埃杜维尔。

如果说这时杜桑已是一位很出色的军事指挥官的话，那么他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干练的政治家。第二天，他向人民宣布，他对斗争已感到厌倦，准备回乡村隐居，安度晚年。

人们发狂似地涌上街头，高喊着：“杜桑爹，别抛弃我们！别抛弃我们！”在人民用行动表明了坚决支持他以后，杜桑同意留下。现在，

埃杜维尔已经返回法国，杜桑就转而开始平定由黑白混血种叛乱者控制的南方。

黑人和黑白混血种人之间的战争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残酷程度。士兵们用斧头、匕首和长刀浴血厮杀，数以千计的俘虏，包括妇女和儿童被屠杀，种种暴行屡见不鲜。甚至杜桑本人也对被派去负责战争最后阶段的德萨林屠杀混血种人的残暴行径感到震惊。他喊道："我只叫你修剪树枝，可没让你把树连根拔掉！"

当被打败的黑白混血种人司令官安德烈·里戈最后逃出海地来到法国，向拿破仑报告杜桑的种种"罪行"时，拿破仑只冷冷地对他说："将军，我只是在你身上看到一个缺点：你输了。"

杜桑征服了黑白混血种人后，继续越过边界进攻西属圣多明各。1801 年 1 月 21 日，杜桑率军胜利开进首都圣多明各市。

海地全岛已经统一，杜桑于 1801 年 7 月 7 日宣布由 9 人组成的委员会制定宪法，并任命他为海地终身总统。他表示要恢复海地的农业。已获得解放的奴隶们重新回到种植园劳动，种植园要交纳足够的赋税，这为政府奠定

了巩固的经济基础。白人受到鼓励返回自己的种植园，并可在政府里担任行政职务。大部分历史学家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杜桑能沿着新宪法规定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海地早就可以繁荣起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已经成为法兰西第一执政的拿破仑不能容忍对法国的荣誉进行这样的侮辱。他命令向海地派遣一支远征军。拿破仑最宠爱的妹妹波利娜的丈夫、年青的夏尔·勒克莱尔将军被选来统率这支问罪之师。此前法国或其它国家从未向海外派出过如此庞大的远征部队。1801 年底，第一支 2 万人的队伍离开法国。1802 年 2 月，勒克莱尔已做好率领主力部队在海地角登陆的准备，同时，他又沿海岸派出其它部队以便占领太子港和圣多明各市。

杜桑早就预料到法国会来报复，但没有想到会派来一支如此庞大的海军力量。他在命令部队投入战斗时说："朋友们我们肯定会牺牲。整个法国都开到我们岛上来进行报复，要使我们重新沦为奴隶。但是至少，让我们用行动证明，我们是应该得到自由的。"

杜桑把守卫海地角的任务交给了克里斯托

弗。当他看到已无法抵御侵略者时，就下令烧毁这个城市。从远离海地角好几英里的内地都可以看到冲天的火光。当勒克莱尔攻到海滩时，全城 2 000 多幢建筑物仅存 59 幢还可使用。

不久，太子港也落入法军手中。守卫城市的黑人也曾想把这个城市付之一炬，但法国军队很快登陆，保住了大部分建筑。拿破仑是要使法兰西重新获得一个富饶而稳定的殖民地，而不是一个被烧成废墟的岛屿。第一，应通过阿谀奉承和调停等措施，设法同黑人讲和。第二，开始恢复正常秩序。第三，不论是自愿或用逮捕的办法，把杜桑弄到法国。第四，虽然未见诸文字而只是一种暗示，那就是必须恢复奴隶制。

为了实现第一步，勒克莱尔同杜桑进行了谈判。拿破仑派杜桑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法国监护人作为远征队员一起来到海地。在启程前拿破仑接见了这两个年轻人，向他们解释他并无意伤害他们的父亲，而只是希望使杜桑重新同法国联合起来。后来，安排了一次杜桑同他儿子们的会面。杜桑没有受拿破仑的诺言的

骗。他的亲生儿子伊克痛哭流涕，大叫他绝不反对法国，而养子普拉西德却扑到父亲的怀里，表示要跟父亲留在一起，为海地战斗到底。

起初，似乎是勒克莱尔占据了优势，但很快形势发生了逆转。杜桑和他的部下撤到内地山区，法军根本无法把他们赶下山来。整个海地，以前被杜桑遣返回种植园从事生产的人纷纷抛弃田地来投奔他。而勒克莱尔在第一个月就损失了 5 000 人，另有 8 000 名士兵因伤或感染黄热病而住院治疗。几乎每天都有新的部队来补充，但都被战争或提前发生的黄热病所吞噬。

由于处境不妙，勒克莱尔看到放弃第一阶段计划而迅速采取第三阶段办法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勒克莱尔又一次同杜桑进行谈判，派出他的一位将军邀请杜桑去商谈和平条件。

多年以来，杜桑特别喜欢的一句名言是："不轻信乃安全之母。"可是现在，突然因为希望尽早结束这场残酷的战争，杜桑却忘记了自己的这条座右铭，只由普拉西德和一位战地副官陪同，前往作为会谈地点的一所种植园住宅，一位法国将军出来热情地接待了他。

但是，这位将军突然借故离开了。不一会儿，一连士兵冲进房间，逮捕了杜桑。他双手被绑，被推出住宅，押上一辆等候在门口的马车，来到海边，被拖上了法国的“英雄号”三桅船。

6月15日，在杜桑一家的其他成员也被带到船上后，“英雄号”起锚驶向法国布勒斯特。

抵达法国后，杜桑的家属被分散流放到好几个地方。拿破仑知道处死杜桑会在海地引起无法镇压的大起义，所以他命令把杜桑关到靠近瑞士边境的一所高山监狱里。1803年4月6日，杜桑病死于狱中。

杜桑在被捕后曾经说过：“他们打倒我，只是推倒了在圣多明各的一棵自由之树。但是，这棵树会重新生长起来，因为它已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杜桑的预言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黄热病继续在法国军队中肆虐流行，大批士兵死亡，军官们也不能幸免，牺牲者之一便是勒克莱尔本人。拿破仑对在欧洲的连年征战尚自顾不暇，就放弃了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帝国的梦想。1803年，他把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并命令失

败的远征军残部撤出海地。然而这次远征已经使法兰西丧失了 35 000 名精锐部队。

德萨林在独立的海地进行了两年专制统治。他死后，国家分裂，克里斯托弗在北方继续维持专制政权，而一位较为温和的黑白混血种领袖亚历山大·佩蒂翁在南方建立了一个共和制政府，一直统治到 1818 年。此后，海地又重新统一为一个独立国家。

后来，西属圣多明名各宣布独立于西班牙。但马上又被海地军队侵占。1844 年，它获得自由，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今天，人们纪念杜桑·卢维杜尔，这位海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一位不仅为海地，而且也为整个拉丁美洲开辟了独立道路的奴隶。

第三章　新大陆的曙光

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无疑是 18 世纪后半叶世界上影响最深远的震惊世界的两件大事，而对新大陆的人们来说，其意义不仅仅于此，因为正是这两场伟大的革命给西班牙语系美洲人民带来了自由的曙光……

“解放者”：早年经历

海地的战火硝烟沉寂了十多年。仿佛只是一瞬之间，时间走到了 1816 年。这时海地的南北方仍然分裂着。南方是黑白混血种人亚历山大·佩蒂翁领导下的共和政府。就在这个当时整个美洲除美国以外唯一的共和国里，正生活

着一位非同一般的外国人，他瘦削的身材，虽年仅33岁但乌发中已可看到一绺银丝，消瘦的面颊更衬出细长的鹰鼻。整日双眉深锁，深深的焦虑和急切的企盼灼烧着他的双眼。他就是正流亡在海地的西蒙·玻利瓦尔。

西蒙·德·玻利瓦尔1783年7月24日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是祖辈在16世纪就到南美定居的十分富有的土生白人家的小儿子。当时委内瑞拉在政治上只是一个都督区，但在经济上却被认为是西班牙在美洲最发达的殖民地。委内瑞拉位于南美洲西北部，它濒临加勒比海的漫长海岸使它成为从西班牙和加勒比海诸岛出发最便于到达的一块殖民地。虽然委内瑞拉的矿产无法和秘鲁或墨西哥相比，但在它富饶的种植园中生产的可可、烟草、蔗糖和蓝靛，对西班牙则至关重要。

玻利瓦尔出生时，委内瑞拉还只有75万人口，大部分居民象现在一样集中在北部沿海地区。在炎热的热带低地上，有土生白人经营的大庄园，使用黑奴进行生产。在低地的后面，是沿海山脉，山不高，人们可以穿越它前往内地。山地地区气候凉爽宜人，有4万人口的繁

华的首都加拉加斯就坐落在山脚下，同位于低洼潮湿平原的拉瓜伊拉港的交通十分方便。

在内地，沿海山脉的后面，沿奥里诺科河向南，直至热带森林地区，是延伸数百英里的类似阿根廷潘帕斯大草原的广大牧区。这里北部最潮湿的地区被人们称为平原，平原上零零落落散布着一些城市，过去是向印第安人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传教区。同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产生了高乔人一样，平原上的居民大部分是称为平原人的混血种族，他们跟随自己的部落首领过着游牧生活。再向南，在奥里诺科河南部热带森林地区以及北部委内瑞拉与哥伦比亚交界的安第斯山麓地区，散布着一些同近代文明没有任何接触的印第安人部落。

最早的土生白人殖民者是经过加勒比海岛屿来到委内瑞拉的。他们有着经商的习惯，一开始就对西班牙强加的种种贸易限制感到不满。西班牙已经失去了不少原属于它，可后来被法国、荷兰和英国占领的岛屿。这些加勒比海殖民地的居民，以至美国居民，都很希望同委内瑞拉进行贸易。而委内瑞拉人也希望和这些人们通商，经常公开对抗西班牙规定的贸易

限制。外国船只进入委内瑞拉的港口，也必然同时带来新思想的影响，从而促使当地的土生白人具有更为强烈的独立思想。

但是，这种独立精神只存在于上层富有阶级中。他们寻求的是经济解放，而不是社会改革。来自加勒比海岛屿的早期移民都带来了自己的奴隶，后来又输入了数以千计的黑奴来耕种他们的热带种植园。因此，在委内瑞拉，奴隶制比在南美大陆的任何其它地方更为根深蒂固。土生白人地主的财富越来越多，而奴隶和印第安人依然一贫如洗。实际上，除了一小批居住在沿海城市里的商人外，委内瑞拉没有中产阶级。对于广大黑人、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种人来说，受西班牙统治或者受土生白人统治并没有多大区别。

西蒙·玻利瓦尔一家是委内瑞拉最古老、最富有的家庭之一。除了在加拉加斯拥有一幢华丽的别墅外，在城外还有一些种植园，在平原地区有几个牧场。玻利瓦尔3岁丧父，但因为家庭富有、母亲又很温柔贤惠，所以失去父亲并没有影响他快乐的童年。并且因为太小他几乎不太记得这种创痛。但仅仅六年以后，玻

利瓦尔的母亲也病故了。不满9岁的小西蒙和他的两个姐、一个哥哥成了孤儿。

西蒙的两位姐姐在母亲去世的当年结了婚，兄长胡安·维森特由他的一个舅舅监护，而他自己则由另一位舅舅负责监护。

玻利瓦尔的监护人请了一个又一个的修女来教育他，但他却象一个被宠坏了的顽童，使这些个修女们无从教起而只得离去。最后，他的舅父请到了刚从欧洲回国的杰出的青年学者西蒙·罗德里格斯来作他的老师并同他生活在一起。正是这个人后来成为玻利瓦尔终生所挚爱，所尊敬的良师益友。

罗德里格斯也出身于委内瑞拉的一个名门望族，但玻利瓦尔的舅父却不知道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欧洲留学期间已深受当时法国作家们的自由思想的熏陶，让·雅克·卢梭就是他最喜爱的作家。卢梭认为，一切人生下来都是纯洁无辜的，只是后来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才可能腐化堕落。他还相信一个青年如果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成长并且只给他阅读优秀的书籍，是可以成为伟大的领袖的。罗德里格斯觉得可以在玻利瓦尔这个出身富有家庭的青年身上试

验这种理论。

玻利瓦尔改掉了早先那种不服任何管教的毛病后，就同罗德里格斯相处得十分融洽了。他也不再只是被关在加拉加斯这个城市的狭窄天地里，而可以在他的老师的陪伴下去他家在郊外的庄园生活。在那里的生活真正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两个人一起骑马、游泳。授课不是在教室里进行的，而是当两人并肩骑行在山间小路上时边走边讲，或是游完泳后光着身躺在岩石上晒太阳时进行的。他们一起访问庄园附近的丘陵牧场里生活着的印第安平原人，同他们一起吃饭、在野外过夜。正是在那里，玻利瓦尔练就了一身甚至连最善骑的平原人也夸赞的出色的骑术。这些赞扬使玻利瓦尔满心欢喜。虽然他人比较瘦，但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喜欢别人比他强。

玻利瓦尔对罗德里格斯总是十分恭顺。虽名为师生，但他们两人的心是相通的。当玻利瓦尔还是一个内心痛苦、对前途几乎悲观失望的孩子时，罗德里格斯凭着他丰富的教学经验挽救了他，使他成为一个热情的青年。两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开始建立起来的。

十年之后，玻利瓦尔游历欧洲的时候，他已长大成人。但他仍太年轻，并且早年丧妻，生活方向不明，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这时他主动同罗德里格斯一起生活，同他一起去意大利，再次受到老师的思想熏陶。这对他的一生都极为重要。

1823 年，玻利瓦尔已成为美洲大片土地的解放者，但他正在为如何结束秘鲁的战事而殚精竭虑。此外，新解放的土地上的人们拥护他担任裁决人，却又不总是服从他的裁决。他困难重重，不知如何治理这个天下。这时他得知西蒙·罗德里格斯已返回美洲，就立刻写信给副总统桑坦德："得悉我的朋友西蒙·罗德里格斯已从巴黎返回。如情况属实，请按我所尊重的这位学者和友人的身份给予应有的待遇。他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一位与众不同的爱国者。他是加拉加斯的苏格拉底。他正在同妻子打官司，正如苏格拉底同克桑西佩有争端一样，可谓他具有苏格拉底的一切特点。请您告诉他多给我来信。请您给他一些钱，向我在加拉加斯的代理律师结算。如果他可能，请他来看我。"

罗德里格斯关于社会改革的见解是异乎寻常的。那时，欧洲正在休养生息，其它国家的人民只想从欧洲学习各种思想和制度，而他却大胆地写下这样的意见："欧洲是无知的，不是文学、科学、艺术和工业上，而是在政治方面。漂亮的面纱掩盖着旧世界最可怕的贫穷和丑恶的面貌。"

罗德里格斯在写作中经常自比为哥伦布。这不是因为他妄自尊大。他反复用哥伦布的口气讲话，正是因为他抱着这样一个崇高而感人的希望：在孩子身上，特别是美洲孩子身上，存在着一个尚待发现的世界。

即使到今天，这也永远都是一个客观现实。人类在公元前就能够进行缜密高深的哲学思维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而且在那时就向往着仁爱和公正。然而时至今日，却不知如何更好地培养儿童。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人能够了解他周围的世界，并知道更广阔神秘的宇宙的存在；但当一个学识最渊博的学者低下头来看到他自己的儿子时，却会象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一样茫然。

如果不想进行教育儿童这一工作，那么美

洲独立会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呢？难道只是为了搞出一些书本式的共和国来摆样子而不去造就“新人”吗？难道要让新世界奴颜婢膝地顺从欧洲的伦理和思想，放弃自己的目标吗？罗德里格斯这些尖锐的提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现实意义或稍稍缓和，相反，在今天它们能让我们更加深思眼前这个世界。

罗德里格斯无意打击学生的热情，而是赋予这些热情以意义和目的。他不愿孩子在他手中变成任人摆弄的橡皮泥（当时人们却惯于这样搞教学），而是协调孩子自身的积极因素。他不想挟制孩子的思想，而是细心巧妙地从他们的糊涂认识中诱导出他自己的思想。正因为这样，玻利瓦尔后来多次将他比作苏格拉底。

“成功之路在于不断改进”，这是西蒙·罗德里格斯的又一主要思想。其意为：必须承认现实，才能超越现实；既要尊重事物不断变化的发展进程，又要主动安排自己的命运。再也没有其它思想能比这更贴切地说明玻利瓦尔的性格特征了。

玻利瓦尔在老师的影响下在心灵深处唤起了对自由、对正义、对一切伟大和美好事物的

向往。他从老师的教诲中始终牢记着这样一条：成功之路在于不断改进。这就是他能够坚持不懈、勇敢顽强的奥秘所在。他处于逆境时之所以能认识到要使个人的思想符合客观世界，之所以能不灰心丧气，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

在少年玻利瓦尔逐步摆脱内心烦恼的同时，在他身边，一个漫长而同样激烈的历史进程正发展到高潮。

西班牙美洲争取解放的真正原因是，18世纪中叶，美洲内部产生了某种跃跃欲试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在西班牙尚未苏醒。所以，对于世界上的革新之风，美洲土生白人更有精神准备。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一些真正的国家，它们具备自身发展的一切条件。土生白人在共和国成立以前就有了主张革新的共和思想，他们的思想同欧洲传来的宫廷旧思想已发生矛盾。

委内瑞拉民族已达到惊人的成熟，这首先表现为他们自殖民地时期来一直很关心政治。美洲已有了真正的爱国力量，其中土生白人是骨干。他们进行着既反对外国侵略者，又反对

宗主国统治者的斗争。可以清楚地看到土生白人在政治上不断成熟，民族意识日益浓厚。土生白人中正成长着一种头脑清晰、意志坚定的新人。他们后来在5个国家中拔掉了西班牙国旗，插上了美洲自己的新旗。

先驱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大概是一个最好的典型。这样一位举世无双的人物出现在18世纪末期。他是引起欧洲注意的第一个西班牙美洲人。他在欧洲的地位引起将军和政治家们的不安。他第一个把美洲当作一个整体，他计划清楚地表明他想建立一个全洲性的统一国家。他的见解日益获得肯定，他的信徒和崇拜者几乎遍布所有的西班牙殖民地。他的足迹遍及欧洲，他饱尝艰辛，历尽甘苦，为建立理想中的美洲大国进行了不懈准备。他学习开矿、办学，建设港口、管理监狱、建立军队、领导大学、建设灌溉工程、开办图书馆、建造防御工事，他研究政府制度，学习历史、艺术、商业等等，简直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他精力充沛，广泛涉猎，博学多识。

在学习期间，他顽强地磨炼自己的意志，他的人格比他所有的业绩更令人赞叹不已。他

不但符合当时人们的衡量标准，而且有时还带有那时开始流行的浪漫热情。他以自己选定的英雄加哲学家的楷模来塑造自己，而且后来也严于律己，从不放松。即使在穷困的时候，他也不轻易听从英国政府的摆布，曾拒绝提任一支军队的领导工作，他在巴黎恐怖时期的法庭上作了自我辩护，不但得到了无罪的结果，也赢得了人民的欢呼；他不顾自己已经年迈，仍指挥3条小船开到他的故土委内瑞拉杳无人烟的海岸，向西班牙挑战。他后来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本性，在62岁高龄时还立马横刀，率领部队冲锋陷阵。

19岁的新郎，20岁的鳏夫

1799年1月19日，玻利瓦尔在委内瑞拉的拉瓜伊拉港乘“圣伊尔德丰索”号船出发去西班牙。这是他思慕已久的一次远行。船于2月2日抵达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该船须在古巴的哈瓦那港停泊，而那里正处在英国的封锁之中。所以船不得不在墨西哥的这个港口等了一个半月。3月20日继续航行，经过哈瓦那时，

封锁已经解除。从这里直驶西班牙，于5月31日抵达。

童年时期的玻利瓦尔在18世纪末得到了性格上的锻炼；恰恰与此同时，委内瑞拉正强烈地要求独立。但不能因此随意把这两件事拉扯在一起，把当时的玻利瓦尔一下子就说成是一个小解放者。

玻利瓦尔从童年到少年，有文字记载的唯一愿望就是去西班牙，而不是象有人推测的那样对西班牙十分冷漠。若干年后，他依然信奉他的家庭所信奉的宗教。因而，可以说，政治上也好，宗教上也好，罗德里格斯并没有打算把小玻利瓦尔培养成早熟的激进党人。

如果这样培养学生，那就极大地违背了西蒙·罗德里格斯的教育思想。罗德里格斯在玻利瓦尔身上踏踏实实地培养起了成年人的优秀品德，传授给他必要的知识，让他自己以后对不熟悉的问题也能进行判断。罗德里格斯完全相信学生在思想的自由发展中能解决其它一切问题，这就是他所采取的并受到玻利瓦尔赞扬的苏格拉底教学法。

未满16岁的小西蒙初次踏上西班牙国土

时确实不是什么早熟天才，也不是什么英雄的苗子。对于他行将进入的世界，他只是从人们在这方面或那方面都有所夸大的泛泛描述中有了一点点了解。很容易想象出他当时感受到的事物：宫廷中的豪华场面和各种享乐，宫廷里的大人物，女人，学习，文艺演出以及都会生活中的各种风险。

青年人过早地受到强烈的冲击后，会向着某一或好或坏的既定目标全力发展。一般说来，即使是最有天赋的青少年在刚接触生活时也只能感到一种并无确定目标的模糊的兴奋。

只要青年人觉得自己前程远大，可以大有作为并受到欢迎，他们就会意气风发，而他们也甘愿为实现某一理想而忍受最大的苦难。几年之后，玻利瓦尔曾在两次庄严的场合见到拿破仑。这样的场面打开了他的眼界，也渗入了他少年时代惶惑的思想。他敬佩拿破仑穿着朴素；但是也可以看到，如果玻利瓦尔没有看到他有着皇帝的显赫地位，那就不会对他产生这么大的兴趣。他似乎觉得皇帝戴着的王冠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东西。因而是可鄙的，但是众人对拿破仑的欢呼以及拿破仑辉煌的战绩却令玻

利瓦尔全然为之倾倒。

1800年，玻利瓦尔在西班牙与之一起生活的最亲近的舅父埃斯特万突然被捕入狱，年轻的西蒙只得去与他们交往密切的乌斯塔里斯侯爵家里生活。这样，玻利瓦尔的生活中又闯进了一个富有个性、知识渊博的人。可以肯定，这个人同西蒙·罗德里格斯先生一样，也在他的思想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乌斯塔里斯身上，和蔼和正直、君子气概和民主作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当然使玻利瓦尔钦佩不已。乌斯塔里斯的批判精神和经验使这个青年看到了他正在寻找的道路。按照玻利瓦尔的说法，西蒙·罗德里格斯先生是一位具有天赋和才干的能人，而乌斯塔里斯在政治活动和行政工作中阅历丰富，他的知识成了罗德里格斯品质的补充。

但是这时玻利瓦尔未能进一步关心政治问题，这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个人问题，一个对青年人来说最具吸引力的问题：准尉西蒙·玻利瓦尔堕入了情网。这次爱情来势凶猛，他于1799年6月到达马德里，第二年9月，他刚过17周岁，就给在委内瑞拉的舅父写信说他打算

结婚。

小西蒙在这封信里讲得一本正经，一开头就说结婚是为了管好家业，接着说："我热烈地爱上了一位美貌出众、品德贤淑的小姐，她是一位同乡和亲戚的女儿特蕾莎·托罗小姐。"未婚妻的父亲是同乡人贝尔纳多·罗德里格斯·德尔·托罗。一切都很顺利，但贝尔纳多考虑到他太年轻，合乎情理地要求他将婚期推迟一个时期。

1802 年 5 月 26 日，玻利瓦尔终于举行了他渴望已久的婚礼。当时，他未满 19 周岁，而新娘则已年近 20。

婚后不久，玻利瓦尔即携娇妻返回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在婚后立即返回委内瑞拉的想法，从心理上看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把他看作是，而且实际上他也是土生白人的代表，他们为自己是美洲人而感到骄傲，而且即将本着这种感情投身于谋求独立的事业，那么他的想法就更有历史意义了。

玻利瓦尔愿意到委内瑞拉定居，他也开始感到自己对全世界的情况、对美洲的实际重要

性已有了更好的认识。因而他急于回国，要与同胞们分享他的知识。结婚和到委内瑞拉定居是玻利瓦尔心目中不可分割的两件事。他爱特蕾莎，他要把她带回自己的祖国。这两件事在他身上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深沉、严肃的感情。委内瑞拉在召唤他，沐风栉雨、历尽艰辛创造了新大陆上的新世界的祖祖辈辈们在召唤他。

玻利瓦尔夫妇在委内瑞拉度过一段幸福的时光。但上帝似乎总是对美好的一切都特别残酷。特蕾莎在委内瑞拉只生活了5个月就感染上了黄热病。1803年1月22日，她死于黄热病。欧洲人把这种病称为“热带病”，主要发生在玻利瓦尔想让爱妻所了解的他所挚爱的委内瑞拉。

玻利瓦尔对特蕾沙始终保持着纯洁的爱情。她死后，他再也没有去寻找这样的爱情。他不再结婚，这没什么道理，但这不可改变。他内心深处总是思念着他那几乎还是少女的妻子。后来，他也曾随意爱过一些女人，但并未重视过她们。特蕾莎在他心灵深处的位置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他的住宅刚刚开始出现生气，而现在大厅

里却放着他爱妻的狭长的灵床。年轻的鳏夫唯一的感觉大概是“好像一切都是假的”。原本高朋满座、笑语欢声的华宅现在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落落。朱栏依旧，只是佳人已殒逝泉台，不堪回首的寂寥落寞。特蕾莎身着白银缎的华服，静卧在堆满鲜花的大厅中央的灵庆上。染病前的她是加拉加斯最光彩照人的新娘和贵妇，但现在，玻利瓦尔已不忍再掀起覆在她脸上的头巾了，不忍再看她那曾经娇艳如花而现在已被可怕的胆汁染成黄色的面庞了。她病中高烧不退，以至全身皮肤都受到伤害。玻利瓦尔在马德里追求了她两年，热情从未减退。他是多么郑重其事地开始称她为“我的夫人特蕾莎”啊！

失去爱妻的巨大悲伤使玻利瓦尔不能再面对勾起他的痛苦的所有一切。睹物思人，这里的一切都已成为爱妻的象征，他承受不了每时每刻都经历着的刻骨铭心的折磨。玻利瓦尔决定再次前往欧洲。

玻利瓦尔第二次赴欧同第一次有很大的不同。第一次去欧洲时他年轻，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而且很早就被炽热的爱情占据了整个身

心，因而他的精力和时间几乎全部用来照管自己以及考虑将来如何成家立业的问题。现在他生活中出现的空白使他一下子得到了某种解放。

此时此刻在欧洲大陆上，拿破仑那种几乎不可思议的业绩以及他的才干使得他的敌人也着迷。在欧洲，各国君主政权时兴时衰，法国革命又引起了混乱。在这一切以后，他一个人的意志震撼了整个旧大陆；他那个旨在同时达到恢复旧秩序和继续革命这两个目的的专制政权显示出了极大的能量。任何人都有机会晋升和得到勋章。拿破仑雷厉风行的作风无与伦比，使人人都受到他的感染。

帝国的元帅和官员几乎都是平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有着统一的强大意志，只要人们的才能符合这种意志的要求，就能获得极高地位，以至成为王族。事实上，这是一场世界性的民主革命，也许比人们制定出的哪怕再多的平等法律更加令人神往。

波旁王室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历来维护那种任人唯亲和守旧落后的政体，而且办事疏懒，腐败透顶。在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以专制

的国君为中心的宫廷集团完全不顾人民的利益。无论在何地，只有在某个国王或最高统治者偶然得要考虑国家的利益时，才能暂时只是在表面上打断这种腐败和寄生的状况。法国革命首次打破了这种腐朽的世界。它向人们表明，“武装起来的人民”比宫廷的军队更强大；人民在政治上以及在所有其它领域，都能极有作为。

然而，共和国并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政府，因此实行巨大的改革仍缺乏稳定的基础。这仍然是每当人们进行激进的政治改革时都会遇到的问题。当代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的大敌倒不是那些出于自私予以抵制的人们。要知道，如果建立的政府无法具体实现既定的政治原则，那么死抱着这些原则不放的人必定会走上用说谎来掩饰错误、用暴行和罪恶活动掩饰谎言的道路，因而那些故意看不到这一事实的人们才是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的大敌。这种情况，法国革命中发生了，当代许多国家的革命中也发生了。

拿破仑刚刚崛起时，许多国家把他看成是解放者。各国人民认为拿破仑无疑会带来一种

更加开阔和更加体面的生活，而不会像各国的旧政府那样为了维护其统治而强使臣民愚昧无知、道德沦丧。但是这种美好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维克多·雨果曾歌颂过那些“法兰西的名字威振世界”的日子。确实，那时该都对此感到害怕。因此，毫不奇怪，许多人完好地保持着原来对自由的渴望，并且使之代代相传。这样，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又带上了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轮。各国人民不得不在本国统治者的暴虐统治和拿破仑的那种人们已感到是“外国的”异族统治之间，寻找新的出路。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也带来了令人恐怖的经验，但是，失败可能只是暂时的，因为在美洲，新的社会制度正遵循着人人有工作，人人有尊严等原则前进而这仍然是欧洲贵族社会的理想。

玻利瓦尔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两次登上欧洲大陆。他曾在日记中描绘过这段生活：“当我16岁，是一个富有的孤儿。我观看了墨西哥城和哈瓦那以后就去西班牙。在马德里时，我热恋着托罗老侯爵的侄女特蕾莎·托罗一阿蒂萨，并同她结了婚。1801年我同妻子从欧洲返回加拉加斯。说实话，我被最热烈的爱情弄昏

了头，头脑里没有政治思想，因为政治思想尚未触动我的想象。我妻子死后，我为这一发生得过早的、出乎意料的打击感到悲伤。于是又去西班牙，从马德里到了法国，而后又去意大利。那时，我对政治事件逐渐有些关心。我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我注意关心各种政治活动。1804 年最后一个月，我在巴黎观看了拿破仑的加冕典礼。这次典礼、这次豪华的活动使我兴奋，但主要不是由于场面豪华，而是由于广大人民对那位法国英雄表现出的爱戴之情。人们的热情发自肺腑，人们自发而不受约束地庆祝胜利，拿破仑受到 100 万人的欢呼，这一切使我觉得，受到那种情绪感染的人都会认为这就是人的最高期望、最终要求和最大抱负。我把拿破仑戴在头上的王冠看成哥特式的区区小物。而在我看来，巨大的倒是人们的普遍爱戴以及人们对他的注意。我承认，这一点使我想起我国尚在忍受奴役的状态以及解放祖国的人可能会得到的光荣。但是我永远不敢想象我会有这样的运气！后来，我开始鼓励自己，某一天我也能为解放祖国出力，但并未想到我在这一伟大事件中居然会当主角。如果我没有丧

妻，我可能不会第二次去西班牙。可以相信，要是呆在加拉加斯或圣马特奥，我不会产生我在国外旅行时产生的思想。要是呆在美洲，我也无法对世界、对人们以及对事物进行研究，并且从中取得经验，而这一切在我的全部政治生涯中起了很大作用。丧失妻子，这使我很早就投身政治，使我去追随玛尔斯（希腊神话中的战争之神——注）的战车，而不是围着塞雷斯（希腊神话中的司农女神）的耕犁转。”

玻利瓦尔在此自述中十分清楚地指出他两次去欧洲的不同情况，而且强调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逐渐形成了他的志向。他早年的思想具有其性格特点；接着，玻利瓦尔靠自己的努力以及在乌斯塔里斯身边取得了知识和经验；之后，他才明确形成具有广泛爱国和人道内容的理想。

1807 年，当玻利瓦尔结束了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返回加拉加斯时，那里的人们还在热烈地谈论着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将军为解放国家而从西部登陆未获成功的那次事件。

先驱米兰达

米兰达生于1750年3月28日，在未满21岁时，他就离开委内瑞拉到西班牙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他那时似乎预感到自己将在欧美新旧两个大陆上享有特殊地位，抑或是他那时便具有编年史家的专业爱好，总之他在第一次旅行时，就对自己的生平开始积累大量的资料，亲自编纂成册，共计63卷，一直保留在自己身边。这成为后人了解这位伟大的美洲人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米兰达被公认为美洲大陆独立运动的先驱。同玻利瓦尔一样，他也是加拉加斯人。米兰达和玻利瓦尔相差33岁，他们祖先的来历也各不相同：解放者的祖先是白人，他们是兴建第一批城市时最早来到委内瑞拉的居民；而米兰达只有土生白人的母亲祖先，他的父亲出生在加那利岛一个西班牙家庭。

大概从20岁起米兰达就已经具有了一种深刻的历史使命感，更准确地说，从那个年龄起，他就立志非做一个享有世界声望的人物不

可。他的一生，实际上没有那种几乎人皆有之甚至天才也不例外的心血来潮和走一步算一步听天由命的性格。在米兰达身上，看来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他胸怀大志并坚定努力的结果；这也自然地表明了他早年取自自身、后来用于外界的伟大气质。他所处的世界可能是多变的，然而，不管是一帆风顺还是身处逆境时，他都初衷不改、岿然不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目标。他按照时尚，也学会了崇拜古代，几乎象信奉宗教一样地坚信，要像古人、像罗马人一样地生活，要用这个思想来统率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但是，感情上的矫揉造作(这是当时的另一种时尚)没有对他产生影响。米兰达与众不同，他在任何方面都表现出极强的个性，都要自己拿主意，别人休想左右他、摆布他。能够激起他热情的只有两件事：知识和自由。对他说来，尽管他艺术知识多得惊人，艺术也仅是一些知识而已。音乐是例外，他曾热情地投入音乐活动。也许音乐是可以使他在苦思冥想中得到安宁的一种慰藉。

米兰达的藏书极其丰富。其中有他用来学

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的字典和语法书，数学和军事专著。地理和历史著作等。而引人注目的还有关于英国历次革命和俄国历次革命的书。然而，其中也不乏文学著作。维吉尔的著作一直是他最喜欢读的书之一，30多年后他向委内瑞拉进军前夕，他告别了美国总统杰斐逊，在给他的信中抄录了这位拉丁诗人宣布世人将重新和谐幸福地生活的诗句："让最先进的理想世界降临人世吧……。"这算不算是比美洲出现共和主张还早的呼声呢？

米兰达如饥似渴地学习并非单纯想获取知识。那时人们认为，思想丰富了，人的性格就会完美。人们也希望各国人民在脱离愚昧之时也能摆脱把他们引入歧途的种种偏见和有害情绪。人们效法古代贤人，重新认为公务生活和私人生活是不可分割的；在个人修养方面，理解力的培养和自我控制力应该相得益彰，达到自然的平衡。

人们从未抛弃这种竭力求全的思想，但是仅仅在18世纪末它才重新发挥了昔日最辉煌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这一思想已从少数几个哲学家的头脑中解放了出来，似乎可以成为所有

人的思想。

1772年，米兰达花8千比索买了一个上尉军衔。这种买荣誉、职位和头衔的做法在当时各国都普遍实行，并且在英国买军衔的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米兰达买了上尉徽记决不是为了轻浮地向人们炫耀，也不是为了守着它养老，而是从中获得新的动力，寻找机会率先行动。他在1774年6月要求上级给他一个能让他“发挥积极性和干劲”的工作岗位，理由是他在军事、几何、地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方面都有丰富的知识。同年末，他获准作为志愿人员参加抵抗回教徒的梅利利亚保卫战。

这是一次血火洗礼。米兰达利用这次机会向上级显示了他的胆略和勇气，他这样做或许也是为了考验自己。但是他也暴露了缺乏耐心和自以为是的缺点，因而开始给自己树敌。在梅利利亚保卫战后，米兰达马上又要求建立一支由参加过这次战斗的军官组成的特别队伍接着去攻打阿尔及尔。尽管他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没有被采纳，而他个人却参加了1775年的阿尔及利亚海岸登陆战。西班牙军队被击溃了，米

兰达的两腿被三颗子弹击中，另一颗子弹打碎了他手中的滑膛枪，但他却奇迹般地死里逃生。

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因这些英勇的事迹而获得晋升。官方只是在一份关于他的部队的报告中承认他“确有胆略，十分努力并能干可信但应更加谨慎”。最后这句是又一次赞扬他那种说干就干的闯劲呢，还是一次含蓄的指责？他的雄心和主动是否已惹人讨厌了呢？

他的雄心和主动精神是无法否认的，但他又受到陈规陋习的束缚。可以想象这两者的矛盾会使这位血气方刚的土生白人感到不耐烦，以至可能产生反感。因此他的上级后来曾屡次在报告中既给予他新的赞扬，又对他不服从上级和其它不轨行为进行严厉指责。

于是，米兰达的思想开始了连续不断的斗争。当他在庸俗习气、徇私枉法和卑鄙嫉恨的环境中举步维艰之时，他的清高及优越感有时表现为妄自尊大和蔑视一切。

幸好米兰达在经历了几年这种令人绝望的坎坷遭遇之后终于在1780年遇到了一个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机会。那年，西班

牙联合法国帮助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争取独立，在加的斯组织了远征军，米兰达也要求参加。然而，这位委内瑞拉人又一次不得不面临很尴尬的处境，因为实际上他仅仅是作为“阿拉贡团的一个超编人员”才得以登船随军行动。而同年6月他实际上已担任了这支部队的首脑。

米兰达所在的部队在路易斯安那都督贝尔纳多·德·加尔韦斯的指挥下，攻打了巴吞鲁日、纳齐兹和莫比尔等边界地区的英国属地，包围并攻克了彭萨科拉。不管米兰达当时是否在这几次战斗中指挥了美洲的志愿人员，他确实按照自己的意愿跟胜利者一起进入了夺占的城市。

当时米兰达已被任命为胡安·曼努埃尔·德·卡希加尔将军的副官，这在当时是他事业上和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卡希加尔在若干年前任“公主团”的上校时曾是他的首长，给予了他父辈的关怀。卡希加尔作为古巴都督指挥了配合攻打彭萨科拉的远征。米兰达被提升为中校，这是嘉奖他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此时已是1781年，也就是说这位美洲青年是在经过了长期的努力之后才获得这一军衔的。

可是米兰达最重大的收获是取得了他那位不同寻常的首长的绝对信任。有人因他得宠而暗施诡计企图加害于他，但他却得到了首长的坚决保护。

凡夫俗子和妒忌之徒缠住他的双腿。或企图爬到他的背上，米兰达后来总是遇到这样的命运。这是对这个傲气十足的男子汉的嘲讽性的惩罚。他可以不为危险和逆境所动，而别人软弱无力的或鄙俗的小人行径却能使他怒火万丈。

那些阴谋诡计一时还不能十分影响米兰达的晋升，因为他是在卡希加尔身边参加了攻占巴哈马群岛的战斗，并晋升为上校。但是这位骄傲的加拉加斯人不愿在阴谋和纠葛中浪费自己的时间。他决定退役。他写信告诉了卡希加尔，并说明了他为之献身的伟大事业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说："……这不仅是为了避开有人企图施加于我的凌辱，而且也为了着手实行到国外进行几次旅行的计划。您知道，战争结束之后我一直就有这个打算，我曾为此预先用心学了欧洲的主要语言……。这些初步工作，这颗我生平30年来用了极大的努力和费用播种

在我的思想里的种子，如缺乏适时培育，必然会一无所获。”他像同时代的伟人们追求包罗万象的知识一样，认为“亲自访问组成世界的各个最文明最有道德的国家，精心研究它们的法律、政府、农业、治安、商业、军事、航海、科学、艺术等问题，……用这样的办法从世界这本巨著中吸取经验和知识，才能催熟果实，才能以某种方式完成培养出坚强有用的人才的伟大事业。”

但是，卡希加尔担心米兰达的决定意味着与西班牙政府最后决裂，于是他回信说：“祝您顺利实现您的计划，但是请您凭着我的友谊和亲切的感情听我说一句话，即在我从马德里通知您事情的结果之前，您不要做出决定，也不要一下子改变您的抱负。”

卡希加尔对米兰达如此关心，对他非常器重。他坦然承认米兰达“知识丰富，学习锲而不舍，定会给国家带来好处”。他提醒米兰达说：“您遇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世上凡是杰出的人通常都有这种经历。”

米兰达从非常年轻的时候起就认识到西班牙的落后。他在西班牙的旅行日记的最初几页

上就多次表现出他的这种感受，“不幸的王国”、“不幸的省份”等等。他也知道，他的这种态度已使他成为国家的不忠之人。然而不久，他的不满情绪开始变成争取祖国解放的切实计划。

米兰达离开西班牙以后所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他是去继续进行造就自己的“伟大事业”的。他在人们致力于革新的气氛中，更加感到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他在精神上明显地得到了新的动力。战场、工事、司法体制、各国政府结构、农业开发以及公共教育等，对所有这一切他都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加以观察。他热情满怀，甚至把自己看不大惯的相当古老的习俗也描述得富有诗意。他在一次公众宴会上看到官员、平民和上层人物大家都聚到一处同吃肉同喝酒。他指出：“如不是亲眼所见，就不可能想象出这种最民主的聚会，也不可能相信希腊的诗人和史学家向我们讲述的那些有关希腊自由人民的故事。”

但是，他最感兴趣的是对人进行观察并抓住任何使这些人成为杰出人物的奥秘。而几乎所有人都对他表示尊敬以至钦佩。他被人们称

为“知识渊博的外乡人”、“聪明的旅行家和能够看到一切、能给人教益或增加人类尊严的准确的观察家”。

费城给米兰达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称它为美丽、自由的商业城市。他在那里认识了华盛顿并与他共进晚餐。也许是米兰达期望这次不寻常的会见的心情太急切了，他对这位北方的解放者反应冷淡。他认为“美洲俊杰众多，他们用品德和才干缔造了伟大而又复杂的独立事业”，但把一切荣誉归于华盛顿一人，这是“离奇而又不公正的剽窃”。他最后说了对华盛顿的冷冰冰的看法：“他举止谨慎，沉默寡言，无甚表情；然而他又态度温和，十分稳重，让人感到尚能相处。”

据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著者注）本人后来说，米兰达同他经常交谈南美洲的解放问题。这位北美的政治家是一位知识渊博、举止文雅、思想解放的人，在这点上与米兰达很相似。但是他们两人接近另有原因：在生活上两人都有强烈的贵族气派，都不能容忍平庸和愚蠢。尽管两人都热爱自由，但由于性格上的深刻原因，他们一直不能

与他人融洽相处。

米兰达还同塞缪尔·亚当斯进行了多次交流，并热烈讨论了美国宪法，表现出鲜明的米兰达特点：其一是在根本原则上重视财产超过了重视品德；另一是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类的一项权利，但是排斥了非基督教徒承担任何立法和议会的工作。

要在南美大陆发动一场革命来实现民主、自由、博爱的理想何其难。教会将如何反应？特权阶级又将如何反应？考虑到南美大陆的居民分散在广大的地区，上述问题以及其它一些使米兰达感到不放心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即使是加拉加斯和波哥大这两个相隔很近的城市，进行联系也要数月之久。如果无法为若干个最重要的城市同时起义进行长期准备，那么个别起义必定会在短期内遭到任何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镇压。也许需要一个先驱者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在整个大陆播下自由的种子的艰苦事业。

进行革命，光取得军事胜利是不够的。必须在军事胜利之后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在打倒暴君和建立民主之间还有着一段长长的距

离。米兰达多次思索这个问题，寻找一个能告诉他美洲在军事胜利后将会发生什么的答案。但他没有找到答案，也没有找到任何可靠的解决办法。

尽管米兰达在美国结交了一些上层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为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奠定了基础，但是当他1784年12月前往欧洲的时候肯定没有料到，此后十年里，他的命运竟然使他成为历史前台的风云人物。他更不可能想到，这件事竟不是发生在他一直注视着美洲，而是发生在欧洲，发生在当时同他的计划和感情偏爱最格格不入的国家——法国。

漫游欧陆，沙俄奇遇：米兰达是“风流女皇”的又一位情人吗？

在旅途中，米兰达利用乘船的时间阅读历史和哲学著作。而在整个遍游欧洲的旅行中，他一直都受到西班牙政府的监视、阻挠和迫害。在英国时，虽然米兰达拜访了西班牙驻伦敦公使馆，西班牙公使也回访了他，但这位委内瑞拉人很快发现他已经被西班牙政府的特务

盯梢了。西班牙公使和他的特务们对马德里的宫廷是这样描述米兰达的：他“聪颖智慧，识别力很强，才智过人”，是一个热衷于自由并有能力参与反对西班牙帝国的“任何大胆计划”的人。他们还说，最好是把米兰达保存的文件偷来烧掉，只是慑于英国的法律以及米兰达开始同一些很有影响的人物来往，他们才没敢这样做。到了年底，当米兰达开始成为当时尚不为人所知的一个大陆的令人不安的代表人物时，一家很有影响的英国报纸对他有这样的描写：“在伦敦有人向我们断言，现在有一位十分重要的西班牙美洲人，他博得他的同胞的信任，正在追求成为本国解放者的光荣。他是一个具有崇高思想，有深邃理解力的人，他通晓古代和现代语言，博闻强记，深谙世界。他研究政治已经多年，研究过各种类型政府的起源、发展和消亡，研究过人们结合为政治团体并加以维持的条件，也研究过政治团体的解体和被别的团体吞并的原因。这位先生访问了美国各州之后来到英国，他把英国看做自由的祖国和学习政治的学校。我们是维护自由的，所以不便对这位卓越的人物作更详细的描述。”

此外，米兰达还结识了两个人，他们后来成为他最忠实的朋友。一位是名叫约翰·特恩布索的英国商人，他于1777年同几位朋友一起访问过加的斯，在那里受到当时还是上尉的米兰达的关照。另一位是约翰·亚当斯的女婿和秘书威廉·S·史密斯上校。当时，亚当斯是美国驻英国的公使，后来于1797年继华盛顿之后当选为美国第二届总统。而他的女婿史密斯则在纽约就认识了米兰达，这位委内瑞拉人给他留下了令人崇敬的印象。

米兰达的自1785年开始的旅行持续了差不多四年，一直到1789年6月。根据他的日记中依次记载的路线，这次旅行包括荷兰、普鲁士、撒克逊、奥地利、匈牙利、威尼斯、博洛尼亚、佛罗伦萨、比萨、罗马、意大利南部、希腊、埃及、土耳其、俄国、瑞典、挪威、丹麦，重返荷兰，还有德国的几个城市以及瑞士和法国。

米兰达的这次环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俄国受到的款待。他受到叶卡特琳娜女皇的这般赏识，以致传说这位委内瑞拉人曾经是这位永载史册的“风流女皇”的情人。叶卡特琳娜二

世确实是以“风流女皇”著称于世的，然而这次却很可能仅仅是传闻。更为可信的应该是，米兰达以其个人魅力、智慧和知识征服了女皇和她的宠臣们，使他们对他另眼相看。众所周知，女皇同她的所有天资高，有才智的同代人保持通信联系并为此感到自豪。米兰达是一个开始为欧洲所熟悉的大陆的杰出代表，而且他本人也立志从事解放事业，所以女皇愿意同这样的人物建立某种联系是很自然的。米兰达可能同她谈论印加人的故乡，也可能向她介绍了华盛顿和亚当斯的情况，讲述美洲的热带地区风光以及他同北非摩尔人的战斗；或者给她朗诵荷马的诗并用他刚刚在希腊的经历和见闻同这些诗作对比；还可能回忆罗马元老院并评论英国的议会。这些都足以令那位有着难以遏制的求知欲的女皇着迷倾倒。

当然，无论是米兰达还是叶卡特琳娜都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对性的欲求。因此，查明这位极绅士的美洲人是否曾与“风流女皇”有过那样的风流韵事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即便叶卡特琳娜曾让米兰达知道她像母亲那样爱他，即使叶卡特琳娜有一次公然从自己手里递给米兰达

一个桔子而这种过分的亲密可能成为比喻她宠爱米兰达的象征，但有一些事实使人不相信关于他们两人的推测。

首先叶卡特琳娜同米兰达的亲密关系是由于米兰达采取主动才结束的。他决定要继续旅行，当时即得到他的保护人女皇的最坚决、最果断的友好表示：允许他穿戴俄国陆军上校军服，提供一大笔经费，给他写了介绍信让俄国驻国外的代表招待米兰达，保护他并"在必要时将自己的住所供他居住"。如果说叶卡特琳娜和米兰达是情人，那么女皇就很难甘心让她的情人在认识她七个月之后就离开她。作为女人或女皇，叶卡特琳娜都不可能允许米兰达主动出走并让所有人都知悉此事。

还应当考虑到，米兰达在谒见叶卡特琳娜以前，曾受到波将金亲王一个多月的破格接待。波将金曾用自己的马车带着米兰达参观他的领地和刚刚征服的克里米亚半岛，还把他带到了宫廷。如果说米兰达能以其个人魅力、智慧和知识博得亲王的善待，那么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同样的原因也使叶卡特琳娜对他热情相待呢？

为女皇看病的著名英国外科医生格思里也提供了证据，他证实米兰达是自愿离开俄国的。格思里写给他在爱丁堡的一位同行的信中一开头就说，“很难发现米兰达在古代和现代文化的哪一方面有欠缺”；他还说：“他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的问题对答如流，表明他在这些方面都是有过研究的……。女皇同他开玩笑时谈到宗教法庭使用的火刑，甚至邀请他留在俄国。这种荣幸是一个无论怎样卓越的军官都很难得到的……。波兰国王在米兰达最近去访问时也想认识他，并向他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简单地说，看来所有重视和关心知识的人对来到欧洲的第一位非常有学识的南美人都感兴趣。”

但是，只知道进行迫害而对其它一切都不感兴趣的西班牙波旁家族并未放弃其迫害逮捕米兰达的企图；就其同欧洲其它宫廷的关系和联系而言，他这一企图竟然没有得逞，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叶卡特琳娜不理会西班牙要求协助逮捕米兰达的无理要求，回答说，她器重米兰达是因为她本人直接了解到他的气质，这同他曾在西

班牙获得的地位无关；如果说这位上校已构成对西班牙帝国的威胁，那么“他最好留在俄国，因为这里（距西班牙）较远”。

米兰达再次向叶卡特琳娜告别，向她表示“除了目前关心伟大而重要的事业外，其它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愉快地为女皇效劳，报答她的恩惠。看来他说这些话是很真诚的，因为后来他一直是俄国和叶卡特琳娜女皇的热情捍卫者。叶卡特琳娜确实也没有因为这位有意思的旅行者的离去而停止对他的保护。这种保护甚至表现在让米兰达住在俄国外交官的家里这样的细微末节。女皇这种恒久的善意反过来也证明了她对米兰达的感情既不是出于轻浮的好奇心，也不是由于爱情；如果是前者，那么好奇心会由于米兰达的离去而消失；如果是后者，爱情就会变成怨恨和蔑视。

米兰达漫游欧洲的最后一站是法国。他到这样接近马德里的地方去是鲁莽的。人们多次提醒他，西班牙特务正在伺机加害于他，法国外交官也差不多总是同西班牙人一起迫害他。

但是，米兰达因渴望访问法国而抛弃了一切应有的谨慎。他使用梅伊罗夫的化名，持俄

国护照进入了法国。

那时已是1789年，但米兰达似乎没有注意到革命正在兴起。事实上，对多数法国人来说也是一样，就连那些被认为消息很灵通或十分善于判断形势的人也不例外。

不过，米兰达在巴黎当然格外注意到召开的全国三级会议以及紧接着发生的重大事件。1789年6月，米兰达到达英国首都。他很快同那些住在美国的朋友恢复了通信联系，并努力同可能对他的计划感兴趣的西班牙美洲人建立联系。同往常一样，他很快就获得了他逐渐认识的重要人物的支持。这样，米兰达便于1790年2月14日，即在他到达英国很短的几个月之后，就会见了英国首相皮特。他象往常一样谈吐自如；还参观了皮特的藏书，以判断这位政治家的文化修养，似乎他面前的人不是一位著名的首相。但实际上皮特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物。

米兰达向皮特提出了解放南美洲的庞大计划。这项计划的基本思想是，南美洲有自己的财富和居民，应该有权获得独立，而且它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独立，但是它需要英国的

帮助来牵制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因为南美洲国家在地理上彼此分隔，交通极不发达，不能相互援助。米兰达设想中的称为哥伦比亚的新国家，将包括除巴西以外从密西西比河到合恩角的广大地区；根据米兰达的计划，应当成立一个“像大不列颠那样混合形式的”国家，由一位皇帝或印加王主持政府工作，组成两院的议会，其中一院由人民选举产生。米兰达认为英国如能提供12 000～15 000名步兵和15艘军舰，就是对他这一事业的极大贡献和支持。他保证，新国家将及时偿还这些援助；将同英国商定一项互利的通商计划；将在巴拿马地峡开凿运河，以便于欧洲同太平洋地区及远东的海上联系；等等。

此事确实十分美妙。只是英国并不希望在任何大陆出现强大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皮特对解放和教育一般老百姓也毫无兴趣。那个“计划”太“平等”了，而英国则只习惯于在它的冒险中以最小的风险和代价来换取最大的好处和利益。

从那时起，英国已经开始推行一种按照它同西班牙关系的需要鼓励或遏制米兰达的政

策，所以米兰达同皮特的会谈是注定要失败的。当米兰达最后得知这位英国人不会采纳他的计划时，他惊呼："（英国人）为了同西班牙达成一项贸易协定，把我出卖了。"

在英国寻求不到帮助，米兰达决计前往法国。法国的革命原则具有世界影响，它应该乐于同米兰达的南美洲计划合作。米兰达带着这种新设想于 1792 年 3 月到达巴黎，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同新政权的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如内政部长罗郎，外交部长杜莫列斯，巴黎市长佩蒂翁以及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布里索。佩蒂翁答应米兰达可以为他安排一个很优越的地位，他可以切实地做一些工作。

米兰达并没有在这种良机面前失去冷静和理智。他如实地提醒法国新的政治领导人注意他的外国人身份。米兰达同佩蒂翁和国防部长塞尔旺再次会晤后，在给塞尔旺的信件中明确提出要他接受建议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给予他陆军中将的军衔和薪俸；战争结束后让他担任能在法国过舒适生活的文职或军职；允许他自由地从事解放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工作。他写道："西班牙美洲的事业必须受到法国的有效

保护，因为这也是自由的事业，要允许我主要用解放本国并使之独立的行动为它的幸福出力……。”

在同塞尔旺和海军部长蒙热共餐时，他们最后达成了协议；1792年9月5日，米兰达收到了被任命为已由杜莫列斯将军指挥的北方军中将服役证书。

米兰达担任新职的时间很短。杜莫列斯以及一般说来当时所有军人和政治家的经历也都大体如此。在那个时代，些微的失败就要人们付出名誉扫地和死亡的代价。米兰达不只是幸存下来了，而且巴黎人民最后还热情地肯定了他因最初的胜利而获得的荣誉。他是最幸运者之一。

1798年，米兰达离开了法国，来到英国专心致志地筹划解放西班牙殖民地的事业。米兰达在伦敦进行着他作为革命先驱的工作，他要在思想上为这一崇高事业作准备，他必须按事业所需成为坚韧不拔和忘我精神的典范。

法国革命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恐惧和憎恨，因此，即使在英国，自由思想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害。自由思想在整个美洲甚至西班牙本

国的传播都是由许多秘密团体进行的。米兰达在伦敦成立了“美洲大同盟”，它的成员自称“理性的骑士”。在美洲成立了名为“劳塔罗”的一些下层组织，几乎所有独立事业的先驱者和许多解放者都曾是秘密组织的成员。由于米兰达在伦敦的革命准备工作，所有西班牙美洲的解放者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他的教育，学习了他的榜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10年玻利瓦尔、洛佩斯·门德斯和贝略来到伦敦向先驱者报告委内瑞拉已宣布自治，正期待着他回国之时。

整个西班牙美洲就这样进行了解放事业中最困难的工作，即各地必须同时采取最初的行动，以便向西班牙和世界表明革命正在兴起。由于米兰达的工作，各地在思想上均已有了准备。与此同时，重建美洲的基本原则也得到了肯定：西班牙美洲国家要互相团结；建立既无雅各宾特色也无拿破仑格局的社会制度。此外，米兰达还明确提出，“决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干预我国内政，否则西班牙美洲就会受到企图瓜分其领土的任何其它海上大国的吞并和掠夺”。米兰达不厌其烦地对所有接近他的人重

申这一主张。

先驱者回来啦：又一个“唐·吉诃德”？

米兰达在欧洲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他给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玻利瓦尔对这位先驱者是有所耳闻的。但玻利瓦尔也没有确切地了解米兰达关于解放大陆的思想。1806 年 8 月，米兰达率领买来的一艘军舰和两艘纵帆船以及招募的 200 人的雇佣军，在美国的帮助下启航出发，准备去解放美洲大陆。然而这次唐·吉诃德式的壮举，其实在还未开始时就注定是要失败的。这的确是一次唐·吉诃德式的冒险，不过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而已。因为米兰达是一个善于思考、意志坚定的人，他的决心不是出自绝望，不是为了泄愤，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不是一意孤行。他孤注一掷，在当时讲，是自愿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证明自己说话是算数的。才能证明他知道要为许下的诺言而捐躯，才能证明他所答应和所要求的一切都是真诚的。动荡不定的

国际形势要他等待，他在英国的处境要他等待，他肩负的职责也允许他等待，但是他已接近暮年，如果不去为他的理想献身，他就没有机会并将终身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米兰达还具有一种唐·吉诃德式的能力，那就是改变外部环境，并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办法加以适应。在船上他就是用这种能力来对待周围那支杂乱的部队，就象他在伦敦的藏书室里教育那些优秀的学生，使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美洲的解放者一样。

但是，西班牙派驻美国的公使监视和敌视米兰达，并在得悉他的远征军出发后，立即加紧活动。他向墨西哥总督、古巴都督和委内瑞拉的军政长官发出警报，向华盛顿政府提出了抗议，马德里王室驻巴黎的代表也就美国对米兰达的帮助提出了抗议，美国总统杰斐逊和国务卿麦迪逊不得不否认向米兰达提供过援助。总之，那支船队没有后盾，所有的人都对它采取中立或敌对的态度。一个世界将在米兰达怀中诞生，当他在以他的儿子命名的“莱昂德罗号”军舰上亲手升起这个世界的第一面旗帜时，他身边没有一位有资格同他一起载入史册的西

班牙美洲人。

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委内瑞拉卡贝略港同西班牙海岸警卫队的遭遇战中，两艘帆船被俘获；米兰达前往英属安的列斯群岛求援，在特立尼达得到一些增援。但是，当他在科罗海岸登陆时，发现沿岸地区荒无人烟。没有人读他的宣言，没有人听他演说。西班牙人把米兰达说成是异教徒、雅各宾派和英国政府的间谍。委内瑞拉人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对米兰达产生了很深的误解。所以米兰达的这次远征是孤零零的、无人响应的一次失败的尝试。委内瑞拉的自由之树还很稚嫩，还需要时间，还需要等待。1806 年 13 日米兰达离开委内瑞拉，先去特立尼达避难，后来回到了英国。

1810 年，拿破仑军队侵占西班牙的消息传到了委内瑞拉。1810 年 4 月 19 日，加拉加斯的市民们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赶走了西班牙都督，建立了独立的“洪达”——市议会。他们包揽了原来殖民政府的一切权力，并改名为“维护费尔南多七世权力最高执政委员会”。

尽管他们以这种方式提到了这位已退位的国王，但 4 月 19 日无疑是革命的开端。他们决

定要建立一种制度，行使已经归属于人民的自主权利，人民将参与行使最高权力。

玻利瓦尔和他的哥哥胡安·维森特·玻利瓦尔并没有参与4月19日的革命，因为这年年初发生过一次流产革命，他们已被放逐到首都以外的地方。尽管如此，玻利瓦尔仍十分怀念4月19日的革命。在1820年纪念这一事件10周年的时候，他向自己率领下的争取国家独立的美洲起义军发表演说指出："今天是隆重纪念解放事业10周年的日子……。10年前的4月19日，哥伦比亚诞生了。"

虽然玻利瓦尔兄弟没有直接参与4月19日革命，但由于他们的声望地位以及财富，"洪达"是绝对不能对他们视而不见的。玻利瓦尔虽然成为新政权的一员，但他却不能效忠于已被废黜的费尔南多七世，他秘密地同主张完全独立的一小部分人接触并建立了联系。

这时候年轻的西蒙·玻利瓦尔引起了人们的疑惧。因而4月19日事件之后，玻利瓦尔立即要求派他到伦敦去争取英国政府给予支持或保持中立。最高执政委员会勉强接受了这个请求，因为它的许多成员以及积极参加这一运动

的其他一些人对玻利瓦尔没有好感。但由于玻利瓦尔能支付代表团的全部费用，而国库却没有钱，因此他们不得不接受玻利瓦尔的建议，派路易斯·洛佩斯·门德斯陪同他，因为他们更相信后者的经验和能力。而玻利瓦尔后来则确实违背了执政委员会不让他与米兰达接触的明确指示，努力促使米兰达返回委内瑞拉。这是朝着同西班牙决裂的方向迈出的又一个决定性的步骤。

而执政委员会还是把玻利瓦尔晋升为民卫团步兵陆军中校、名誉上校，对这位并无军事经验的年青人来说这已经是一个不低的头衔，而按西班牙传统要服役多年才能得到这种晋升。实际上玻利瓦尔只是得到了一个挂名的、点缀性的头衔。但对他这却成了最后一个头衔，因为他自愿抛弃了保护他的特权制度，走上了坎坷的革命道路。在他以后通向荣耀的每一步里都要留下他历尽艰辛的脚印。他当了总司令后，有时还不得不象无名小卒那样在灭绝战的尘埃中挥舞长矛进行战斗。他无数次地克服了动摇和战胜了困难，他付出了更加艰巨的努力，在精神上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但他历尽

艰辛登上顶峰的时候，遇到的却只是孤独和痛苦。

英国和西班牙结成反法同盟来反对拿破仑，玻利瓦尔三人在英国一无所获。但他们请回了米兰达这位革命元老。1810年12月，米兰达自委内瑞拉拉瓜伊拉港登上祖国的土地，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他身穿法国将军服，胸前挂满闪闪发光的全部勋章，头戴蓝色三角帽，风尘仆仆地走上岸来。他这种形象未免有些太引人注目，但无疑充分地体现了他辉煌的过去。

米兰达因为他的资历和威望，虽屡遭西班牙政府的诬谄以及各种小人的嫉妒迫害，但始终没有倒下。现在，他被任命为新政权的委内瑞拉军队总司令，全权负责军事行动。

1811年3月2日，委内瑞拉最高执政委员会召集的议会开幕。7月5日宣布委内瑞拉独立，7月14日庄严宣布了独立宣言，在加拉加斯升起了第一面委内瑞拉国旗，新国旗是由米兰达设计的红、黄、蓝三色旗，红色表示爱国志士洒下的鲜血，蓝色表示他们事业的崇高目标，黄色表示南美洲的土地。委内瑞拉第一共

和国诞生了。

米兰达和玻利瓦尔这两位一老一少但同样伟大的人现在终于一起合作共事了，但悲剧却最终在他们两人之间发生了。作为先驱者的米兰达在玻利瓦尔年轻的心中有着崇高的地位，那是一个青年通常奉献给他的偶像的圣殿。但或许是由于经历不同，或者是因为性格迥异，或许也只是天意，米兰达和他的崇拜者从一开始就没能很好地相处。失望与无法理解和不信任的情绪在他们之间迅速蔓延，而这种情绪就象迅速扩散的癌细胞一样，是足以毁灭任何崇高伟大的友谊和合作的。

世间最沉重的镣铐

米兰达虽身为委内瑞拉国家军队的总司令，但对他统率下的这支军队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满意和引为自豪。共和国的军队不是正规精干的职业军，而是临时征召的民卫部队。纪律松驰，缺乏训练，供给不足，很难说具有什么战斗力。米兰达过去在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欧洲军队中服役多年，他对自己手下的这样一

支军队感到灰心丧气，对他手下包括玻利瓦尔在内的年轻军官们同样毫不信任。因为这些军官中大部分碌碌无为、能力很差，他们唯一的一点可怜军事经验是在作为皇家士官生时取得的。一次，在玻利瓦尔举行的一次晚宴上，米兰达以嘲讽的口吻对玻利瓦尔说："你现在是上校。我是参加了几十次战斗后才获得这一军衔的，可你一次仗也没有打过。"

玻利瓦尔当时作为宴会的主人，克制了自己的不悦，但他无法忘掉米兰达的这些话。他的另一个崇拜的偶像开始动摇了。没过多久，米兰达又责怪玻利瓦尔不该在军队面前炫耀自己的马术，他们之间的不和进一步加深了。

当时新生的共和国处境十分困难。西班牙摄政当局仇视它，并已下令封锁其海岸；可预见到拿破仑在完全征服了西班牙本土后，就会腾出手来对付西属美洲殖民地；科罗和马拉开波这两个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委内瑞拉西部和出海通道的城市，一直控制在率领着富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的西班牙将领手中；东南部的圭亚纳在宣布拥护共和政权不久，也落到了保皇派手中。西班牙海军中校多明戈·蒙特维尔德从

波多黎各率领一支正规军增援科罗的保皇派，并奉命开向内地，进攻新共和国。

这时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共和国又遇到一次最大的灾难，几乎将其送进了坟墓。

1812年3月26日下午，一次地震几乎毁了半个国家，而这正发生在共和国控制的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而西班牙人统治下的城市在地震中都安然无恙。独立运动的敌人当然赶紧宣传这场灾难正是老天爷对这几个省造反的惩罚。情绪激昂的西班牙教士走遍断壁残垣之间，呼吁人们表示忏悔并服从国王；很多土生白人和非教徒就真的跪在地上高声忏悔。

大地开始震动时，玻利瓦尔正在城里。他马上跑到街上指挥抢救。但是在一个广场上，他突然看到数百名幸存者跪在地下祈祷，一个神甫在痛斥他们，说地震是上帝对他们背叛费尔南多国王的惩罚，使这些人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恐惧。玻利瓦尔勃然大怒，因为正需要这些人去抢救被压在废墟之下的灾民。他命令几个士兵把这个蛊惑人心者抓起来，然后跳到教堂的废墟上，大声喝道："如果大自然作对，我们就同它斗争，一定要它服从我们。"

尽管玻利瓦尔有这种人定胜天的坚定信念但现在却无法挽救共和国的崩溃。蒙特维尔德指挥的军队步步进逼，危急之中共和国授予米兰达独裁权，统率政府和军队，竭力拯救共和国。

米兰达可能是踌躇满志地来对待这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信任的，但他无法改变外部世界，也无法改变人心，况且，他掌权的时间很短，大概仅仅两个月。不知为什么，大敌当前的时候，他没有让玻利瓦尔统率主力部队开赴北方去对付蒙特维尔德，而是交给他一项显然很次要的任务，守卫卡贝略港。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座巨大的堡垒，里面关押着一批西班牙俘虏，还储存着委内瑞拉军队几乎全部的军火装备。

这一任命深深伤害了玻利瓦尔那极强极敏感的自尊心。他到达卡贝略港后，把守卫堡垒的任务交给了一个下级军官，却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市政厅。米兰达率主力去迎击蒙特维尔德。起初，玻利瓦尔还获悉他占领了拉维多利亚市。但从此部队似乎就停滞不前了。米兰达没有乘胜追击蒙特维尔德的部队，却设立了几

个新的司令部，分兵把守、按兵不动，开始同军官们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而在卡贝略港，玻利瓦尔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不管正确与否，他从不优柔寡断。

1812 年 6 月 30 日，一个叛徒煽动卡贝略港的一部分驻军叛乱，释放了保皇派的俘虏，占领了城堡，进而控制了整个城市。玻利瓦尔集合起 250 名士兵和部分居民发起反击，但彻底失败了。他向米兰达求援，在没有得到援兵时，坚守城市四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只得与身边少数几个军官逃出城市乘船去拉瓜伊拉。

形势已无可挽回。当米兰达在拉维多利亚获悉卡贝略港失守时，大叫道："委内瑞拉的心脏受了伤。"于是，他凭借仅有的部队同蒙特维尔德进行了谈判。他的代表们同保皇派的代表们达成了一项协定：所有人的生命财产都将受到保护；任何人不得因其信奉的主张而遭逮捕和审判，不得没收其财产；给愿意离开国家的人和在 3 个月内要求出国的人发护照；释放双方战俘。这就是 7 月 25 日在许多富有的土生白人坚持下米兰达同蒙特维尔德签定的投降书的

基本内容。但据谣传，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将给米兰达一笔钱，并允许他离开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认为米兰达背叛了祖国。

当时不仅玻利瓦尔持这种观点。7 月 30 日晚，玻利瓦尔和一批土生白人军官获悉米兰达就住在拉瓜伊拉港的司令部宿舍里，准备第二天乘船离境。他们冲进了司令部当米兰达还在另一个房间睡觉时，他们已对他作出了判决。玻利瓦尔主张以叛国罪处死米兰达，但他的意见没有被接受。然后，他们走到米兰达的房间门口。米兰达被外面的嘈杂声惊醒，看到他们时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他镇定地穿戴整齐，从容走出房间，被他的部下戴上镣铐逮捕起来，交给了港口的西班牙军队。但就在这个时刻，他仍然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和风度，没有丝毫的恐惧和惊慌。

在委内瑞拉关押了一段时间后，米兰达被带到波多黎各，后来又被押送西班牙，关在加的斯郊外的一座监狱里，一直到1816 年中风去世。在被监禁的 4 年中，米兰达一直不能忘却拉瓜伊拉那个使他心痛的夜晚。当一位同监的

难友问他身上的镣铐是否太沉重时，米兰达无限感慨地说："还没有象那天晚上在拉瓜伊拉给我上的镣铐那么沉。"

米兰达的牺牲并没有换来他所期望的结果。蒙特维尔德根本无视已签字的协议，任意对爱国者进行残酷迫害，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他和他的部下对无辜的平民百姓也不放过，百般劫掠蹂躏，连最柔弱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也未能幸免。人类的尊严遭到了最无耻的践踏。惨绝人寰的灭绝战开始了。

"解放者"：败走失城

在对米兰达进行了简短的审判并把他交给西班牙人后，玻利瓦尔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要千方百计逃脱劫难的普通人。他先在几个保皇派朋友的家里躲藏了几个星期。后来，这些朋友以他捉拿米兰达对西班牙有功为由，担保他可以自由离境。玻利瓦尔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落得无亲无友孤身一人，名声也因出卖米兰达而受到玷污。但是，他正经历着转变，而这种转变将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领袖。

当时，南美洲的其他殖民地也在纷纷宣布独立。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就是其中之一。委内瑞拉只是一个都督区，而哥伦比亚则是新格拉纳达总督区的一部分。这个总督区还包括巴拿马和厄瓜多尔的一部分。由于这块殖民地太大，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独立运动组织。好几个重要的城市已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政权，他们都在同西班牙人作战，但彼此之间又相互倾轧争夺。

1812 年 10 月，蒙特维尔德统治了委内瑞拉后，玻利瓦尔来到了新格拉纳达的卡塔赫纳。卡塔赫纳政府对玻利瓦尔的到来表示欢迎，可是军队司令对他却不信任。玻利瓦尔被派往遥远的马格达莱纳河边巴兰卡市，他得到的命令只是守卫城市，而不许开展其他活动。玻利瓦尔手下只有 200 名黑人士兵，其中大部分没有军服，仅仅有一些木制长矛算是武器。玻利瓦尔却没有气馁，他立即开始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并从城市附近的热带丛林中又招募了一大批黑人士兵。

正如他的特点那样，玻利瓦尔又一次自己在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时大胆行动。当他认为

部队已训练成熟以后，即率领他们乘一种叫作“篷戈”的独木舟沿河逆流而上，打夜间偷袭战攻取了一个又一个的城镇。他的一系列胜利也使他免遭部队的军法处置，在得到政府的直接命令后，他继续向前进攻。随着玻利瓦尔不断向内地推进，一批批起义的部队纷纷前来投奔他，他的部队迅速扩大了。

1813 年 2 月 13 日，玻利瓦尔的部队已到达靠近委内瑞拉边界的库库塔城。这个城市由西班牙军队重兵防守，是一个边境重镇，进军委内瑞拉的必争之地。玻利瓦尔下达了攻城的命令，激战 4 小时，战局仍扑朔迷离、胜负难料，而此时玻利瓦尔部队的弹药却已耗尽，马上就将无弹可发了。危急时刻，作为军事指挥官的最宝贵最卓越的一种才能在玻利瓦尔身上体现出来了。他没有采纳部下军官撤退的建议，而是下达了相反的命令。出奇制胜，敢于用险，险中求胜。部队发起冲锋，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好像他们已取得了决胜的优势、后面大批援军已到。西班牙军队既为他们的气势吓倒，又为其进攻迷惑，以为他们真的有强大增援，于是马上弃城而逃了。

玻利瓦尔自己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已具备了这样的才干：指挥若定，迅速判断时机、正确地相机制订计划并大胆实施。玻利瓦尔已经成长为一位军事家了。

库库塔城的攻克使哥伦比亚的一大片领土得到了解放。玻利瓦尔决心用他指挥下的这支胜利的军队越过边境去解放委内瑞拉。但许多哥伦比亚士兵不愿在别国土地上打仗。玻利瓦尔对他们的牢骚没有理睬，而是召开军官会议下达进军命令。

许多军官面有难色但没有说话，只有一位刚满 21 岁名叫弗朗西科·坦德的年青上尉勇敢地起来反对："我决不在委内瑞拉的土地上指挥哥伦比亚的士兵。"

玻利瓦尔转身面对这位青年，沉默着拔出手枪放在桌上，然后冷冷地说："你一定得去，否则，不是你打死我，或者更可能是我拿起手枪打死你，二者必居其一。"

两人四目相对静静地逼视着对方僵持着，其他军官则屏息静气呆坐着。桑坦德是位严肃勤奋的青年，学过法律，但没学过军事。最后，他的目光先垂了下来。他后退一步，站到原地，

表示服从。玻利瓦对反对他的人是很少留情的，但这次很奇怪也很例外。似乎他对青年上尉的勇敢和直率很感钦佩。不久他就把桑坦德提升为上校。最后，桑坦德成为玻利瓦尔的一名亲信军官。

玻利瓦尔率军越过边境进入委内瑞拉，开始时只遇到了小规模的抵抗。委内瑞拉到处是一片悲惨荒凉的景象，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蒙特维尔德在同米兰达签订的停战协定中曾保证不进行报复，但这只是一纸空文。他的士兵肆意烧杀劫掠，残害人民。有些城镇的居民，包括妇女和儿童，都在帮助反叛者的罪名下或被砍去一只手，或被剁掉一只脚，或被割去一只耳朵而变成肢体残缺的人，有些更残忍无度的人竟以此为乐。一个西班牙将军曾以满满一袋人耳朵代替勋章授予了他的士兵。面对这种兽行，玻利瓦尔的军队也开始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地进行报复，以灭绝战对灭绝战。这样，这场战争更加血腥了。

每次战斗都使玻利瓦尔学到了宝贵的作战艺术。蒙特维尔德指挥部队以三角队形同玻利瓦尔作战，即让对方突破正面而隐于左右两面

夹攻的经典战术。玻利瓦尔则针对这种战法而将其部队分成两路，同时攻击敌人的两侧翼，使其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为使步兵能大量而迅速地机动接敌，他让步兵乘坐骑兵的坐骑、坐在骑兵后面将他们乘黑夜敌人无法发现之时运送到前沿阵地，以优势兵力而发起快速勇猛的突然袭击。所以往往在第二天清晨，蒙特维尔发现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已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前后两面，使他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

正当玻利瓦尔节节胜利、快速推进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来自哥伦比亚的紧急战报：自他率军攻入委内瑞拉以后，西班牙人在哥伦比亚卷土重来，正在攻城掠地，形势十分危急。但玻利瓦尔复信称，他在委内瑞拉已胜利在望，不能因返回哥伦比亚而前功尽弃。当时情况确实如此，蒙特维尔德和他的军队已退守卡贝略港。1813 年 8 月初，玻利瓦尔未遇任何抵抗地开进了加拉加斯。

人们站在街道两旁，热情地高呼："解放者！解放者！"这同玻利瓦尔在巴黎看到的欢迎拿破仑的场面一模一样。玻利瓦尔陶醉在人群

向他发出的热烈掌声和敬献的鲜花中，但他决心绝不像拿破仑那样当皇帝。根据殖民地时代的传统，加拉加斯地方议会经常能够代表全国采取行动。10月14日召开的一次特别市议会庄严地确认玻利瓦尔已经获得的解放者的称号，并任命他为共和国军总司令。西班牙人还控制着许多城镇，由玻利瓦尔创建的委内瑞拉第二共和国授予他战时全权，直到全国恢复和平为止。他保证："战争结束后，我将放弃我的一切权力为建立共和制政府而努力。"

形势波诡云谲、变化莫测，战局瞬息万变胜负难料。解放者在加拉加斯仅仅呆了两个星期就又重新披挂、再赴沙场。双方的正规军在拚杀，全国各地还出现了无数游击队，既有保皇派的，也有共和派的。

实际上，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始。由于革命在深入，以后共和国又陷落了，因而法定的政治秩序已全遭破坏。现在共和国将由那些获胜的军事首领来重建。这些人只靠个人的权力来行事。他们浴血奋战，把夺到手的土地称作共和国，但谁也没想到要颁布什么稳定的法律，除了作出某些规定以维持日常生活外，谁

也没想到确立更多的行为准则。

于是就出现了考迪罗，也就是军事独裁者。这种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他们手中有军队，自己有战功、有威望，割据的地盘内还有人民。所有这些条件可以使他们变得既让人恐怖又令人倾倒，可以使他们成为救星，也可以成为暴君，或者有时成为二者兼而有之的人。

这种社会现象，后来发展成了考迪罗主义。它是解放战争的副产品，最恶劣的考迪罗主义后来持续了几乎一个世纪，并成为重建西班牙美洲领地的最大障碍。

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变得对玻利瓦尔十分不利。蒙特维尔德联合了委内瑞拉的凶暴，未开化，喜怒无常，性格好斗的平原人，在他们的首领托马斯·博维斯的率领下，向玻利瓦尔大举进攻。玻利瓦尔取得了一次胜利，但博维斯能很快地再组织起另一支队伍。此外，过去俘虏的西班牙士兵太多了，他们哗变的可能性对玻利瓦尔已构成一种现实的危险，于是，玻利瓦尔下令枪毙了包括在医院养伤的在内的所有俘虏。

面对博维斯和蒙特维尔德的两面夹攻，玻利瓦尔被迫撤离加拉加斯。全城响起了报警的钟声，士兵们挨家挨户地通知居民把能带走的东西全带走。成千上万的人逃离城市，奔向东面250英里的巴塞洛纳。一路上，许多人筋疲力尽倒毙路旁或活活饿死，落在后面的人被博维斯的追兵杀害。有些人全家自杀，有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从路边的悬崖扔下去，宁愿眼看亲生骨肉摔死，也不忍看到他们被追兵们折磨残害。疲惫不堪的母亲们跪在路旁哭泣，双手举起自己的婴孩苦苦哀求骑兵们把孩子带走。这样一路之上，总共死了6千多人。

玻利瓦尔独自骑行，严峻的脸上毫无表情，好象没有看到这悲惨的景象。他那容易感情用事的青年时代已成为过去，现在不允许他怜悯同情。更重要的是事业，事业应该压倒一切。

巴塞洛纳也不安全，幸存者不得不继续逃到库马纳。当玻利瓦尔部下的马里尼奥和皮亚尔率援军赶到时已为时太晚，已抵抗不住追兵。在库马纳，玻利瓦尔把他能够搜罗到的金子和其它值钱的东西统统装到一只船上，同马

里尼奥·皮亚尔以及其他40多名军官一起逃往哥伦比亚。

玻利瓦尔过去曾将米兰达的这种行为视为背叛国家而谴责他，现在他自己终于亲身认识到这个道理：一个死了的领袖是无法拯救国家的，只有带着一切能得到的财富逃走，将来也可能会东山再起，解放祖国。而在中国，早有这样的格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又有2 000多年前的中国大军事家孙武子的兵法精华，最后一计："走为上"。

1814年9月，玻利瓦尔到达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哥伦比亚也在同西班牙苦战，国家由于纷争而四分五裂。1815年春，玻利瓦尔看到由于他的到来，这个国家更加动荡不宁，于是无可奈何地流亡到牙买加，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新大陆最伟大的土生白人"

美洲历史上曾有过三位伟大的解放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国父"华盛顿和西蒙·玻利瓦尔，而剩下的这位被誉为"新大陆最伟大的土

生白人"的解放者，实堪与前两位齐名。他保卫并巩固了阿根廷共和国，建立了智利和秘鲁共和国，开创了南美洲历史的新纪元。他在美洲大地上极有威望，尤为南美洲人民所敬仰，阿根廷、智利和秘鲁人民尊之为"国父"。

他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战术家，在军事上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但他之伟大，不仅在于他在战场上的丰功伟绩，更主要的是他淡泊名利、功成身退的高尚情操。他的这种高风亮节足令后世人将其奉为楷模。

他是谁？这个人就是何塞·德·圣马丁。

1778 年 2 月 25 日，何塞·德·圣马丁出生在阿根廷北部乌拉圭河畔的亚佩尤小镇。他的父亲是位西班牙军官，后来被任命为亚佩尤地区的地方长官。圣马丁的家庭属于当时的军人世系。他的母亲是位军人的女儿，父母双方的上几辈也是军人。何塞是全家 4 个男孩、一个女孩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哥哥们先后从军，家中也希望他继承戎马生涯的传统。

阿根廷在圣马丁出生的两年以前，即 1776 年才改为总督区。西班牙征服新大陆后的 200 多年来，帝国对这个地区唯一感兴趣的是它的

矿产资源。但阿根廷基本上是个农业国，沿海地区是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盆地，内地的草原一直延伸到西部高耸的安第斯山脚下。多年来西班牙一直实行一项劳民伤财的政策，规定阿根廷所有的出口货物都必须经位于太平洋沿岸的秘鲁的利马港装船外运。这些货物要经过三千多英里的路程，翻越六、七千米的安第斯山，才能运到利马。而欧洲奢侈品和工业品也由同样的路线进口到阿根廷，价格极高，一般人很难问津。

沿着阿根廷长长的海岸线，走私活动十分盛行。宽阔的拉普拉塔河河口，加上星罗棋布的小岛，为走私者提供了天然的理想避风港。运载走私货物的船舶也带来了外面世界的自由思想。多年来，阿根廷作为南美最不被重视的西班牙殖民地，逐渐成为最富有独立性的自由倾向的地区。1776年，拉普拉塔总督区成立，除了阿根廷的原有领土外，还包括巴拉圭和乌拉圭的大部分以及玻利维亚的一些丰富的银矿矿区，从此，这块殖民地繁荣起来。贸易往来已不仅限于通过利马转口，智利和玻利维亚的产品也开始经过安第斯山和阿根廷领土运到布

宜诺斯艾利斯，开辟了一条新的到达欧洲更近便的商路。仅仅几年之内，布宜诺斯艾利斯已发展成一个繁华的港口城市。但是这些来得太迟的变化已无法改变和动摇人民要求独立的坚定信念。

圣马丁一家只是目睹了这些变化的开始。他3岁时父亲奉调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8岁时，全家回到了西班牙。以后，全家5个在殖民地出生的孩子中，只有何塞重返阿根廷。

回到西班牙后的头3年，圣马丁在马德里古老的贵族子弟学校"贵族神学院"上学。他是位严肃、勤奋、认真的人，但由于太注重实际和脚踏实地，人们认为他不是出类拔萃的高材生。他在这所贵族学校只接受了最基本的算术和绘画知识，就遵从家庭的传统、学习哥哥们的榜样，在还不满十二岁时就申请从军。1789年7月，圣马丁佩戴上了穆尔西亚团士官生的肩带，开始接受真正的教育。同年同月，在法国，涌上街头的人群攻占了巴士底监狱，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

当时，西班牙早已国势衰微、威信扫地，却仍在竭力维持其世界大国的形象和地位。在

以后的25年中，西班牙几乎一直处于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先站在这边，以后又站在另一边。但无论与谁结盟，它都只能充当可怜的小伙计的角色。它企图依附于某一强国而得利的行动最后只给自己招来了更大的灾难。二、三百年以前西班牙曾有过最辉煌的时期，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要唯其马首是瞻，那是一个西班牙时代。但辉煌转瞬即逝，世界早已今非昔比。大国兴衰的运行法则终于无情地将西班牙抛弃了，只可怜它自己尚不自知。卡洛斯四世及其动摇不定的政府四处活动，力图拯救帝国于倾颓之中。而20多年来，圣马丁作为忠于国王的皇家军人，奉命转战各方。

他的第一次战斗经历是13岁时在非洲同摩尔人打仗，之后，又参加了负有入侵法国使命的兵团。由于在战斗中表现突出，18岁时就被提升为中尉。1796年，卡洛斯四世转而成为法国的盟友，圣马丁又服役于海军，在一艘战舰上同英国人进行海战。后来，拿破仑挑动西班牙发动了对葡萄牙的闪电战，圣马丁也参加了在葡萄牙的这次战争。

1803年前后，圣马丁短期驻留加的斯。从

征战转到驻防，使他能腾出许多过去从未有过的空闲时间享受自己的业余生活。他尚未结婚，也不太喜欢社交，于是就埋头读书，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集中攻读对他作为军官来说极有帮助的数学、军事理论、地理学和历史特别是军事史。

加的斯位于西班牙西南端，濒临大西洋，是一个热闹嘈杂的港口城市和去新大陆的通道。进港的外国船只不断带来世界各地的消息和外国思想的影响。各殖民地富有的土生白人前往马德里或返回殖民地也都经过加的斯。虽然拥有矿产资源和种植园的土生白人向卡洛斯四世提供了维持军队的费用，但他们却得不到西班牙公民的地位。在殖民地，他们要交纳沉重的赋税，要听命于西班牙派来的政府官员。在西班牙本土，他们又被当作二等公民来对待，在军队服役或任政府公职时，也很少有提升的机会。

但是，圣马丁是少数例外之一。由于他父亲是西班牙军官，而且他本人也只在殖民地住了短短几年，所以尽管他是土生白人，但由于战功卓著还在军队里不断得到提升。拿破仑于

1807--1808年侵占了葡萄牙，继而又入侵西班牙，迫使卡洛斯四世以及后来他的儿子费尔南多七世相继退位。这时，圣马丁再次应召参战同法国入侵者战斗。到1809年，他已得到多次授勋，并被擢升为少校。但是，在一个忠实的西班牙军官的冷静沉着的外表下，他的内心正经历着激烈的变化。

与西蒙·玻利瓦尔及其他许多拉美解放者不同，圣马丁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感情。别人通过发表演说、撰写政论文章或通信来表达自己对争取殖民地独立的日益增长的热情，而圣马丁则善于自我控制，他宁愿让行动来说话而不用嘴来说话。

虽然圣马丁对法国革命的基本思想有好感，但他不赞成在欧洲造成的混乱状态。他一生中一直主张建立一种强有力的、有秩序的统治。通过他的土生白人朋友圣马丁了解到在阿根廷和南美其它国家日益发展的独立运动情况。看来，南美将是有希望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建立起没有欧洲那种腐败和混乱的政府。但是，殖民地迫切需要能帮助他们进行斗争的战士。

1811年，33岁的圣马丁尽管在欧洲作为军人有着辉煌的前程，却以身体欠佳不适合军旅生活为由突然退伍，不久即前往英国。

圣马丁在胜利与挫折中为国效力22年，从没有抛弃它一天。这22年中，他曾在它的旗帜下与摩尔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葡萄牙人作过战，曾转战于海洋与陆地、旷野与城堡。他在实践中熟悉了名将们的战略、欧洲各国的作战方式、各兵种的战术、民族战争不可抗拒的威力以及西班牙在其殖民地暴动时所拥有的力量。这时，他回眸南美洲，注视着指向独立的南美民族解放战争，而且他懂得取得最后胜利的路途艰难曲折荆棘丛生，这时正需要披荆斩棘的开路人。于是他决定回到遥远的祖国，决心为之奉献自己的宝剑和生命。

当时爱国的土生白人云集伦敦，他们中的许多人抱着谋求英国对独立运动的支持的希望来到这个国家。拿破仑入侵西班牙后，英国同西班牙又一次成为盟国，这样，他们的希望顿时化为泡影。但是，土生白人在英国继续经常地聚会讨论，地点就是米兰达在伦敦的旧居。圣马丁抵达英国时米兰达已返回委内瑞拉去为

那里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但他的住宅继续作为秘密团体“劳塔罗共济会”的总部。劳塔罗是十六世纪南美一位成功的起来反抗西班牙征服者的印第青年的名字。它的宗旨是争取拉丁美洲的独立。圣马丁在这里与阿尔维亚尔和萨皮奥拉相识，后来前者成为他的劲敌，后者是他的挚友。玻利瓦尔也是这个秘密团体的成员，而圣马丁则早已宣誓加入这个组织。这样，两位缔造新大陆的巨人在旧大陆就由同一誓词连结在一起了。

几个月后，1812 年 1 月，圣马丁、阿尔维亚尔和萨皮奥拉登上英国“乔治·坎宁号”船，驶向布宜诺斯艾利斯。

为阿根廷而战

圣马丁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美洲革命正受着严峻的考验。他来得再适时不过了。起初的骚乱时期已经过去，未来日日夜夜严肃的工作即将开始。独立派和保皇派之间的斗争尚未展开，社会各阶层之间战斗刚刚发轫。

阿根廷的自治运动比其它殖民地开始得要早一些。1806 年，当西班牙还在同法国结盟时，一支英国远征队曾企图占领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西班牙总督昏庸无能，不能保护这块殖民地。当地居民于是在法国海军上校圣地亚哥·德利尼埃尔指挥下自己组织起来，击退了入侵的英军。胜利之后，他们将西班牙总督赶回了西班牙，卡洛斯四世则批准德利尼埃尔任总督。后来，当法国入侵西班牙而使原来的盟友变为仇家时，德利尼埃尔当然地被撤职了。但是，当地居民已经显示过自己的军事力量，享受过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民主权利。所以在 1810 年，当获悉卡洛斯四世和费尔南多七世退位以及拿破仑侵占了西班牙的消息后，阿根廷的居民组成了自己的政府，期待重建君主统治。同当时在其它殖民地成立的政府一样，他们没有同母国西班牙完全断绝关系，而表示在费尔南多七世复位后将继续效忠于他。虽然各殖民地政府作了效忠的表示，西班牙政府仍然心存疑虑。各殖民地开放外贸港口，宣布解放奴隶，并制定了新的法律，似乎正在走向完全的独立。西班牙当然不会坐视这

种趋势蔓延发展而无动于衷。当圣马丁于 1812 年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阿根廷是唯一没有被西班牙军队推翻或正在被推翻的殖民地自治政府。

由于阿根廷是作为一个农业殖民地建立起来的，它的居民和文化不同于其它殖民地。西班牙传统的殖民制度统治的结果往往是形成一个极为富有的上层和一个十分贫穷的下层劳动阶级和奴隶。但是，这种殖民制度在阿根廷并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特别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相当数量的白人商人和小农牧业主使阿根廷成为唯一拥有一个受过教育的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中产阶级的殖民地。在阿根廷，种族主义也不猖獗，奴隶制从来没有像其它殖民地那样盛行过，阿根廷的奴隶从沿海地区逃往内地比较容易，主人也很少追捕他们。黑人，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可以自由通婚。在圣马丁回到阿根廷的前一年，即 1811 年，奴隶制已被正式废除。

阿根廷的革命，由于领导不力，遭受到巨大的挫折。1810 年 5 月 25 日由公民投票推选出的执行政府是仿照当时西班牙政府委员会的

形式组成的，后来由于省议员的参与遭到了破坏，使得第一个全国议会流产，政府变成了一个多头怪胎，政见上缺乏主动性，执行上没有活力。根据民众的意愿，执行政府由一个三人委员会取代。

这就是圣马丁踏上阿根廷海岸，并将在南美洲革命的大舞台上出现的时候，拉普拉塔联合省的形势。

圣马丁回到祖国的时候，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举目无亲，身无长物，唯一的财产是他的佩剑。他当时的名望只不过是个勇敢的士兵，一个善用战术的人。他的伙伴阿尔维亚尔与他恰恰相反，他富有，以豪爽慷慨而著称。出身名门望族，服饰华丽；好虚荣，酷爱权利，能言善辩。阿尔维亚尔与圣马丁在一起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圣马丁谨行慎言，凡事深谋远虑；他激情内敛，冷静耐心，意志坚强，精明干练。这些特点形成了他的独特性格。阿尔维亚尔以圣马丁的保护人的姿态出现，把圣马丁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人介绍给联合省政府。

圣马丁到达阿根廷后的第 8 天，他的军衔得到承认，并被委派去组建一支骑兵队。这就

是后来参加了独立战争所有大战役，遐迩闻名的骑兵掷弹团的前身。

圣马丁不仅富有革命军事才能，而且有着大规模起义的经验。西班牙奋起反对法国侵略者向他展现了在民族战争中人民大众的巨大威力。西班牙军队在胜利中受到的挫折也使他懂得了，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如果没有扎实的军事组织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

根据这些经验和判断，他冷静地分析了独立战争的军事形势，得出了结论：某些人认为打一次胜仗即可结束的这场战争，需要整个美洲延续许多年。他周密考察了部队素质，结论是军事上组织得不好，军队缺乏坚韧不拔的精神，军事行动无计划，既没有军事组织，也没有军事策略。

阿根廷的独立政府虽然执行自由政策，但内部问题十分复杂。巴拉圭和乌拉圭试图脱离阿根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内部又分成两派，保守的一派仍然忠于西班牙，另一派则主张彻底独立，现代化派彼此间勾心斗角。由于在打败英国人的入侵的斗争中表现出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阿根廷过于自信地派出了一支庞

大的远征军，在著名的曼努埃尔·贝尔格拉诺将军的指挥下，沿着过去的向利马运输货物的老路向北推进，企图占领曾划分给拉普拉塔总督区的玻利维亚新区，甚至要援助秘鲁的解放事业。起初，贝尔格拉诺打了几次胜仗，但后来他的供应线拉得越来越长，军需供给越来越没有保障，并且又被来自秘鲁的西班牙精锐部队由北向南猛烈攻击，开始不断失利，处境越来越艰难。

圣马丁默默无闻地继续训练他的骑兵团。骑兵掷弹团第一个中队是培养教育一代英雄的学校。在这里造就了满怀激情的新型士兵，就像克伦威尔在英国革命中所做的那样。圣马丁以严格而又不限制个人主动性的纪律，一个士兵一个士兵地培养，一个军官一个军官地训练，用应尽的义务与责任感来激发他们，用大胆而冷静的策略教育他们。

圣马丁是位严格的教官，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按法国骑兵的标准训练他的队伍，连续训练数小时而不休息，十分重视部队训练使用拿破仑骑兵最喜欢用的武器——又长又弯的马刀。

圣马丁同他的士兵们一起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只是偶尔参加一些土生白人家里的沙龙，没过多久，他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就都在有钱有影响的安东尼奥·德·埃斯卡拉达先生的家里度过了。圣马丁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5个月后，得到军队批准同安东尼奥先生的15岁女儿玛丽亚·雷梅迪奥斯·埃斯卡拉达结婚。婚礼于1812年9月12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教堂举行。

这对夫妇看起来很不相称，因为他们年龄相差太大，新娘只有15岁，而圣马丁已34岁了。但是，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争取南美洲的自由。从那时起，圣马丁就开始拿出他的一半薪金来购置武器装备他的士兵，以后在整个革命期间，他一直坚持这样做。在他们结婚前的两个多月，即6月，当向城市中的富有青年为独立事业进行募捐时，玛丽亚·雷梅迪奥斯的名字出现在募捐签名册的首位。这时她已成为圣马丁的知心人，最好的合作者和支持者。

圣马丁刚刚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时，由于他不以发表热烈的演说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精

神，加之过去又是西班牙的军人，所以开始时一些土生白人对他抱有疑虑和偏见，在军队里没有给他任何指挥权。而当时间进入1813年时，终于有机会来证明圣马丁的忠诚和勇猛了。

1813年1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得到消息，一支西班牙舰队从蒙得维的亚开来征讨阿根廷。由于贝格拉诺的部队在北方作战，所以只得由圣马丁的骑兵来迎战。

圣马丁迅即带领120名骑兵出城。在上巴拉那河上游17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名为圣洛伦索的小村庄。村里的一座圣芳济会修道院耸立在巨大的岩石上，鸟瞰着整个村庄和河流。圣马丁率领他的骑兵进入修道院的后门，命令他们隐蔽在围墙后面。他自己化装成一个印第安牧民，围着披肩，戴着典型的宽边草帽，策马在河岸边走来走去。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11艘西班牙战舰慢慢地逆流而上，抛下船锚，开始准备让士兵登陆。

圣马丁飞奔回修道院，命令士兵们继续隐蔽并稳住坐骑不动，以免尘土飞扬过围墙而暴露自己。他从修道院的塔顶上继续观察西班牙

人的动静。这是300多名装备精良的海军和步兵，而且还带着野炮。圣马丁的士兵们没有大炮，许多人的武器只是马刀和长矛。但圣马丁依靠的是严格的纪律和出其不意的突袭。他让西班牙士兵上岸走近一段距离后，命令修道士们打开大门，自己率领骑着阿根廷的特有快马的骑兵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冲而下，未等西班牙士兵发挥火器的优势，双方就已面对面地进行着白刃格斗了。圣马丁冲在前面，挥舞马刀，同西班牙司令官对拼。后来，他们又被分割开了。这时，西班牙士兵已设法安好了大炮，第一炮就击中了圣马丁的战马。马倒下的时候，压住了圣马丁的一条腿，使他动弹不得。圣马丁的面颊被敌人的马刀刺伤，鲜血直流。一个西班牙步兵赶过来，想一刀结束圣马丁的性命。千钧一发之际，圣马丁的两个士兵赶到，一个用长矛刺穿了这个西班牙士兵的胸膛，另一个把他的指挥官从坐骑下拖出来。圣马丁一站起身，不顾脸上的刀伤，又立刻投入了战斗。

这场短兵相连的激战时间很短。西班牙军队在扔下了二门炮、50支步枪、40具尸体和14个俘虏之后退回舰上逃跑了。圣马丁的损失是

15人牺牲、27人受伤。

圣洛伦索战斗最终消除了西班牙军队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威胁。圣马丁像英雄一样回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他忠心的怀疑彻底消除了。但欢乐的气氛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从北方开始不断传来贝尔格拉诺将军遭到越来越惨重的失败的消息。于是，圣马丁奉命前往北方，负责整顿贝尔格拉诺的部队。

前往新的指挥岗位长达800多英里的旅程十分艰苦，圣马丁直到1813年年底才到达目的地。在抵达设在阿根廷西北部图库曼市的新司令部前，圣马丁早就觉察到要通过如此漫长的补给线来供应一支军队是何等困难。图库曼整个城市几乎已成为一所大医院，到处挤满了饿得半死不活的伤员和士气十分低落的士兵，士兵开小差的现象十分严重。

圣马丁接管部队指挥权后，开始对北方军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敌人摸不透圣马丁的意图，也弄不清他究竟拥有多少兵力。这时圣马丁的麾下有3千名纪律很好的士兵，他将稳守图库曼。为了迷惑敌人和巩固城防，圣马丁命令在图库曼城郊四周修筑堑壕工事，表明决心

固守阵地，增强人们的信心，避免了士兵开小差。同时隔绝军队与居民的接触，增加军队的神秘色彩，扩充军队，增加编制。人们从没看到过从这个要塞里有部队开出来，却经常看到由四面八方来的大股队伍开进去，似乎援军总在源源不断地到来。实际情况是，驻扎在这里的士兵，悄悄在夜间出城，招募新兵，过几天后，再象新部队似的浩浩荡荡地开回来。通过这样的障眼法，谁都不会怀疑在那个深沟壁垒的要塞里只有 4 千名守军。

运用这种欺诈战术，同时还通过游击战扰乱了敌人的后方，圣马丁成功地阻止了西班牙军对图库曼的进攻。

1814 年 5 月，圣马丁神秘地离开了战场。在他走下这个舞台的时候，他头脑里孕育着的全洲性的作战计划已经成熟。自从他回到祖国，投身于阿根廷和美洲革命以来，一直在思考这个计划。他细心地观察，缜密地分析，终于发现了一条规律，每当阿根廷军队进入上秘鲁时必败，而西班牙军侵入联合省时也会大败而还。通过亲身领导北方军的作战实践，他断定以前走过的这条路不是南美洲革命应走的战

略性道路，沿这条路走下去，斗争要么徒劳地、无限期地拖下去，要么就以惨败告终。他的计划是把战争引向西边，越过安第斯山，占领智利；控制太平洋，从侧翼进攻下秘鲁，而北方边境上的军事行动只作为次要的牵制性行动。这一正确而合理的计划，后来以其辉煌的胜利折服了同代人，以其数学公式般的准确展现给后来人。它不仅仅是个困难重重而又极其简单的计划，而且是唯一可行的计划，但在当时，却象痴人说梦一般。正因为如此，圣马丁一直把这个计划作为秘密而保留在心里，直到时机成熟，他手中握有足以轰死西班牙美洲政权的雷霆闪电时，才将它公之于众。

25 年士兵般的艰苦生活摧残着圣马丁原本十分强壮的身体，他的健康不断恶化。这正好给他一个借口可以从北方战场脱身出来而开始进行自己解放美洲的秘密计划。他向政府提出辞呈，要求派他去担任比较起来不很重要的库约省省长的职务。这是一个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正西方，同智利交界的安第斯山脚下的偏远省份。

1814 年 8 月 10 日，圣马丁被任命为库约

省省长，委任文件上说这是应本人请求而任命的，一是继续为国家做出卓越的贡献，二是为了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恢复已经拖垮的身体。但休养成了从温带到赤道的伟大战役的第一步，这次战役将跨越高山、峡谷和海洋，历时7年而无一日间歇。从那时起圣马丁就把全部身心投入了实现理想的斗争。门多萨，库约省的省会，是为他实现理想而事先选好的地方；产生解放美洲所需的物力和人力的土壤；安第斯山脚下，把民众的义愤鼓动到最高峰的第一个阶梯；与以后的军事行动的第一个支撑点智利接壤；便于向太平洋进发，以便进兵当时设想的最终目的地利马。圣马丁梦寐以求的理想即将实现了。而这时，他还是个不很有名的将军，装在他脑子里的秘密更不为人所知。但他的主要特点人们已经看清楚了。他三思而后行，判断准确，行动坚决；他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组织得有条不紊，已经是个成熟的战术家，即将成为一个战略家。他性格冷静沉着，但又怀着满腔的热忱。他谨慎谦虚，没有私心，除了解放人民的计划之外，别无它想。

1814年驻在安第斯山脚下即将改变南美洲

命运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将第一次坚决地进行军事反攻，在心脏地区摧毁西班牙在殖民地的势力。

大山脚下：神秘的计划

几经挫折磨难，圣马丁得出了与为北方殖民地的独立而进行斗争的西蒙·玻利瓦尔正在寻求的相同的结论：只要西班牙最富饶的殖民地秘鲁仍然作为西班牙人用以装备军队，并向南、向北派遣部队镇压独立革命的一个坚固堡垒而存在，那么任何一个取得独立的殖民地都不能指望有永久的和平。但攻克秘鲁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早在几百年前，阿根廷的牧场主就体会到，向西北走3千多英里的路程，再越过上秘鲁的安第斯山脉，把皮货运到利马是极其困难的。认为阿根廷可以通过如此漫长的补给线保证部队给养，那简直是想入非非，特别是在秘鲁的西班牙军队可以很容易地从海上不断获得补充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而门多萨这个城市，位于安第斯山脚下，几乎与智利的海港瓦尔帕来索正相对。在智利，年轻的贝尔纳

多·奥希金斯也正在领导着他的同胞们进行争取独立的斗争。如果圣马丁能够率领他的部队翻越安第斯山，那么这支军队就可以帮助巩固智利的独立，然后，从智利获得给养，再加上奥希金斯的智利部队的增援，乘船北上，攻打秘鲁沿海地区最薄弱的环节，切断西班牙军队的海上补给线，进而解放秘鲁，这样才能解放整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

历史上称作库约的这个地区，西起安第斯山麓，东与阿根廷的大平原相接。这个地区自发现新大陆起，就是连接南美大陆南端东西两部分的枢纽地带。1814年原门多萨，圣胡安和圣路易斯辖区组成了一个行政区，称库约省。这个地区具有阿根廷和智利两国的特点。

门多萨是拉普拉塔总督区内首先自发响应1810年5月25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呼声的城市之一。圣路易斯和圣胡安一致响应爱国起义行动。这就是圣马丁1814年接管的政府。这里将是他未来的战略行动的出发点。他从未怀疑过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名气而又很贫穷的地方所蕴藏着的潜力，这里将为美洲革命贡献出一切。

革命爆发时，库约省仅有4万人。但这里的人民健壮耐劳，节俭勤劳。他们居住集中，生活节制而有规律，这些特点使他们成为能严格遵守纪律的优秀的士兵。圣胡安和门多萨当时是这一地区的两个农业区，因此比其它地区较为开化，与智利和阿根廷沿海地区有着活跃的贸易往来。库约人经常外出旅行，这不仅使他们开阔了眼界，并且对外界生活有所了解，增长了知识和才干。库约人有各种行业的能工巧匠，从锻打农具、马掌的铁匠，制作马具和运货皮箱的皮匠，到安装水磨的机械师和筑坝灌溉、具有实践经验的工程人员应有尽有。具有冶炼常识的采矿者不乏其人，擅长在山地赶驮的人更比比皆是。这个地区的妇女非常勤劳，终日忙碌，不惮其苦。圣路易斯的农业虽不甚发达，但有以毛纺为主的工业补其不足，还可提供牧畜，出口皮革、羊毛和木材。由于这里的居民经常和边界的印第安人发生武装冲突，锻炼出许多在马上善用白刃武器的熟练骑手。

正是这些特点，使圣马丁能够在这里仅用3年时间就组成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这支

军队仅用一省的财力和物力，在人们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首先在南美洲战争中发起反攻，解放了两个国家，把阿根廷的革命推向全大陆。这位伟大的人物，在他远征的道路上，遇到了他所需要的国家。这个国家很好地响应了他的计划，无私地奉献出所拥有的一切，直至本国儿女们的热血。这是即将斩断殖民主义锁链的新的亚历山大所遇到的马其顿。

恰恰在这个时期，革命遭到了可怕的挫折，美洲的独立事业进入了低潮。加强后的北方军有 4 000 多人的兵力，拥有两个炮兵纵队，在龙德奥将军的指挥下第三次进军上秘鲁，在西佩西佩被西班牙的佩苏埃拉将军击败。这次惨败发生在 1815 年 11 月 29 日，这是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失败，仅有 1 500 名士兵得以逃生。现在整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除拉普拉塔联合省以外都在西班牙的控制之下。智利被保皇势力统治的上秘鲁不可挽回地攻陷了，库斯科的起义被镇压下去，阿根廷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西佩西佩一战似乎是美洲革命的最终一战，因此保皇派在欧洲和美洲都大张旗鼓地欢庆胜利，在西班牙所有的教堂里大唱感恩诗。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圣马丁看到直捣利马的军事道路永远被堵死了，于是就披露了他的秘密，并制定了收复智利的作战计划，甚至连所需军队的人数都确定了。

在西佩西佩惨败的阴云笼罩着全国的时候，圣马丁宴请了他的全部军官。以前人们从没有见过他那样爽朗和容光焕发。宴会快要结束时，他站起来，充满信心，语调激昂，请大家"为即将在安第斯山另一侧向智利的压迫者射出第一颗子弹而干杯！"这句话激起了人们的希望，人们也和圣马丁一样充满了信心。从那时起，越过安第斯山和收复智利已不再仅是一种构思，而开始成为一种看得见的事实。美洲革命将破天荒第一次采取主动的攻势，战争的命运即将改变。

过安第斯山

圣马丁在门多萨进行准备的同时，另外一些爱国者在努力巩固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1816年7月9日，阿根廷宣布成立共和国。

圣马丁所进行的工作不仅仅限于准备作

战，在建设一支正规军的同时，他组织了广泛的"间谍战"，巧妙地与其政治工作和军事准备工作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他表现出了高超的谋略。这项工作完全由他一人掌管，他亲自给他的谍报人员下达指令，亲自撰写给他们的密信和故意落到敌人手中以欺骗敌人的信件。在这个伟大的军事家身上，同样具有谋略大师的天赋。

圣马丁第一次运用间谍战的尝试说明他是一位欺骗敌人的艺术大师。他利用他与流亡到阿根廷的智利起义领袖卡雷拉之间众所周知的不和与几个智利流亡者达成谅解，让他们声张因为生活无着和遭到迫害而想回智利的要求。圣马丁佯装气愤填膺，把他们流放到圣路易斯。几天以后这几个人就逃跑了。阿根廷军队"大力"追捕，但没捉到他们。他们逃到智利后得到了信任，成为圣马丁第一批派往智利的特工人员。

智利的西班牙都督也想建立自己的间谍网，以便了解门多萨的实情。他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得到的唯一消息都是圣马丁通过自己的特工提供的假情报。因此他派了一个神

父作间谍。圣马丁从他设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谍报人员那里得知神父的到来，在他刚一进入阿根廷边境时就将其抓获。依照当时有关通敌的法律，立即判处他死刑，给他24小时的时间准备伏法。但圣马丁根本不打算处决他，而是要利用他。在死刑的威胁下，神父交出了缝在法衣里的密信，这就又为圣马丁的间谍网增加了一条线。

这封密信是写给因明显的保皇言论而被流放的4个西班牙人的。圣马丁把他们一一召来，拿出信，说带信的人已立即处死，如果他们不绝对保密，将遭同样下场。把这些人吓得魂不附体后，他亲自编造回信，写满了假情报，再让一个小孩用歪七扭八的字体抄写一遍。他命令这些人签名，并警告他们要严守秘密。送这些信的是经过良好训练的双重特务，在智利交信时得到一份丰厚的酬金，回来时带来了敌人的复信和圣马丁的谍报网提供的情报。圣马丁就这样指挥着间谍三重奏。他另外还在大山的西侧布置了大量的密探，向他详细报告智利的最新情况和敌军的行动，同时在那里散布对保皇势力的不满，煽动反叛情绪。

除了特工人员之外，真正发挥了特工人员的作用、向圣马丁提供情报使他能够制定作战计划的还有经过考验的热心的智利人。他们为收复自己的国家真诚地与圣马丁合作，在智利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人同圣马丁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人中最能干的一个要算是胡安·巴勃罗·拉米雷斯，他住在圣地亚哥，他甚至弄到了保皇军的防御计划，事先指出查卡布科坡地作为战略点。但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当首推曼努埃尔·罗德里格斯。他是个青年律师，热情、勇敢，富于魄力，头脑冷静灵活，具有成为群众领袖的才能。他跑遍了中部省份和城市，简直成了暴动的使者。他联合庄园主，组织游击队，几次往返穿越安第斯山，冒着生命危险在国内坚持了一年多。虽然人们都认识他，到处都会感到他的存在，但没有人出卖他。后来这个人就成了收复智利之前人民起义的领袖。

正在圣马丁加紧准备翻越安第斯山的伟大进军的时候，罗德里格斯爱国心切，提前发动了起义。这对圣马丁的计划是不利的。但圣马丁善于因势利导，化被动为主动。他给罗德里格斯写了一封一式数份的信，目的是让一些抄

件落入敌人手里。圣马丁在信中告诉罗德里格斯他不同意他的提前起义，因为起义的南方地区正是圣马丁打算进军的地方，这样一来起义会把敌人的重兵都吸引到那里，使他的计划无法进行。这封提供了假的进军路线的信落到智利保皇军手中，使他们确信圣马丁的进攻对象是南方，因此不但没有撤回围剿罗德里格斯起义队伍的部队，反而加强了那里的兵力，从而减少了后备军，忽略了对智利北方的防守。圣马丁的目的达到了。在智利的间谍战保证了他在战场上的胜利。

关于远征智利的计划得到了阿根廷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人的赞同，现在圣马丁所需要的就是实现这一伟大计划的手段。

实现这一计划的军队——安第斯军的组建实为军事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奇迹，是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创举。在此之前，阿根廷只有一支国家军队，即进攻上秘鲁的北方军。安第斯军是进行反击战的新型力量，这在南美洲尚属首创。

为了武装军队，首先创办的就是兵工厂。圣马丁在一家修道院中发现了一位沉默寡言的

年青修士路易斯·贝尔特兰，他给圣马丁的事业带来了最大的帮助。他当时30多岁，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修道院，后来参加了智利革命。这个人智慧超群，是一位机械天才，好读书，善观察，勤实践，无师自通，学到了许多化学、物理、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又是很出色的炮手、木工、建筑师、绘图员，还粗通医道，几乎无所不晓。圣马丁让他领导兵工厂和武器库。不久就筑起了熔炉，造出了第一批武器。贝尔特兰穿着长裾没足的法衣，象位火神在锻造革命的武器。在他的领导下，制造了大炮、炸弹、混合炸药、子弹、背包等军需品，还特别制造了战马的马掌和使驮货的牲畜能在乱石滚滚的山路上行走的蹄掌。另外，贝尔特兰还把牛肉加工制成一种粉状食物，晾干装袋，作为安第斯军野战时的标准军粮。他设计了跨越山谷的轻便的吊桥，还专门制造了能通行崎岖不平的石子路的车身很窄的辎重车。

万事俱备，只等进军的号角吹响了。进军前的准备艰苦而细致，从部队编成、武器配备、行军路线直到后勤保障，一支大军进行远征的所有细节圣马丁都一一考虑周到并亲自监督进

行准备。甚至连高山作战时的军服、战靴以及干粮他都要彻底检查。但当他从门多萨遥望西面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时还是有无限感慨。每每使他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的不是山那边敌人可能进行的抵抗，而是这傲岸无际的大山本身。安第斯山是横亘于广袤无垠的阿根廷大草原和秀丽的智利山谷之间的天然屏障，绵延于阿塔卡马沙漠至合恩角之间。山势诡异奇绝，层峦叠嶂，峰顶直冲霄汉，终年积雪不化，最高峰海拔达 6 900 多米。山脚下的万丈深渊，神秘莫测，云雾缭绕，幽不见底。另一侧峭壁如刀削，巉岩兀立，大有岌岌欲坠之势，两相对照，更添山势的险峻。

阿根廷和智利边界上的安第斯山脉中只有一些山口才能通行人畜。这些山口中人们最熟悉的是乌斯帕利亚塔山口和帕托斯山口，它们分别与门多萨和圣胡安相对；北边有拉马达山口和噬马山口；南边有普兰乔翁山口和波蒂略山口。这些通道在大山主脉的最高处可达海拔 3 000 米至 3 700 米，冬季因积雪填塞无法通过，只有盛夏才能通行。从前，只有小股军队或赶马的商人穿越过。有些地方的羊肠小道，

只容得下单人单骑。一支如安第斯军这样庞大的队伍要从这些山口翻越这座大山，被认为根本不可能的。在圣马丁之前，根本没人敢这样设想过。

还有比过安第斯山更让圣马丁费难的其它问题。他要确定远征的路线和战略集结地点；计算分散行军和各纵队在敌人的薄弱之处会合的时间；这隐瞒真正的进攻点以获得攻击的突然性，等等。这些都是安第斯军的统帅必须面对的困难。

早就能看出，圣马丁在想方设法让敌人相信他远征的目标是智利的南方，他的间谍战的主要目的也正在于此。他通过伪造的信件和故意泄密的文件蒙骗了敌人和朋友，使他的远征计划一直保密到最后时刻。为了使敌人对他进攻智利南部这一点更确信不疑，他又使出了最后的一招骗敌术。

1814 年，圣马丁刚任库约省省长的时候，就开始建立与土著印第安佩文切人的友好关系。他们是门多萨南面安第斯山东麓的主人。与他们的关系处好了，就能确保在智利的特工人员往来畅行无阻，在敌人来犯的情况下也可

以利用他们。当圣马丁把部队集中以后，他决定进一步公开宣扬这种关系，目的在于造成准备进攻智利南方的假象，欺骗敌人，掩护其真正进军目标。为此，他邀请佩文切人到边界上的圣卡洛斯要塞进行会谈，扬言目的就是为了假道他们的土地进攻南智利。事先已用骡子驮去了许多礼品。在指定的那天，佩文切人成群结队，吹着号角，挥舞着长矛，纷纷到要塞集合，他们的军人跟在后面。到了要塞前的广场上，女人们闪到一旁，男人们高举长矛向圣马丁致意。然后，在要塞的广场上进行了非常奇特的佩文切人的军事演习。接着召开了隆重的大会。圣马丁请求他们允许他通过他们的土地，以便通过普兰乔翁山口和波蒂略山口去攻击西班牙人。部落的总首领是一位白发老人，他召集部落联盟的所有酋长开会，经过讨论，除三个酋长外，都答应了圣马丁的请求，随即签署了联合协定。

果然不出圣马丁所料，那些持有异议的酋长和背信弃义的印第安人将消息报告了西班牙人。西班牙守军完全按照圣马丁的间谍网提供的假情报和印第安人提供的假消息来调整军事

部署：在港口设防，防止敌人登陆，同时组织舰队，准备迎击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舰队；切断南部山口的通路，将部队分散防守到各地；最后甚至也学着圣马丁的样子和安第斯山西麓的土著阿拉乌干人也举行了一次会谈。

圣马丁的目的终于达到了：智利军队力图守卫全部陆海疆界，兵力分散，结果使得很多地方的防守空虚，只是一个架子而已。而真正将受到攻击的地方却被忽略了。

在门多萨，则是另外一种景象。一切就绪，整装待发。远征军拥有 4 000 名士兵，其中步兵 3 000 人，分为 4 个营，分别由阿尔瓦拉多、克拉梅尔、孔德和拉塞拉斯指挥；骑兵掷弹团 700 人，分为 5 个纵队，由萨皮奥拉、梅利安、拉马略、埃斯卡拉达和内科切亚指挥；炮兵 250 名，由拉普拉萨指挥。另外，还有库约省的 1 200 名民兵随军远征，负责运输粮食、弹药和照料马匹等工作；120 名门多萨矿工，负责修路。军队分三路，前两路为主力，沿智利北部的安第斯山帕托斯隘道前进，先头部队由米格尔·索莱尔率领，后卫部队由智利起义者的领袖贝尔纳多·奥希金斯率领。第三路由拉塞拉

斯率领，沿乌斯帕利亚塔山口前进。各部队的物资配备特别充分，特别是粮食更充裕。为防万一，沿途还设置了一些食品库，以备在进军失败或撤退时使用。

无论是主力部队还是其它配合部队，都必须按计划于1817年2月6日至8日同时出现在智利的国土上。圣马丁沿帕托斯前进，与沿乌斯帕利亚塔前进的部队相隔67公里，每天有两人通过口头或预定的旗语与他联系。

在确定了南北两路的远征之后，圣马丁没有公布开始行动的时间。1817年1月15日，圣马丁把拉塞拉斯上校叫到他的住处，告诉他将从乌斯帕利亚塔这条路进行远征，并亲手交给他在行动中应遵守的指示。其部署非常仔细，已考虑到作战失利时应如何行动等问题。拉塞拉斯按计划将于1月18日向乌斯帕利亚山口进发，军火、炮兵和兵械人员晚两天出发。

分成两路的主力部队将于19日向帕托斯山口进军。索莱尔率领先头部队，由奥希金斯率领的后卫部队要与前队保持一日行程的距离。先头部队的任务是于2月8日到达普塔恩多谷地，占领通往圣费利佩谷地的阿空卡瓜

桥，与拉塞拉斯取得联系，在圣罗萨背后袭击敌人，然后直取查卡布科。如果失利则就地驻扎，以切断敌人与首都的交通联系。这支部队的另一任务是号召当地居民起义，筹措粮草和马匹。

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通过崎岖险峻的羊肠小道跨越雄伟的安第斯山，实为一次壮举，而其艰难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但也正是在这里才最好地显示出圣马丁超群的军事才能。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筹划准备，估计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事无巨细，都已想到，这才有了这次军事史上的壮举。

拉塞拉斯上校沿乌斯帕利亚塔前进。1 月 24 日到达乌斯帕亚达山谷并驻扎下来。2 月 2 日凌晨 3 点，拉塞拉斯率部越过山顶，按原计划于 4 日上午攻占了瓜迪亚。这时他接到圣马丁的命令，令其原地待命休整两天时间，以和其它部队协调前进的时间。

2 月 6 日，拉塞拉斯部队从瓜迪亚集结地继续前进，到达圣罗萨。与此同时，主力部队按期进入普塔恩多谷地，两军实现了在预定地点的会合。

2月8日下午两点，阿根廷军主力攻占普塔恩多镇，同时拉塞拉斯占领了圣罗萨。这两个谷地已被远征军控制，各部队都派出先头部队，兵分几路，对查卡布科形成了战略包围的态势。

查卡布科之战

完成对查卡布科的战略包围之后，圣马丁迅速派人侦察查卡布科的布防形势及敌人的集结情况，得知敌军正向查卡布科增兵，遂决定于2月12日对查卡布科之敌展开总攻，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全歼之，使敌不能集结增援。按部署安第斯军兵分两路，右路2 100人，由索莱尔指挥，任务是占领平原地带，攻敌左翼及其后卫；左路1 500人，由奥希金斯率领，从正面进攻敌人；两路得手后，合围总攻敌大营。

12日凌晨两点攻击开始。恰好这天，圣马丁的风湿性神经痛发作，使他几乎不能乘骑，所以查卡布科之战圣马丁是用他的头脑而不是躯体同敌人鏖战。他运筹帷幄，统领全局，指挥若定终于赢得了这关键的一役。

索莱尔和奥希金斯的部队按各自路线搜索前进，与敌军一部交火后迅速击溃之。上午9时，占领了制高点的有利地势，并用炮火封死了敌人的退路，摆好了全歼敌军的阵势。

左翼的奥希金斯部队由先头部队骑兵掷弹团快速追击溃退的敌军，虽然由于山坡上地势崎岖不利于骑兵作战，但终于以其快速灵活的机动作战能力使敌无法占据有利地形进行设防。上午11时，奥希金斯将敌军赶入了山谷并占领了谷口，智利军已进入了圣马丁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的口袋。

奥希金斯见进展如此顺利，被掷弹团追击的敌军仓皇撤退，就主动请缨，要求参加追击。圣马丁批准了他的请求，但提醒他不要穷追不舍，必须等到索莱尔的部队从侧翼进攻，才能夹击合围，全歼敌军。

但奥希金并没有完全遵照圣马丁的命令行动。他求胜心切，自己孤军深入，企图单独打败敌军。他不顾自己兵力不足，穷追西班牙军于谷地之中，贸然发起攻击，与敌展开了阵地战。由于没有侧翼配合，正面进攻久攻不下，伤亡较大。

圣马丁本来已经胜券在握，但奥希金斯的冒险却使阿根廷军一时处境十分不妙。他一得知奥希金斯单独发起了攻击，马上命令索莱尔迅速在敌军侧翼接敌进攻，合围敌军。下午1点半，索莱尔率右翼部队终于攻破敌左翼阵地，决战的时刻到了。

奥希金斯的部队重新发起进攻，圣马丁命令掷弹团的三个骑兵队向敌人阵地纵深冲锋，同时步兵在奥希金斯率领下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攻占了敌阵地。包围圈越缩越小，敌军都被赶到了谷地中央。奥希金斯和索莱尔同时发起最后的总攻，终于围歼了全部守敌。

查卡布科战役为圣马丁的这次史无前例的远征划上了胜利的句号。用他自己的话说，安第斯军用了24天的时间进行远征，消灭了独裁者，给智利带来了自由。

查卡布科战役在军事上的重大意义自不待言，而其政治意义则更加深远伟大。甚至连战败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这次战役发出了南美洲独立反击战的第一个信号，为在海上和太平洋沿岸进行军事进攻争得了巩固的根据地。尤其重要的是，为新大

陆的独立运动进行全洲性战争作出了榜样，把西班牙的势力压缩到了秘鲁境内。它拯救了阿根廷的革命，使之免于来自上秘鲁的西班牙军队侵扰；消灭了可能将阿根廷革命扼杀在摇篮里的侧翼威胁，使革命得以扩展到智利的太平洋海岸。这是南美洲第一次具有历史影响的战役，这一点连西班牙的秘鲁总督佩苏埃拉也无法否认。他承认这次战役标志着西班牙在美洲的事业开始逆转，标志着西班牙的势力从根本上开始动摇。

查卡布科的胜利使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保皇派一片混乱，虽然他们还有相当的兵力，但还是无所作为地撤出首都，退向智利南部保皇势力的大本营。圣地亚哥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大混乱中。

圣马丁出于慎重和考虑到大战之后部队需要休整，于12日夜将部队集结在查卡布科。13日凌晨他得知圣地亚哥的情况，随即命令部队向圣地亚哥进发，并派内科切亚率其骑兵先行入城，维持社会秩序。14日，安第斯军全军入城。第二天，圣马丁发布一项公告，决定召开知名人士大会，选举国家元首。

100人参加了大会，与会者决定以欢呼的形式宣布一致同意任命圣马丁为智利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但圣马丁坚决拒绝了给予他的这一荣誉。他从未有过政治野心，作为一个普通士兵，他只承担了一个义务：解放全部南美洲。

奥希金斯却没有圣马丁那样广阔的政治理想。虽然他同意只有打败秘鲁才能有持久和平的观点，但他首先是个智利人。然后才是南美人。他接受了名人大会的选举结果。在圣马丁坚决辞谢了国家元首的任命之后，大会选举奥希金斯为智利的国家元首。这也正合圣马丁的意。

阿根廷政府同样给予圣马丁极大的荣誉。政府授予他上将最高军衔，但圣马丁信守自己不接受任何新的军衔和政治职位的诺言，两次拒而不受。但他保留了军事指挥权，接受了智利总司令的职务，为的是实现他解放整个南美大陆的宏大计划。

一年以前他曾预言，智利，由于它的人民的特点、财富和地理位置，加上一个英明的领导人的指挥，肯定将成为决定南美洲独立战争命运的国家；它是一个沿海国家，可以通过太

平洋北上解放秘鲁，秘鲁自由了，整个南美的解放大业也就基本成功了。

圣马丁不是常胜将军

查卡布科战役之后，圣马丁犯了三个错误。两个错误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小过失，但另一个错误却让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给他后来的行动带来了极不利的影响。就是由于这些错误的缘故，应该立即结束的战争拖长了，为了巩固在智利的胜利他又被迫进行了四次征讨，打了4场恶仗，他的伟大事业被拖长了3年才得以完成。

2月12日夜，他把兵力集中到查卡布科仅以骑兵追击溃败之敌，而且很快就撤了回来。这是过分的谨慎，可以理解为师疲兵惫，也可以解答为防敌夜袭。圣马丁没有乘胜向智利南部的最大海港瓦尔帕莱索方向追击残敌，而是直接进入当时敌人已经撤离无需重兵把守的首都圣地亚哥，这是他的另一严重错误。这一失误使敌军一支1 600人的精锐部队得以逃脱，留下了后患。但他更为致命的错误是没有在敌

人新败军心摇动、斗志涣散、士气低沉之时就乘胜发起强有力的南征，乘胜一鼓作气扫平智利全境，从而彻底巩固这块北进秘鲁的根据地。而在查卡布科战役胜利之后他即远离指挥岗位，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与共和国的领导人普埃雷东商议筹措款项建立智利海军事宜。此去路途遥远，费时历久，给残敌以宝贵的喘息休整之机，终致后来对圣马丁进行反扑，令其非常被动。可以说，在这里圣马丁对轻重缓急、远虑近忧的处理是失当的、不明智的。

更不幸的是，圣马丁自己已预见到了这一点却没有付诸实施。他在作战计划中说"应进攻敌人之主力，首战必歼灭之，以免战争拖延的极大不利"。本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他没有查明南方的保皇势力会有大规模的反扑行动。南方是当时智利的军事中心，那里的居民能征惯战，西班牙王室在那里拥有最坚定的信徒和最优秀的将领；那里有最险要的地形，便于组织有效的抵抗，可使战争无限期的拖延下去；此外那里还有许多天然良港和近海岛屿，手握制海权的秘鲁总督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海上支援保皇派军队。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南方的西班

牙残敌很快便从查卡布科的大败中清醒过来，又重新武装上阵，其实力决不可低估。这样与秘鲁的西班牙军遥相呼应，互为犄角，对圣马丁构成了危险的南北夹攻的态势。如若不平定南方，圣马丁就会后院起火，根本无法全力北上攻打秘鲁。一时间，智利南部竟成为绊住安第斯将军北进计划的一块孤零零的顽石。

1817 年以南美洲反击战最初一次战役的胜利而开始，以阻碍了反击战向前的一次战役的失败而告终。1818 年则正相反，以一次失败而开始，以一次决定命运的更为伟大的胜利而结束。这次胜利从根本上巩固了智利的革命，永远保障了智利的独立，确立了阿根廷和智利的联盟，从海上和陆地巩固了整个远征行动的基地。从这时起，南美洲所有起义力量都向中部会集，逼近西班牙殖民统治的最后堡垒秘鲁，他们将在那里会合，给它以最后的致命一击；也是在那里，南北方的两位伟大的解放者，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将互睹对方的风采。

与圣马丁领导的解放运动向西班牙发起反攻的同时，大陆的北方在玻利瓦尔的影响下也进行着同样的战争。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日益缩

小。一切迹象都表明，西班牙殖民主义势力将最终被消灭在它的老巢——秘鲁。西班牙的最后一次反扑——莫里略远征和征服委内瑞拉及新格拉纳达，曾使西班牙的反动势力达到鼎盛。在南方，西佩西佩之战是它的顶峰，查卡布科之战则标志着它的衰落。

在此期间，上秘鲁(即今玻利维亚——作者注)和下秘鲁(今秘鲁)的政治和军事统治权经历了一些变动，并在阿根廷北部边境展开了军事行动，其直接目标基本上是智利。曾扑灭上秘鲁、基多和智利革命，在人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初期挽救了保皇势力的阿巴斯卡尔总督，被在阿约乌马和西佩西佩曾击败贝尔格拉诺的佩苏才埃拉取代。拉塞尔纳将军成为上秘鲁军的统帅。

新上任的秘鲁总督佩苏埃拉磨刀霍霍地准备远征智利。远征军由步兵、炮兵和骑兵组成，3 400 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士兵，加上查卡布科战役后逃走的奥多涅斯部队，总共 5 000 多人。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位奥多涅斯。这位西班牙上校是在查卡布科惨败的恐慌中仍对国王的事业抱有坚定信心的不多的几个人中的

一个。他在当时是一位不知名的军人，但他的才能却不逊于圣马丁。当时他尚没有机会施展他的才能，他的军事天才和英雄气质以后才显示出来。奥多涅斯和圣马丁曾在同一面皇家战旗下为反对拿破仑的侵略共同战斗过。并且和圣马丁一样也得到了嘉奖。伊比利亚半岛战争结束时他晋升为上校，带着这个军衔在 1815 年来到了美洲，被任命为康塞普西翁省军需长官。查卡布科战役时，奥多涅斯就在这个职位上。现在他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日子。远征军由曾在 1814 年征服过智利的奥索里奥统帅。

远征军在 1817 年年末从秘鲁首都利马的卡亚俄港启航，第二年年初在隆隆的礼炮声中登陆。佩苏埃拉计划的中心是保住智利的塔尔卡瓦诺，如果这里陷落了，就取消入侵的计划；如果它仍在保皇军手里，就在这里登陆，进犯智利。但阿根廷和智利联军早有戒备，部署在智利中部和南部，准备迎接来犯之敌。

保皇军来犯的最早消息是 1817 年 12 月 8 日传到智利的。圣马丁没来得及制定出具体的作战方案，但出于慎重，他采取了对付一切可能出现的险情的措施。

奥希金斯确知敌人将从塔尔卡瓦诺入侵后，即按照圣马丁的部署，从康塞普西翁撤退，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得不到生存的基本物资和运输工具。为了表明他必胜的信心，奥希金斯下令宣布了智利共和国的独立。

智利独立早已成为事实。但此时此刻宣布独立是对占据国家半壁江山和全部海岸的敌人的挑战，同时对于确定斗争的性质和坚定地高举真正革命的旗帜有着重要的意义。宣言宣告，以人民的名义庄严宣告独立，智利的大陆及其附近岛屿事实上和法律上构成了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的国家，永远脱离了西班牙君主国。

在庆祝查卡布科战役一周年的礼炮声中，智利共和国诞生了。这是在圣马丁主持下成立的南美洲第一个共和国。

坎查拉亚达：小败，但带来了大胜。

到 2 月底，已经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敌人要从塔尔卡瓦诺入侵。因此，奥希金斯将部队部署在塔尔卡瓦诺以北 100 公里的地方。3 月 4 日，奥索里奥渡过毛勒河，未遇任何抵抗。圣马丁命令奥希金斯部队进一步向他靠拢。3 月

14日敌军继续前进，阿智联军开始反攻。

3月16日上午，阿智联军开始向前推进。奥索里奥发现自己离根据地太远了，于是大举撤退。得知这一消息，圣马丁认为敌人要退回毛勒河南岸，于是兵分两路，包抄敌人，以阻其过河，断其退路，迫其决战。

两军在塔尔瓦诺郊区摆开了战场。保皇军选择了有利地形。两军阵地中间的一片土地叫做坎查拉亚达，地形十分复杂，崎岖不平，沼泽密布，沟壑纵横，极不利于骑兵作战。但阿智联军的巴尔卡塞将军却将1 500名骑兵全部展开在一狭长地带，并下令全力向敌发起正面攻击。结果因地形所致全军乱了阵脚，西班牙炮兵集中火力猛轰，掩护步兵反击，尽管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打退了爱国军的进攻。

坎查拉亚达一带地形复杂，极不利骑兵作战。圣马丁由于对地形特点不够了解，布署不当。当他发现失误时，又没有及时改正，决定了这次战役的失败。敌军利用阿智联军长途奔袭、立足未稳，以夜战突袭疲惫之师，终获小胜。

保皇军将领们召开联席会议，认为坚持阵

地战于己不利，奥多涅斯提出大胆出击，主张利用夜色的掩护出其不意地突袭圣马丁，乘机突围，并自告奋勇打头阵。多数将领都支持他。

晚 7 时 30 分，奥多涅斯检阅了西班牙军，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8 时下令出发。其右翼行动最快，首先与阿智联军的骑兵遭遇。奥多涅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极大地鼓舞了西班牙士兵。

奥希金斯率部英勇抵抗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无奈寡不敌众，双方局部战场上的兵力众寡悬殊。他的坐骑中弹倒毙，当他又跨上副官给他的另一匹马时，他自己的肘部也中弹受伤了。这时失去指挥的联军阵地乱作一团，奥多涅斯乘胜攻上几个小山头，命令向四下猛烈射击。居高临下的猛烈火力压制住了奥希金斯的反攻。设在小山脚下的联军总司令部已在枪弹射程之内，站在圣马丁身边的一名副官中弹身亡。圣马丁愤怒已极，甚至有些失却了惯有的冷静。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并开始收拾残部，组织反击。一阵混战之后，他不得不率部撤退，但敌兵紧追不舍。奥希金斯随后也率残部撤了下来。

危急时刻阿智联军的侧翼部队赶到，牵制住敌人，遏制了对圣马丁和奥希金斯主力部队的追击。圣马丁和奥希斯率军撤到圣费尔南多，在那里收拾溃散的部队。奥希金斯因肘伤发着高烧，需要回首都圣地亚哥治疗休养。

坎查拉亚达一仗虽然失败了，但阿智联军的人员损失不大，除被俘和溃散人员外，大约阵亡120人。损失最严重的是装备，阿根廷的安第斯炮兵损失22门野战炮，全部弹药毁于一旦。但阿智联军核心保存了下来，而有了这股力量，美洲的独立就能得救。保皇军的伤亡人数超过200，它的损失同样严重。

然而，坎查拉亚达战败的消息于3月21日传到圣地亚哥后却引起了一片大恐慌。人们认为一切都完了。谣言四起，说圣马丁已死，有人还肯定地说见到了他的尸体。又有人说奥希金斯受了致命重伤，生命危在旦夕。恐怖情绪瘟疫般迅速蔓延开来。城市中已能偶尔听到“国王万岁”的喊声。保皇派兴高采烈，弹冠相庆。首都已岌岌可危。

奥希金斯得知首都发生的变故，不顾枪伤未愈，日夜兼程地赶回圣地亚哥。3月24日上

午，全城鸣放二十一响礼炮，所有教堂的钟都被敲响，通报他的到来。他马上开始整顿局势，重新组建军队。

3月25日下午，圣马丁在骑兵的护卫下抵达圣地亚哥。他身着骑兵掷弹团的制服，斗篷上染满征尘。人们欢呼着迎接他。他和奥希金斯会谈两小时后，在供他下榻的主教大厦前激情无限地发表了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演说："智利公民们！……现在是你们清醒的时候了，你们看到祖国的军队光荣地与敌作战的时候了。你们的战友们将很快地集合起来，爱国主义这个财富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祖国还在，而且必胜。我坚持我的誓言：不久即给南美洲带来光荣的一天。"

圣马丁刚刚洗去征尘，就召开了作战会议。决定在首都进行保卫战，以逸待劳，寻机与敌决战。弹药不足和大炮损失的问题再次由修道士贝尔特兰来解决。他领导的兵工厂招募了大批工人，整日生产不断。不久整个大军又重新装备起来了。

圣马丁在圣地亚哥城南10公里的迈普平原建了一个练兵场，骑兵掷弹团和轻骑兵、两

个步兵营及新组建的炮兵都驻扎在那里。在距此24公里的兰卡瓜部署了骑兵先头部队；与此同时，为防不测，他向科金博省下达密令，以该省为集中点，并从圣地亚哥到拉塞雷纳沿途设立了仓库，准备迫不得已时向北撤退。他甚至还设想了如果不能北撤而必须再次翻越安第斯山的情况，因此命令在山路旁的一些地方设置了弹药库，各个山口隘道都派民兵把守。坎查拉亚达战败后十天，联军休整一新，即将投入新的战斗。现在阿智联军拥有9个步兵营，其中5个智利营，4个阿根廷营，近4 000人；3个骑兵团，阿根廷两个，智利一个，共1 000多人；炮兵拥有22门大炮。全军共5 000多人。安第斯将军已成竹在胸，满怀信心地等待着敌人的到来。

迈普：决定命运的一战

坎查拉亚达之战并非决定性的一仗，双方的溃散程度都很严重。胜利者的损失甚至比战败者更大，而且，它的骑兵疲惫已极，装备很差，无论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不及阿智联军的

骑兵。尽管如此，西班牙军总司令奥索里索还是想继续前进，扩大战果。20日他终于率队北上。这时已重振旗鼓的阿智联军撤往圣地亚哥，在那里严阵以待。新战在即。

北上途中，奥索里索开始怀疑他所取得的胜利的重要性。阿智联军在他的面前神秘地消失了，但他清楚地知道，对方一个相当于他一半兵力的纵队完好无损地撤走了。他没有追上一支象样的敌军，甚至连他的先头部队也没有遇到几个逃散的敌人。所经之处，满目疮痍，凋敝不堪，荒无人烟，部队无法就地补充给养。打探不到敌军的任何消息，部队盲目地摸索前进，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就这样，战战兢兢的西班牙军直到28日才摸到已被阿智联军放弃的圣费尔南多。

3月31日，5 500人的保皇军渡过了卡查波亚尔河。奥索里奥命令侦察地形，小心翼翼地前进，4月2日下午才到达迈普河左岸。翌日清晨渡河，扎营于右岸，以图控制通往圣地亚哥的道路。

一贯畏葸不前的奥索里奥，得知原以为在坎查拉亚达受挫而溃败的阿智联军正在前方等

待与他决战，便于4日召开了作战会议。他建议撤往当时被西班牙舰队封锁的瓦尔帕莱索，在那里建立新的作战基地，将来获胜的可能性较大。但包括奥多涅斯在内的主要将领们强烈反对，于是会议决定次日与敌决战。此时双方军队相距不足4公里，激战一触即发。

这次战役的战场是一片平川。东面马波乔河；北面是山地，将这里与阿空卡瓜谷地相隔；南面是迈普河，平原即由此得名；西面是一系列的丘陵矮山。平原上是青一色的牧草，偶有几丛带刺的灌木打破直伸向天际的单调景色。再远眺，这块谷地的四周是蜿蜒的群山，远天映衬出它清晰的轮廓。圣地亚哥南面有一带绵延10余公里的石灰岩小山，人们依其外貌名之为“白山”。阿智联军就驻扎在“白山”脚下。

圣马丁将司令部设在白山东端，距圣地亚哥10公里。从这里能够控制通往迈普河上三个渡口的三条路的汇合点和通往瓦尔帕莱索的路，这样既可以保障安全撤退，也在最易被突破的两个地点加强了首都的防卫。为安全起见，首都圣地亚哥修筑了工事，留下1 000名民兵和一个营的正规军防守，由受伤未愈不能

亲临战场的奥希金斯指挥。圣马丁的计划是，如果敌人从正面进攻，自己在敌军运动中发起攻击，不给敌人喘息协调行动的时间；如果敌从侧翼进攻，就攻敌之右翼，并切断其去瓦尔帕莱索的退路。地形于阿智联军非常有利，圣马丁胜券在握。

安第斯将军成竹在胸，也非常善于以自己的信心影响全体官兵。他进行了战前动员，向各级军官作了详细的部署，在作战训令中，他命令给每个士兵配发 100 发子弹和 6 块石头；在投入战斗前给每人一份两公升的足以使僵尸复活的烈酒；军官们要对各自的部队进行动员，教育士兵英勇作战，严惩畏战怯战者；特别强调了如果看到某个兵团撤退，那是根据总司令的命令欺骗敌人的诈术。此外，还对各个部队的具体作战行动详细说明：总司令部的标记是一面三色旗，当升起智利的三色国旗、阿根廷的两色旗和一面红旗时，所有部队都要高喊"祖国万岁"并立即与当面之敌展开白刃战。圣马丁还向各级将领详细说明了敌军各兵团的制服和军旗，当说到敌军主力布尔戈斯团时他特别补充道："对这个团应该凶狠，因为它是敌

军的希望和支柱。”他命令骑兵要勇猛冲锋，因为这是美洲骑兵的特点。最后他对军官们说："这次战役将决定整个美洲的命运。与其死在我们的刽子手刀下，不如在光荣的战场上英勇牺牲。我深信，有了全军将领的协助，我们必定胜利，请诸位记住我的这些建议。”

侦察兵报告圣马丁，敌人要渡河，并有向东推进之势。圣马丁即刻命令全部骑兵进攻敌前哨阵地，骚扰敌前进中的纵队。

4 月 5 日黎明，敌人大举向前推进，扑向圣地亚哥通往瓦帕莱索的大路。圣马丁分析，敌人此举无非三个用意：切断他退往阿空卡瓜的后路，此其一；或作弧形运动，插入他和圣地亚哥之间，此其二；第三，占领通往瓦尔帕莱索的道路，确保自己的退路。对第一点圣马丁早有预料，只需稍稍调整战线即可破敌企图。敌军要实施第二点企图，必须作一弓背形的长距离运动，而弓弦的主动权掌握在圣马丁手里。圣马丁乔装成一农夫，亲自骑马接近敌阵，用望远镜观察敌军运动。他看到敌军侧翼保持着严整的阵形，旌旗招展、战鼓咚咚，已占据了一个三角形的小山。敌军左翼已经到达通往

瓦尔帕莱索的道路。

上午10时30分，阿智联军分成两个纵队平行向西斜刺前进。已经占领了三角形小山的西班牙将军一观察到联军的行动，就派其左翼主力纵队出击，威胁联军右翼，准备从侧面进攻，同时保住向瓦尔帕莱索的退路。

中午12时，两军相对，中间仅隔一狭窄凹地。双方都按兵不动，等待对方主动进攻。这里的地形对主动进攻的一方不利：必须通过一片低洼的开阔地，而那里将是对方发挥步兵和炮兵的集中火力大量杀伤敌人的最理想的屠场；然后还要爬上对面的高地才可能直接攻击对方阵地。但地形对阿智联军更为不利，它的右翼必须首先占领前沿阵地前的敌人占据的一个制高点，否则只能穿过敌炮兵火力控制下的一块空地而导致极大伤亡。

双方都在严阵以待。在体力和士气上，双方不相上下；在武器装备方面，阿智联军的炮兵骑兵在数量上和素质上的优势非常明显，但其步兵与西班牙军相比则略逊一筹。唯一能使胜利的天平偏向一侧的砝码，只有两军总司令的头脑了。双方阵地的地形和兵力部署几乎一

样，但西班牙保皇军将其防线向中间收缩，暴露了两翼，这里就为阿智联军的左翼攻击敌右翼提供了机会。

联军左翼向敌右翼进行猛烈穿插，揭开了迈普战役的序曲。圣马丁见敌人对此没有反应便命令4门大炮开火，以侦察敌炮兵的火力和部署。西班牙炮兵立刻还击，暴露了自己的阵地。显而易见，奥索里奥准备进行防御战，他的布阵形式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打算集中优势部队收缩于防线中间，发挥自己步兵火力的优势，在中间空地上与圣马丁决战。这首先取决于能否大规模地杀伤联军的有生力量。圣马丁则巧妙地避开敌的正面主力，他一下子就发现了敌人最薄弱的地方是它的右翼，于是命令第一攻击部队全力猛攻。战略预备队和炮兵则原地待命，伺第一梯队攻击的战果见机行事。

联军的攻击从右翼开始，要达到两个目的，将敌左翼赶出阵地进而威胁敌防线中心，同时吸引敌注意力以利于拉塞拉斯率领的预备队抄敌后路。胜利的关键就在于适时地动用预备队了。拉塞拉斯率领安第斯军的主力第十一

营，一枪不发地悄悄摸向敌后。同时骑兵掷弹团的骑兵开始发起冲锋，攻击敌人一炮兵阵地。这时第十一营已暴露在敌炮火下，伤亡很大，但并没有放慢穿插的速度。这时骑兵已冲上敌人阵地。但就在这关键时刻，保皇军觉察出暴露右翼的错误，于是开始反攻。奥多涅斯亲率两个营大胆出击联军左翼，一时竟压制住了联军的进攻，形势极为危急。

圣马丁一直在白山的地上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沉着冷静地指挥。他把司令部前移到拉塞拉斯占领的阵地，就近指挥。当他发现左翼失利部队后撤时，他命令预备队前去支援，自己也亲率卫队赶到，炮兵集中火力向敌猛轰，终于将战局扭转过来。

保皇军骑兵左翼孤立无援，圣马丁命令轻骑兵和长枪骑兵冲击敌左翼骑兵，西班牙骑兵溃退了。但最后的战斗要由双方的步兵来决定胜负。

一直没有投入战斗的保皇军的核心和支柱布尔戈斯团这时打出它特别醒目的军旗，士兵们高喊："布尔戈斯团在此。18次胜仗，从无败仗。"战斗随着它的出现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

保皇军高呼“国王万岁”，阿智联军高喊“祖国万岁”。喊声震天，杀声动地，双方都在决一死战。联军拼命猛攻，保皇军殊死防守，一时间战场上直杀得天昏地暗，鬼神皆惊。

阿智联军三军发起了总攻。布尔戈斯团的军旗舞动，士兵们仍在决死抵抗。奥多涅斯率部背水一战。恰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西班牙总司令奥索里奥撤离战场、逃之夭夭了。保皇军军心开始摇动。企图力挽狂澜的奥多涅斯接管了指挥权，继续顽抗。但此时阿智联军的包围圈已越缩越小，两军开始了肉搏战。布尔戈斯团组成方阵，继续打退阿智联军的一次次进攻，但自己的伤亡也越来越大。这样的激战已持续了半小时，保皇军被团团围住，人困马乏，外无救兵，但其阵形未乱。保皇军的最后希望寄托在骑兵预备队的增援上，但此时骑兵已被拉塞拉斯的部队阻击，自身难保，逃命去了。无奈之中奥多涅斯只得组成密集队形，向一庄园撤退。

战役尚未结束。已是下午5点，太阳落在地平线上。残阳如血。奥多涅斯占据了庄园，负隅顽抗。他准备抵挡一阵，然后乘夜色率军

突围。他巧妙地部署了兵力，用仅存的两门炮封锁了进入庄园必经的一座小桥，并炸毁了桥梁。

但西班牙军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了。阿联军全线攻击这座孤零零的庄园，17 门大炮齐射，顷刻间庄园变成了一片火海……。

这一天战果辉煌。阿智联军打死敌军 1 000 多人；俘敌将军 1 名，上校 4 人，中校 7 人，尉官 7 人，士兵 2 200 人；缴获大炮 12 门、军旗 4 面，步枪 3 800 支，马枪 1 200 支，还有大量的金钱和弹药。

这次战役是南美独立战争中最激烈的一仗。阿智联军伤亡 1 000 人，库约省被解放了的黑人奴隶贡献最大，他们当中一多半人长眠在这片土地上。

迈普之战无论从政治上或军事上，都是美洲解放运动中第一次伟大的战役。就其重要意义而言，只有后来的博亚卡和阿亚库乔之战可与之相比。但是，没有迈普之战，就没有博亚卡之战，也不会有阿亚库乔之战。假如联军在迈普战败，智利的解放事业就会夭折；唇亡齿寒，孤立的阿根廷革命也将朝不保夕、岌岌可

危。尤其重要的是，没有智利就不能控制太平洋，远征秘鲁就根本不可能，玻利瓦尔即使在北方战胜了西班牙军队，也不能向南推进，而他一旦南下，将会遭到3万敌军的抵抗。此外，迈普一战一劳永逸地破坏了西班牙美洲的军事力量的神经；使北起墨西哥南到秘鲁所有的保皇派都萎靡不振，给为了独立事业而艰苦斗争的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希望。查卡布科一役是对西佩西佩一战损失的补偿，而迈普之战则是此后一连串胜利的契机。而这次胜利是由一支数量上处于劣势、15天前刚刚战败的军队取得的，其军事意义因此就更大了。

安第斯军过山和查卡布科战役已经开始使西班牙美洲独立革命的天平倾斜了，迈普之战使革命占了优势。与此同时，在南美洲北部革命也在前进，玻利瓦尔正在委内瑞拉与莫里略进行英勇的斗争。北方的解放者也将采取和圣马丁一样重大的行动，从赤道附近翻越安第斯山，一年后将在堪与迈普之战相比的博亚卡战役中获胜，收复新格拉纳达，接近太平洋，并且也像南方的解放者一样向秘鲁挺进。智利和拉普拉塔联合省已经是不可战胜的了，北方的

武装革命也将在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和基多获得同样的战果。斗争就这样围绕着一个中心进行。在南北两端被战败的保皇势力向其最后的堡垒集结，并将在那里彻底投降。在这个伟大的战略转折时期，最后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保皇派在南方只有下秘鲁和上秘鲁，在北方只有基多和新格拉纳达了，在委内瑞拉正作最后的挣扎。

由于英勇抵抗拿破仑和与英国结盟而在欧洲获胜的西班牙，竭尽全力对付美洲起义。但它与邻国葡萄牙和盟国英国在新大陆的政治利益是公开对立的，在国内又深为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所困扰，西班牙终于不得不停止向美派遣远征军了。在连续8年的战争中，西班牙向美洲派了16支远征军、总计42 100多人，耗资无数。这些部队都由久经沙场的士兵组成，他们是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中的凯旋者，但在新大陆却连遭厄运。

1815年莫里略率领1万人的远征军是宗主国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努力。这次远征的原定目标是阿根廷，后来改为中美地峡一带，它的残部徒劳地消耗在镇压哥伦比亚的起义斗争

中。尽管如此，西班牙在美洲，北起墨西哥南至秘鲁，仍拥有10万正规军和民兵，还准备再组织2万人的远征军讨伐拉普拉塔。西班牙得知迈普惨败的消息之前，在加的斯招募了3 000人，准备远征智利和秘鲁。

这就是1818年底拉丁美洲革命战争的格局，这时圣马丁和玻利瓦尔在分别消灭了南方和北方的敌人之后，正准备在秘鲁给殖民主义势力以最后的致命打击。

从海上进攻：太平洋首次海战

迈普之战肃清了智利全境的西班牙势力，通往秘鲁的海路已呈现在阿智联军脚下。

智利的国土是一条又窄又长的带子，一边是傲岸的安第斯山，一边是浩瀚的太平洋。一位作家曾诙谐地说智利人必须抓住大山，不然就得坠入大海。海洋是智利陆地的延伸，这种环境使得全国人民的天才和智慧都向海上发展，这是本能，也是需要。

由于这个国家没有内河航运，一些地区又为自然地形所阻，海运就成了人们惯用的交通

手段。从根本上讲，智利是一个海洋国家，人民喜欢大海，有建设海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正如圣马丁所说，适宜的地理位置，加上热爱大海的人民，就是建立海军的基本条件，就可以决定革命的命运。

圣马丁于1816年制定的收复智利的计划中，就有了与陆军越过安第斯山的同时应进行海上远征的设想，以便控制和收复智利的沿海地区。由于没有海军力量，致使查卡布科战役的胜利未能结束战争，大量的敌人占据着港口，得以逃脱。为此，圣马丁在查卡布科和迈普战役后4次翻越安第斯山，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寻求阿根廷共和国的支持来建立一支太平洋舰队。没有这支海军，要取得南美洲的独立是不可能的。

太平洋海域第一艘高悬独立的智利国旗的是西班牙220吨的“雄鹰号”。查卡布科战役后，瓦尔帕莱索要塞按圣马丁的命令仍悬挂着西班牙国旗，“雄鹰号”就这样中计，驶进港后被俘。圣马丁命令将其改名为“普埃雷东号”，以此向全力支持远征的阿根廷最高领导人普埃雷东将军表示敬意。

此后，奥希金斯又组织购买了英国的一艘800吨的护卫舰，装备44门炮，命名为“劳塔罗号”，以纪念拉美革命的先驱组织“劳塔罗”共济会。

迈普战役胜利后，奥希金斯认为使用这支小小的海军力量的时机已到，于是命令“劳塔罗号”和“普埃雷东号”出海寻找封锁瓦尔帕莱索的西班牙巡洋舰。当时，西班牙舰队控制着从秘鲁到合恩角的太平洋海域，共有17艘军舰，331门炮。这支强大的舰队还将得到当时从加的斯启航驶往智利的由“玛丽亚·伊萨贝尔号”护航的11艘运输舰的支援。“翡翠号”、“复仇号”和“佩苏埃拉号”担任着封锁瓦尔帕莱索的任务。

封锁瓦尔帕莱索的三艘西班牙军舰不断到港口附近游弋，骚扰进出港的中立商船。有时它们也靠近海岸，打几炮后扬长而去，消失在海天之间。4月底，统一指挥封锁的“翡翠号”舰长命令“复仇号”把舰队的病号送回卡亚俄基地。智利舰队利用这个机会，用“劳塔罗号”和“普埃雷东号”出击，打跑了“翡翠号”和“佩苏埃拉号”，解除了它们对瓦尔帕莱索的封锁。

智利政府又购买并备装了几艘战舰，成立了自己的堪与西班牙太平洋舰队相比的舰队。南美洲革命在结束了陆地上的第一个大战役后，扩展到南部海域，将根据圣马丁的计划把独立带给其它地区的人民。

曼努埃尔·布兰科·恩卡拉多被任命为舰队司令。他是智利人，当时年仅28岁，年轻的智利舰队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年轻人身上。

1818年5月21日，11艘运输舰组成的西班牙远征队，由“玛丽亚·伊萨贝尔号”护航，载着2万多士兵和8千多条步枪驶离西班牙加的斯港，驶往太平洋。这支远征队在航行中因气候恶劣损失很大，削弱了原有的力量。阿根廷政府首先得到有关这支舰队的情报，即派两舰并入智利舰队，并由陆路送情报提醒智利政府做好迎战准备。

拥有142门舰炮和100名海军官兵的智利舰队于10月19日上午起锚出港，奥希金斯亲自到瓦尔帕莱索为这支由4艘战舰组成的舰队送行。

在塔尔卡瓦诺附近，智利舰队与停泊在那里的西班牙舰队遭遇。港内岸防火力很强，保

护着西班牙军舰。“玛丽亚·伊萨贝尔号”一望见智利战舰就升起国旗并放了一声空枪，要求来舰亮明国籍。智利舰队中以圣马丁的名字命名的“圣马丁号”回放了一声空枪，并升起英国国旗，继续向西班牙战舰靠拢。当进入到敌舰步枪射程之内时，换下英国旗升起了智利国旗。起初西班牙军舰还在犹豫不决，但很快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一声炮响，舷炮齐发。智利舰队集中炮火予以还击。这时因距离太近，西班牙的岸炮已不能再发炮了，因为那样会误伤己舰。西班牙护卫舰寡不敌众，砍断缆绳欲退往公海，但不料慌乱之中在港区搁浅，动弹不得。智利舰队集中全部炮火猛轰已成为死靶的“玛丽亚·伊萨贝尔号”，终于迫其降下国旗投降。舰上70名水兵和5名军官一起作了俘虏。智利舰队将俘舰“玛丽亚·伊萨贝尔号”改名为“奥希金斯号”。

智利舰队现已拥有5艘战舰，与阿根廷的两舰会合后已拥有234门火炮，实力大增。

随后西班牙远征队有五艘运输舰相继落入智利手中，700名士兵随舰投降。西班牙为了收复失去的殖民地而竭尽全力组织的最后一次

远征就这样的彻底失败了。这对宗主国是致命的一击。从这时起，西班牙舰队永远失去了对太平洋的控制，4年前圣马丁预见的远征秘鲁的道路被智利海军打通了。

几天以后，又一艘智利战舰在瓦尔帕莱索靠岸，并且带来了战功卓著的英国第一流海上英雄托马斯·亚历山大·考克拉内。他的名字曾响彻各个海域，今后他又将在美洲书写他更大的光荣。

智利舰队司令布兰科虚怀若谷，虽然他率舰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为了解放大业，他主动辞去职务，让位于考克拉内。

控制太平洋海域是远征秘鲁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圣马丁在查卡布科战役后就说明过这点。缴获了“玛丽亚·伊萨贝尔号”及其护航的几艘运输舰之后，新生的智利海军实力大增，但还没有掌握绝对的制海权，还不能控制从奇洛埃到巴拿马的太平洋海岸，也没有使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海军变得无所作为，尽管西班牙海军处于不利地位，但还能与智利舰队较量，而且，根据来自西班牙国内的消息，它的太平洋舰队将得到两艘运输舰和一艘护卫舰的

增援。考克拉内被任命为智利舰队司令后，接到命令，要他最终控制制海权，如果可能的话，就摧毁敌人的舰队或把它封锁在港内，并在海上阻击其援军。

考克拉内在上任20天后，即1819年1月14日，就率领四艘军舰离开了瓦尔帕莱索港，出海寻敌。这次出海他没有取得显赫的胜利，但他主要目的之一已经达到，他已将西班牙海军困在卡亚俄。

1819年9月28日，考克拉内率舰队到达圣洛伦索港，30日即派代表上岸向西班牙舰队挑战，邀其离港出海，进行舰对舰炮对炮的海战。西班牙方面断然拒绝，并作好了抵抗智利舰队进攻的充分准备。

考克拉内的计划是用四只坚固的木筏打入敌人港口，两只木筏上满载炸药，另两只上安装迫击炮，舰队主力则在原地停泊，待木筏攻击得手后再大举进攻。但由于浪高波大，木筏难于操纵，进攻失败。而敌舰在港内以舰炮猛烈攻击智利舰队，还使用了燃烧弹。考克拉内的几艘战舰受伤，被迫撤离战场。

智利舰队司令在连连失利后，转而决定进

攻瓦尔迪维亚。瓦尔迪维亚是兵家必争之地，极为险要，素有“美洲直布罗陀”之称。

1820年1月28日，悬挂着西班牙国旗的“奥希金斯号”驶入瓦尔维亚。西班牙误以为这就是他们翘首企盼的增援舰只。考克拉内要求派来领港员，对方立即派来了领港员，还有一支仪仗队。考克拉内从领港员那里获得了一切必要的情报，并得知有一只双桅船载着驻军的军饷已从利马驶来，即将抵达。当西班牙人终于识破他的诡计时，考克拉内已成功地率舰侦察完港内地形出港溜走了。两天后，在港外考克拉内捕获了敌人的军饷船，但他自知没有足够的兵力进攻瓦尔迪维亚，于是决定到塔尔卡瓦诺去搬援兵。

“奥希金斯号”于2月2日抵达塔尔卡瓦诺港，在那里正好遇上阿根廷的双桅船“无畏号”和智利的“莫特茨玛号”，两舰立即随同考克拉内调转船头，扑向瓦尔迪维亚。

一场激战之后，胜利终于属于智利舰队。考克拉内率舰队于2月5日占领了瓦尔迪维亚城。这样一来，保皇势力就失去了在智利南方的作战基地。

智利的领土完整了，不会遭到任何侵略了。太平洋海峡已被智利海军控制。英勇的智利舰队扫平了远征秘鲁的道路。

前进的道路已在圣马丁脚下展开，但这时他的祖国却又一次陷入内乱之中。从西班牙传来消息，费尔南多七世正在策划派遣一支两万人的庞大远征军来镇压阿根廷革命。后来才确切得知这支入侵部队的真正目标是委内瑞拉，但这个消息还是在阿根廷引起了巨大的恐慌。新的恐惧彻底摧毁了本来已很脆弱的政府。普埃雷东被迫辞职，让位给新的领导人。圣马丁接到要他率领阿根廷军队回国的命令。圣马丁又一次翻越安第斯山，回到了门多萨。但他只带回了少量部队，安第斯军主力仍留在智利。他这样做，是避免把他的远征军断送在纠缠不清的国内是非中，因为他的目标始终如一，不可改变，那就是远征秘鲁，给整个南美大陆带来和平和安宁。

但阿根廷新政府却对圣马丁的抗命行为极为不满。圣马丁知道，从此他再也不能指望得到阿根廷的援助。他把妻子和女儿梅塞德斯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自己辞去了阿根廷军队总

司令的职务。他返回智利时，已没有了军衔，但为实现伟大事业而斗争的雄心丝毫没有改变。奥希金斯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欢迎他的归来。在进入首都圣地亚哥之前，奥希金斯授予他智利准将的军衔。

安第斯军的大部分官兵决定违抗自己政府的命令，留下来同他们的总司令一起去实现进军秘鲁的理想。圣马丁的行动在阿根廷遭到谴责，他已不再是公认的民族英雄，而被指责为叛国，为智利人所收买。圣马丁承受巨大的被自己的祖国和同胞所误解的心灵创痛继续日以继夜地准备远征。因为他非常清楚自己肩负的使命，任何时候都不曾动摇过。与和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伟大人物不同，他认定自己首先是一个美洲人，然后才是阿根廷公民。

秘鲁：西班牙在美洲最后的堡垒

圣马丁开始远征秘鲁时，南美洲的革命将在大陆的中部实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会合。这个地方就是秘鲁。

秘鲁是第一个唤起起义思想反对宗主国的

殖民地，征服者们自己焚毁了王国的国旗，在新大陆高举起第一面造反的大旗，以美洲大陆自己的名义进行战斗。18世纪末，那里爆发了土著人图帕玛鲁试图恢复印加帝国的起义。但这些运动都没有深厚的基础，不是带有政治和社会进步性的真正的争取解放的革命。这些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大地就一片沉寂了。

秘鲁就这样孤立于整个时代的大变动之外。1809年和1810年，当西班牙美洲殖民地几乎同时自发地来反抗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时，在秘鲁内部却几乎感觉不到孕育着新生命的躁动。并不是因为没有独立的萌芽，也不是这个民族天生驯顺怯懦。所缺的只是力量的联合和全民族的团结，而富饶的秘鲁恰恰不具备这些宝贵的品质。

利马是这个殖民帝国的心脏。它位处安第斯山西侧，依山傍海，城市所处的谷地中景色秀丽，物产丰饶。

卡亚俄是利马的港口和海上屏障，主宰着海上航行，垄断着贸易，就其重要性而言，堪称南美洲的首府。其富有可与墨西哥比肩，其重要可与西班牙的主要城市相比，甚至不亚于

马德里。卡亚俄有坚不可摧的城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要塞内炮台林立，西班牙在美洲大陆上和太平洋中最强大的陆军和舰队驻扎在这里。在它的卫护下，它自己和利马固若金汤，西班牙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它有陷落的那一天。

秘鲁在纬度上地处热带，但由于境内地势高低起伏，高山深谷平原杂处其间，故气候也多种多样，差异甚大。那里杂居着多种族、多民族的居民，他们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极大、社会地位也有着天壤之别，相互对立，甚至白种人也因来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而互有交恶。而在沿海、安第斯山谷地和山区，土著民族的影响则占明显优势。

这就是秘鲁。它有它的弱点，但它是南美大陆保皇势力的中心和神经中枢，有着极雄厚的实力，曾一度几乎控制了整个南美洲的革命，使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延续了15年之久。可以说，秘鲁是圣马丁的迦太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820年圣马丁和玻利瓦尔一南一北同向秘鲁进军。

秘鲁变成殖民主义势力地南美洲的最后也是最强大的堡垒，原因很复杂。其中固然有政

治和地理上的原因，也与其社会结构密切相关。

拉美独立革命爆发时，秘鲁有150万居民，比拉普拉塔联合省和智利两国的人口总和还多得多，再加上秘鲁(即今玻利维亚)的人口，有将近200万之众。但是居民成分极复杂。其中土著人占一半以上，印非混血种人占五分之一，黑奴约5万人，西班牙人仅占人口总数的七分之一。这样复杂的居民构成，没有共同的利益，因此也就没有民族凝聚力可言，民族团结从何而来？因此，秘鲁居民不能有阿根廷和智利人民那样的全民族反抗，最后只能由别国人民给自己带来独立的自由。

1810年南美洲革命爆发时，赫塞·德·阿瓦斯卡尔正担任秘鲁总督。尽管他年事已高，但却不昏庸。他富于军事和政治才能，性格坚定，处事谨慎而果断。他在南美大陆上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时，处境孤立，却成功地将秘鲁变为殖民势力的坚固堡垒和保皇派的中心。他尽一切可能推迟了革命胜利的到来，他将秘鲁变为保皇势力的大本营，使其攻守自如；他组织了强大的军队，扑灭了北方基

多的起义，占领了上秘鲁各省，遏制了阿根廷革命由陆路向北的推进；1814 年再次征服了智利，控制了太平洋。

阿瓦斯卡尔是一位铁腕人物。经过 6 年的惨淡经营，他戡平了除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一部分以外的整个南美大陆。如果不是圣马丁在 1817 年收复了智利，阿瓦斯卡尔就会派 12 000 或 15 000 人从北、西两侧入侵阿根廷，自上秘鲁南下，自智利东进；北上新格拉纳达，与莫里略会合，并阻止玻利瓦尔的前进。南美洲的独立战争，尽管在相隔遥远的南北两个基地还未被战胜，但处境孤立，有很大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被慢慢绞杀的现实可能性。当革命越过安第斯山开始了反攻时，秘鲁的殖民势力开始收缩，退入山地之中，但始终高举着西班牙王国的旗帜。

更重要的，阿瓦斯卡尔创建了一个美洲保皇党，在争取独立的各殖民地挑起了内乱，大力支持忠于国王的保皇派，使大多数内乱发展成内战。他以为数不多的西班牙部队为基础，在山民中招募了大量士兵，组成了一支新的殖民军。这些山民们吃苦耐劳，头脑简单精神狂

热，常年的高原生活造就了他们强健的体格。阿瓦斯卡尔成功地向他们灌输了忠于国王的思想和为国王而战的狂热，组成了一支不惧强敌的美洲保皇军。正是这支军队完全依靠美洲殖民地的力量坚持镇压独立起义的战争达 4 年之久。后来这些部队得到了来自西班牙的远征军的增援，但土著人始终是军队的核心。他们开始时由秘鲁军官指挥，后由久经沙场的西班牙将军们统率。他们虽然在查卡布科、迈普和阿根廷北部边界遭到重创，但在秘鲁国土上仍是一次强大的军队。武装起来的秘鲁是保皇派的希望，是对整个美洲的威胁。它的存在，使美洲的自由永远无法得以最后实现。这一点，圣马丁一开始就懂得，所以他说，利马不克，战争不止。

虽然是殖民势力的老巢和堡垒，但并不意味着在秘鲁不存在反抗。只是因为秘鲁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使这种反抗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失败的代价也更高。在拉美革命的第一个高潮，也就是 1810 年至 1816 年间，秘鲁也曾发生过革命起义，但同其它殖民地一样，被无情地镇压下去了。这样一来，革命就

伤了元气。秘鲁的革命力量本来就极其薄弱，因为内部缺乏团结和联合，也因为反动势力的强大，这种力量始终没有发展壮大。但历史不能忘记秘鲁人民在革命的远征中的功绩。他们参与了准备工作，为远征铺平了道路，为最后的胜利作出了牺牲。

迈普战役和控制了太平洋海域后，圣马丁和奥希金斯即宣布两国联军将前往帮助秘鲁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实现解放秘鲁的伟大远征。智利舰队出现在秘鲁沿海，圣马丁、奥希金斯的声明传遍了秘鲁全国。这一切都使秘鲁人民重新燃起了自由的希望。他们密切配合圣马丁进军的准备工作，为远征军提供情报。

1819 年底和 1820 年初，秘鲁在精神上已经开始革命了。总督已经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颤抖。佩苏埃拉在这种恐怖之中煎熬了两年，从 1818 年到 1820 年，时刻等待着圣马丁的进攻。面对圣马丁远征的威胁，他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加强下秘鲁的兵力。为此从上秘鲁调来一部分部队作预备队，这就造成了他和上秘鲁军总司令拉塞尔纳将军之间的严重不和，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当时在西班牙的国旗下保卫秘鲁的军队有两支主力，一是保卫利马的下秘鲁军，8 000 多人；一是上秘鲁军，7 000 多人。此外，还有各要塞的守军和两个机动师，总兵力达 23 000 千多人。而当时圣马丁的远征军仅有 4 000 人，阿根廷 2 000 人，智利 2 000 人。

这就是 1820 年圣马丁开始远征时他的敌人所拥有的以及他自己所拥有的。一次力量众寡悬殊的远征就这样开始了。

解放秘鲁：初战

“我将追随召唤我的命运的时刻临近了。我即将开始给秘鲁带来自由的伟大事业。即将开始我们革命最值得纪念的战役，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的这次战役的结果；等待着宣布我们是叛乱分子，如果我们战败了；等待着承认我们的权利，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的命运，这个广袤大陆的希望，我们家庭的命运、我们朋友的幸福，总之，最神圣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荣誉，都取决于我们这些权利。我坚信我们的事业的正义性和上帝的保佑，因此向你们保证

胜利。我们革命最伟大的一天就要破晓了。”圣马丁在远征秘鲁开始时对智利人和阿根廷人如是说。

1814年，当圣马丁任北方军司令时就指出了南美洲革命新的军事路线，他说：“我们不到利马，战争就不会结束。”

在经过深思熟虑并自觉行动的人们的生活中，一种设想是他一生的内涵。圣马丁的一生都包含在一个想法之中，即沿着与直到当时人们还遵循着的路线相反的途径来寻找南美洲革命的军事道路，这使他确定了一个共和新大陆最后胜利的战略点。而战争就恰恰汇集在他确定的战略地点，而且就在那里结束。

远征军命名为“秘鲁解放军”，开始了它的伟大历程。自从南美洲革命爆发和圣马丁收复智利以后，没有任何一个新生的共和国为南美洲的解放作出过如此巨大的努力。安第斯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智利在安第斯军的有效配合下参加了这一行动，这是智利的光荣。奥希金斯在1819年与阿根廷政府商定，由两国负担费用，共同解放秘鲁。他勇敢地担负起这一艰巨的事业，并积极推动其实现，为联合军队争得

了光荣。后来当他回忆起当时的焦虑时，万分感慨地说："我想必每时每刻都在增添着白发。只有智利和美洲未来的命运能够支撑着我的心和我的精神。未曾经历过这种处境的人，不懂得什么叫做指挥。这是我能够奉献给祖国的最值得的牺牲。"

远征的公开目的是根据阿根廷收复智利开创的解放政策去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共和国。圣马丁率先倡导的这一政策带有阿智联盟的印记。奥希金斯在对秘鲁人民的声明中确认了这一点："由查卡布科和迈普的勇士们组成的一支受人尊敬的军队即将占领你们的国土。……你们将是自由和独立的，你们将完全按着你们出自内心的意愿建立你们的政府和法律；这些兄弟们不会对你们的社会规定有任何军事的或非军事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你们可以随时送别去保护你们的这支武装力量；如果不是应其合法行政官员的邀请，任何军队永远不应占领一个自由的国家；很快就要粉碎抵制你们权利的武装力量，我们请求你们在你们光荣的那一天忘却以前的屈辱。美洲自由的日子到了，在从密西西比河到合恩角这个广阔的区域

里宣布新大陆的独立。”

1820年8月20日下午，远征军在礼炮声和以奥希金斯为首的送行人群的欢呼声中从瓦尔帕莱索港启航了。考克拉内登上旗舰“奥希金斯号”乘风破浪率先出港，“劳塔罗号”和“加尔瓦里诺号”护卫两旁。随后，十二艘运输舰载着登陆部队与运载作战物资的其余6艘运输舰组成第二集团出海，“莫特苏马号”和“阿拉乌干号”为其护航。后卫是一字排开的11艘炮艇。“圣马丁号”断后，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都在这艘战舰上，“独立号”为其护航。

一如既往，安第斯将军向所有的人保留了他的作战计划，默默地按自己的判断行动。他只向考克拉内透露了计划的一部分，但考克拉内辜负了将军对他的信任，他渴望统帅整个舰队，不愿绝对服从作战总指挥，不愿接受总指挥的约束。

圣马丁放弃了他原来的计划。他本打算远征下秘鲁南方，进军阿雷基帕或库斯科，目的在于与原来计划进攻上秘鲁的贝尔格拉诺将军配合行动，遥相呼应。现在他已经得不到这一不可缺少的支持了。此外，这个战场本身也没

有什么前途，因为为了在内地进行决战，圣马丁必须放弃天然的作战根据地，放弃与控制整个秘鲁海的舰队的直接联系。而一旦冒险进入南部山区，将遇到三倍于己的敌人。一次力量对比悬殊的胜仗起不了任何决定性的作用，但一仗失败，则会断送整个远征。圣马丁的目标是利马。

圣马丁的计划有三个要点：因敌我力量众寡殊悬，故登陆后避免与敌立即接触；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以免敌人集结；发动秘鲁国内人民的反抗，以配合远征军的行动。这一计划的目的达到了。远征军派小股部队在南部山地进行游击战争，而作战基地在北方；同时不失去对太平洋沿岸的控制，逐步缩小对利马的包围圈，并及时占领它，同时也就占领了半个国家。另外，另一种与整个大陆的解放战争相联系的政治因素在这一计划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更深层次的决定作用。智利政府在决定远征秘鲁时，曾致函当时占领新格拉纳达的玻利瓦尔，以便协调南美洲革命的战略行动，集中全部军事力量攻敌一点。如此，大陆革命通过武装力量联系在一起，政治上在大陆两端得到巩固；

联合力量决战于同一战场，加速最后胜利的到来；将敌人孤立于大陆中部，断绝其与宗主国的联系而最终消灭之。这样，圣马丁的目的和玻利瓦尔的誓言——南美洲独立战争在秘鲁结束——就最终实现了。

这项复杂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要求耐心、机智、时间和空间。圣马丁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为了使敌人相信他进攻的目标是南方，在海上航行了18天后决定在皮斯科登陆。但海军司令的眼睛只盯着利马，表示不同意这一计划。但他面对圣马丁坚定不移的目光时不得不服从命令，他知道该做的是什么和想作的是什么。但当成功一点点来到时，他明白了。圣马丁的灵活和慎重，拥有这样少的兵力，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胜利地指挥这次远征。这使他也不能不折服。

皮斯科海滩是沙岸，逶迤于安第斯山西麓。1820年9月8日上午，由拉塞拉斯率领的秘鲁解放军第一师在帕拉卡斯海湾登陆。晚7时占领帕拉卡斯镇，没有遇到有效的抵抗。13日全军登陆，在钦查谷扎营，并向内地派出侦察部队进行侦察，圣马丁的总司令部设在皮斯

科。

秘鲁总督佩苏埃拉从一开始就搞不清圣马丁的进军意图，只得采取消极的防守态度，处处设防，分兵把守。把兵力分散在从瓜亚基尔到阿里卡自北向南漫长的海岸线上，首都利马重兵把守，上秘鲁军留驻原地，预略队驻扎在山区，坐等圣马丁的到来。结果，虽然在每个可能的登陆点都有西班牙军守卫，但由于兵力分散，哪里都无法对圣马丁的远征军形成局部战场的压倒优势，构不成对其登陆进攻的有力威胁，更不用说阻止其登陆了。而且各地守军联系不畅，行动迟缓，即便得知圣马丁已登陆后，其它地方的援军也无法及时赶到。佩苏埃拉在皮斯科只部署了500名新入伍的步兵，100名骑兵和少量炮兵，由曼努埃尔·金佩尔指挥。他们刚刚发现圣马丁的登陆部队就望风而逃，没有组织防守，甚至连接近观察一下敌情都没有，虽然他们占据着有利地形。但这种逃跑也许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因为凭那点可怜的兵力是根本无法防守的。

圣马丁一登陆就对军队约法三章，对曾经收复智利的阿根廷士兵要求尤其严格："请你

们记住，你们不是来进行征服的，而是来解放人民的。秘鲁人是我们的兄弟：拥抱他们吧，并就象在查卡布科战役之后尊重智利人的权利一样尊重他们的权利吧。”

由于这次远征恰与西班牙宣布自由宪法及在秘鲁举行的宪法宣誓巧合，圣马丁及时抓住这个时机确定了其斗争的政治性质，宣布彻底废除殖民制度。他对秘鲁人民说：西班牙民族终于接受了本世纪文明不可抗拒的冲击，承认了它的法律是不足以使它幸福的。……西班牙革命与美洲革命具有同样的性质：两者皆以自由为目的，以压迫为缘起。但美洲只能把西班牙宪法视为在美洲维护不可能以武力再维持下去的殖民制度的欺骗手段。不能对在1万多公里以外而又没有他们的代表参与的情况下形成的任何法律抱有希望。“秘鲁的末代总督”努力延长他的腐朽政权。压迫和武力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就是渴望用自己的鲜血实现新大陆自由的解放军的祝愿。

在此其间，远征军在所占领的土地上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利用该地区的物资充分装备了自己；组建了骑兵；招募600名被解放了的奴

隶补充了步兵并准备到内地去发动起义。这次登陆有力地牵制了利马周围的省份，深入内地的部队沿途不断发动当地人民的起义，极大地扰乱了敌人的视线，牵制了对利马的防守，并作好了与从北方进攻的远征军主力会师的准备。

佩苏埃拉总督不赞成西班牙制订的自由宪法，但他不得不执行政府的命令，准备在利马向宪法宣誓。9 月 11 日举行宣誓大会，这时也正好传来了圣马丁远征的第一次消息，广大爱国群众欢欣鼓舞，保皇派垂头丧气。

这位不知所措的总督，自知无力从军事上击败圣马丁的远征，就想通过外交斗争来取得他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企图让主张独立的革命者在向西班牙君主政体宪法宣誓并服从其最高政府的基础上做出“理智的”妥协，如果革命者不同意，就设法首先停止战争，同时让美洲的代表去西班牙向君主面陈他们的主张，或等待君主派一个代表来美洲处理悬而未决的分歧。他准备派一个代表团带着上述建议去智利，正在此时他得知圣马丁的远征军已在他的领地内登陆，不请自

来。佩苏埃拉于是改变了计划，直接致函圣马丁，并同时通过上秘鲁军将军照会拉普拉塔联合省，主张和谈。

佩苏埃拉给上秘鲁将军的有关和联合省谈判的指示包括这样的内容：引导联合省接受西班牙宪法，派代表去西班牙宫廷谈判；首先建议在谈判期间停战，划定军事界限，重新开战时双方都要事先通知对方；如果不能在此基础上达成谅解，可让联合省拥有政治统治权，先决条件是承认其所欠债务，交纳拖欠的赋税；如果这些都不能达成协议，就答应派代表去，就近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两国政府间”必须停止敌对行动。这些指示中包容了一个重要的含义，即不仅承认了美洲独立派为交战的一方，而且也承认了阿根廷政府的合法性，承认了殖民地革命的合法性，接受了殖民地无限期的实际上的独立，只是法律上不宣布罢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这些都得以实现，就确立了美洲革命及殖民地独立政府在国际法上的合法性。到当时为止，连武力也还没有为革命者们争取到这点。

总督给与圣马丁谈判的代表的指示精神是

一样的。

圣马丁的回答则坚持要确定独立这一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正是西班牙政府想方设法回避的一点。

双方代表在距离利马 11 公里的米拉弗洛雷斯会谈，事先双方达成了实际停火的协定。

总督的代表建议以接受西班牙宪法和派美洲代表去西班牙为谈判基础。这一提案实际上已为圣马丁事先的声明所驳回。他在声明中确定了以南美洲解放为宗旨的斗争性质，坚决拒绝就任何违背美洲独立原则的提案进行谈判。被拒绝后，总督代表提出：远征军重新上船并撤回智利，保证停止一切海上行动，交还战俘，双方不增加海陆兵力，恢复智利和利马的贸易往来，智利政治保持现状，派代表去西班牙提出一切认为合适的要求。

圣马丁的代表接受了提案，但从根本上加以修改，提出了反建议。答应任命一个代表团去西班牙，阿智联军撤离秘鲁，调至德萨瓜德罗河左岸，上秘鲁的保皇军也要撤至上述分界线；在智利南方继续作战的西班牙部队撤出奇洛埃岛，确立 1810 年的管辖范围；如果玻利瓦

尔在哥伦比亚和莫里略开始同样的谈判，秘鲁总督不能援助占领基多的保皇部队。

如果达成了这样的谅解，美洲宣布独立的所有共和国就有了保障，并将确定1810年的管辖范围。但由于不能就这些相互矛盾的基础达成谅解，双方代表一致同意休会。

在谈判过程中，圣马丁的代表们坚持主张美洲独立是调和双方利益的唯一途径，暗示了在美洲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思想。从那时起这种思想就一直或隐或现地存在。

谈判终因双方差距太大而破裂，停战宣告结束。

10月5日，即停战结束的这一天，阿雷纳莱斯将军率领由步兵、骑兵和炮兵组成的阿智联军的一个师悄悄进入山地，开始了他们配合远征军主力北上的扰敌行动。圣马丁声称自己率领约3 500人进入卡涅特谷地，但其实际行动是撤回利马附近的先头部队来掩护阿雷纳莱斯部队的运动。在皮斯科登陆后一个半月，圣马丁率部重新登船，舰队向北前进，目的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与阿雷纳莱斯进军方向相反的地方，但实际上也是在寻找海陆两军会合的

战略地点。在登船前夕，为了表明在取得独立以前决不放下武器的决心，圣马丁颁布了秘鲁的国旗和国徽。国旗为红白两色旗，国徽是初升的太阳在陡峭的山峰之间喷薄欲出，山脚下是平静的海洋。

考克拉内在回忆录中批评了圣马丁在皮斯科登陆并在那里驻扎了45天的行动，认为这有害无益。但圣马丁只拥有很少的作战物资，无论从哪儿受到攻击都必须面对两倍于己的敌人，所以有效的实施这一计划凭借的主要不是武力，而更多的是战略和机智。如果再考虑到政治上要求他听一听对方的和平建议，以使自己出师有名并争取社会舆论，用巧妙的行动掩护了阿雷纳莱斯的部队向山地运动，这样总的来看，不能说这45天是浪费时间。敌人是这次行动的最好的评判者，他们承认秘鲁的军事力量是从皮斯科开始崩溃的。当时秘鲁总督仅在利马就有7 500人，在瓜亚基尔、山地地区和上秘鲁还有两倍于这个数字的兵力。圣马丁身后却只有1 200人的机动部队用巧妙的游击行动掩护着他用不足3 500人的主力部队攻击秘鲁心脏地区的远征行动。根据敌人的评论和实

际战果来看，必须承认圣马丁远征秘鲁的初步行动是灵活而正确的，他运用自己的谋略和机智，以很少的兵力使敌人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

圣马丁的远征计划已初露端倪。更精彩的一幕即将拉开。

北上：目标是利马

统帅阿智联军远征秘鲁的圣马丁同时指挥两个战役：军事战，其计划藏在他的头脑里；政治战，其秘密线索由他一人掌握。军事战从沿海和崎岖不平的山地由考克拉内的战舰和阿雷纳莱斯部队飞快的脚步画出一个包围圈。这个圈在皮斯科打开，向利马收紧。政治战更为复杂。它以动员道义上的舆论力量为基础，推动全国起义，否则，单靠众寡悬殊的军事力量，解放秘鲁是不可能的。

圣马丁从皮斯科登陆以后就开始加紧这场秘密的政治战的进行。在米拉费洛雷斯谈判期间和阿雷纳莱斯率军进入山地以后，他就开始激发当地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敌人营垒的分

化，制定占领卡亚俄的计划，准备秘鲁北部和在内地山区的武装起义。他给在利马的特工人员特殊的指示，要他们加紧工作，保证他进军过程中的交通工具和给养的供应。

圣马丁率部队于10月25日启航北上，3天后进入卡亚俄湾。他命令一部分部队身着不同的军服转移到了阿雷纳莱斯部队空出来的运输舰上，又一次巧妙地以少充多，大大震慑西班牙守军。

舰队一部留下封锁卡亚俄湾，其余舰只驶向距利马36公里的安孔湾。一支由200名步兵和40名轻骑兵组成的小部队登陆，占领附近的昌凯谷地，和这一地区的特工人员联络，为主力部队筹措马匹和给养。

在此期间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保证了革命力量和陆地和海上的优势：瓜亚基尔起义和考克拉内在卡亚俄港夺取了“埃斯梅拉达号”三桅船。

瓜亚基尔省曾一度属于秘鲁，在19世纪初划归基多特别自治区，属新格拉纳达总督区。但因其地理位置靠近秘鲁和战争的需要，在军事上、间或也在政治上归秘鲁总督管辖。那里

有西班牙在太平洋的兵工厂和唯一的造船厂，卡亚俄被圣马丁的舰队封锁后，这里又成了西班牙船只最后的避风港。瓜亚基尔在秘鲁北部，那里是圣马丁从海上登陆而后挥师南下进攻秘鲁的理想地点。保住瓜亚基尔对西班牙的美洲殖民政权的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基多是在 1809 年就表现出了独立倾向的西班牙殖民地之一。但毗邻秘鲁并受其统治的瓜亚基尔省直到 1820 年还保持沉默，表明了人民群情激荡的唯一征兆，是在接到佩苏埃拉总督命令之前就提早宣布了西班牙自由宪法。1819 年玻利瓦尔收复了新格拉纳达并不断向南推进后来圣马丁控制了太平洋并远征秘鲁，基多地区在军事上就被孤立了。

圣马丁在皮斯科登陆的消息一传到瓜亚基尔，10 月 9 日那里就爆发了革命。暴动以一部分驻军为首，得到人民的支持，很快就取得了胜利。全省一致赞同革命，宣布独立，组成了政府委员会，并组建了一支军队。然而，独立的瓜亚基尔将变成两位解放者之间不和的种子。

现在，整个南美革命的范围越来越大，殖

民主义的抵抗日益衰落。战争已集中到三个点上：在委内瑞拉，莫里略率其几乎已经崩溃的残余部队在无望地挣扎；秘鲁，佩苏埃拉凭借他在山区的部队勉强支撑着；基多，孤立无援。南北两位解放者正向中心会合。他们将在基多会师。

另一个重大事件是海军司令考克拉内传奇般的奇迹。海洋已不能作为他纵横驰骋的唯一战场了。西班牙现在在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就只剩下“考验号”、“复仇号”和“埃斯埃拉达号”3艘三桅船了。这3艘舰中的前两艘从南部几个港口运送上秘鲁军的一个师北上增援利马，由于智利舰队的封锁而无法再进卡亚俄港，只好在北部沿海漂泊，后来才终于驶进瓜亚基尔港，而那里又成了它们的葬身之地。只有“埃斯梅拉达号”和另外几艘小舰当时在卡亚俄港。

考克拉内酝酿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想冒着敌人海陆250门大炮的火力就在港内夺取敌人舰队。他有两个目的：由于争强好胜的心理，想更有效地协助陆军行动；把圣马丁引向利马，使他按照最初计划采取更大胆的行动。

为了这次行动，考克拉内准备了14艘小

船，选拔了150名水手和80名水兵，计划10月5日夜间偷袭敌舰队。为了迷惑麻痹敌人，他命令所有舰只都驶向远海，只留“奥希金斯号”负责封锁港口。“埃斯梅拉达号”的官兵误以为封锁已解除，当夜便大排筵宴，庆贺狂欢。晚十时，考克拉内率14艘小船突袭“埃斯梅拉达号”。考克拉内身先士卒，第一个跳上敌舰。在短兵相接的激战中，考克拉内身负重伤，不得不放弃夺取敌人全部舰只的原定计划，命令砍断敌舰缆绳，由自己的水手驾驶离港，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最后一艘主力战斗舰就这样覆灭了。

圣马丁很重视考克拉内的胜利，但更重视瓜亚基尔的革命，因为它具有全洲性的重大意义。他没有采纳考克拉内劝他对利马直接进攻的冒险计划，而是在安孔登陆。10月12日登陆结束，建立了滩头阵地和桥头堡。修筑了一个临时码头，以便与舰队保持直接联系，既可通过海路由舰队装载步兵进行机动，也能在万一作战失利时由海上撤退，保存实力。圣马丁占据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工事，作好了长期驻军的准备，既不主动出击，也不消极避战，而是

视敌动向而动，以不变应万变。远征军在这里存在严重威胁着保皇军，可以切断它与北方省份的交通联系而孤立它消耗它，同时又能确保自己与舰队和山区阿雷纳莱斯部队的联系。使自己总是处于有利的地位。可根据敌情或进、或退、或重新上船、或与阿雷纳莱斯会合，总能立于不败之地。

佩苏埃拉只是消极等待圣马丁的进攻，他的计划是纯粹防御性的。一个月后，远征军在道义上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远征军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埃斯梅拉达号”的被捕，保皇军努曼西亚营的起义以及阿雷纳莱斯纵队在山区的活动等等，这一切时时刻刻都在削弱保皇军的士气。而远征军，尽管在数量上处于劣势，却准备反攻。

然而，圣马丁安孔登陆后在瓦乌拉的阵地虽然比较有利，但并不稳固。他的活动基地只有西边神秘莫测的大海；他背后的北方几省还在国王军队的占领下；东侧是保皇势力十分强大的山区；前面是两倍于己的敌人。形势十分险恶，远征军孤军作战，没有根据地，部队得不到及时供应和补充，这些都能随时毁掉整个

远征军。所以圣马丁的秘鲁解放军必须扩大活动区域，筹集部队给养，用山地居民扩充自己的兵力；必须争取北方省份的独立，并在政治上巩固独立，将其建成远征军可靠的根据地，最后包围利马。尤其必要的是扩大革命的影响，推动人民起义的发展。舍此之外，就只能听凭时间的最后裁决了。

阿雷纳莱斯大胆进军内地山区，部分地适应了上述要求。为使这一行动与圣马丁在瓦乌拉的行动相配合，他于1820年11月29日占领了人口众多、牧业发达的瓦腊斯，赶走了保皇军，6万居民宣布独立。几乎与此同时，整个秘鲁北部起来拥护独立事业。这是秘鲁破天荒第一次的自发起义。

这时，利马开始感觉到海陆封锁的效果。圣马丁根据他在西班牙作战的经验和任北方军司令时在上秘鲁和萨尔塔的实践，大力推动"游击战"活动。他对自发的起义给予适当的组织、装备，为他们配备军官，制定作战计划，使之变为一种前哨部队，作为远征军的防御工事，掩护主力部队的运动、侦察敌情，以有利于正规军的作战。这些游击队发展迅速，出没

于山地与平原之间，进攻敌人的小股部队和前沿阵地，伏击敌运输队，使首都地区和卡亚俄的保皇军终日惶惶不安。

阿智联军远征秘鲁已开战3个月了。在这3个月里，远征军激发了瓜亚基尔革命，俘敌1 500人；接收保皇军起义投诚的650人的一个营和大约500名自愿参军的新兵，约500名敌军逃兵也参加了解放军；秘鲁内地大部分地区和利马周围地区相继起义；阿雷纳莱斯在山地战役中消灭敌军2 000人；取得了心理战的优势，缩小了对首都的包围圈。而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以4 000人对23 000人在短短3个月内取得的。这足以说明圣马丁的计划的正确。当时有人讥笑他胆小消极，但在双方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为了保全自己的力量和巩固秘鲁独立的根据地，这是唯一合理而可行的计划。

阿雷纳莱斯：山地将军

作为秘鲁远征的初步行动，山地第一次战役是极为重要的。而其作战环境的艰险和复杂

更增加了山地战役的军事价值。

秘鲁，从整体上是一个三角形的山地国家。就其地形和气候来说，可分为两个或三个迥然不同的地区：沿海山地和山区这两个地区差别不大，也可算作同一地区。漫长的沿海地区是三角形最长的一边，为一条荒凉干旱的沙带，有3条主要河流，形成3个适于农耕的河谷。河流之间是沙漠；荒无人烟，植被稀少。气候极为干旱，高温干燥，水源枯竭，生存环境极差。当时圣马丁率领着主力部队就是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这个地区向东，是沿海山地和山区。沿海山地在西，东边是雪山，惯称山区。安第斯山脉在上秘鲁南部一分为二，两条支脉平行，中间形成山间高原，在下秘鲁又合而为一。

这就是战场的大致轮廓。山地的远征是为了孤立利马，牵制秘鲁的南部后备军，并把它吸引到中部来，打乱敌人的防御计划。而海上和沿海地区的行动则是为了在利马以北完成对利马的包围并将秘鲁的中部和南部联系拦腰斩断。南部，由以上秘鲁为根据地的保皇军占领；北部，由阿智远征军占领。双方在中部对峙。攻占了利马可以使阿智远征军巩固北方的阵

地，但因为没有山地，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如果利马一战失败，远征军就有被赶下大海从而断送整个解放事业的危险。而保皇军则相反，即使被赶出首都，他们还可以向山地撤退，凭其那里的后备军的牢固根据地，继续顽抗。决定双方命运的是山地之战。

圣马丁在远征的初期占领了皮斯科并决定把战争推向北方，这与派一个纵队到内地去的大胆想法是一致的。圣马丁和阿雷纳莱斯兵分两路，一个从海上，一个从内地山区共同向北方进军，遥相呼应，互相配合，对利马形成了一个钳形攻势，唤起了北方各省的革命精神。阿雷纳莱斯在山地进军过程中，侦察了沿途地形，了解了当地的军事潜力；同时严重分散了敌人兵力，使山区和上秘鲁的保皇军不能增援利马，打乱了敌人布防，掩护了圣马丁的北进。最后，在北上途中歼灭了大量敌有生力量，壮大了自己，有力配合了整个作战计划的实施。

第一次山地战役，作为远征的初步行动是一次创举，是美洲山地战的典范。作为战略行动，它也是秘鲁远征中最大胆和指挥最得力的一次军事行动。通过这次进军，发现了敌人的

弱点。使远征受到人民的欢迎，沿途发动了人民。从精神上打败了保皇军，表明一支千人的轻装部队可在敌人重兵防守的地区游刃有余地进行有效的游击战，切断敌交通线，威胁其根据地，打乱他们的计划，消灭分散之敌。通过这次山地进军，侦察了从胡宁到阿亚库乔这一带将要进行南美独立战争最后战斗的地区。从这些方面来看，这次进军的意义确实不容忽视，而其直接指挥者山地将军阿雷纳莱斯也永远列入了美洲解放英雄的圣祠中。

彭乔卡停战协定：政治家圣马丁

1821 年初，解放秘鲁的远征开战四个月以后，西班牙王室在秘鲁的事业已是末路穷途了。一位目睹了当时情景的西班牙历史学家说，西班牙的秘鲁大厦破败不堪，崩溃在即。南美洲革命在大陆南部得到巩固，正胜利地向北发展。龟缩在利马的保皇军，给养匮乏，斗志涣散，除了投降，看来已别无选择。上秘鲁的军队无力增援下秘鲁，只能被动地固守阵地。秘鲁南部的保皇军后备部队，为了对付阿

雷纳莱斯的山地进军，兵力分散，七零八落。山地的暴动势不可挡，首都周围的游击队十分活跃，有效地骚扰了保皇军，甚至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佩苏埃拉总督在将军会议上毫无保留地表示已无力继续守卫这个国家。退至普诺的上秘鲁军司令向政府报告，敌人的攻势锐不可挡，如果西班牙本土不发救兵，形势将无法挽回。

圣马丁的远征使敌人内部也发生了剧烈的分化。佩苏埃拉总督和自由派军官的领导人拉塞尔纳将军之间发生了龃龉，专制派和立宪派之间也产生了不和，再加上土生白人保皇派和来自西班牙的保皇派也有摩擦，使本来就十分危险的局势更加不可收拾。佩苏埃拉总督因此受到各方面的攻击，众叛亲离。

1821 年 1 月 28 日，自由派军官们在拉塞尔纳领导下发动兵变，迫使佩苏埃拉交出了最高统治权，拉塞尔纳提任了总督职务。这次政变使秘鲁的战争延长了 4 年，因为这些通过政变上台的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派军官们都不是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他们对圣马丁的威胁更大。

新总督上任伊始，便致函圣马丁，建议两军各派一位高级将领会晤，探讨双方和解的可能性，消除欧洲人和美洲人之间的分歧。他认为双方如都有诚意，24小时即可解决问题。圣马丁答复说，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灾难，他十分乐意寻求调和西班牙人的利益与美洲人的权利方式。双方代表在雷斯特会晤。拉塞尔纳提出的基本上还是上次和谈时的方案，圣马丁的代表则重申，如不以承认秘鲁独立为基础谈判就不必进行。双方的谈判未果而终，但气氛缓和。保皇军谈判代表无意中透露了他们将撤离利马的计划，转移到物产丰富、气候适宜的地方，以利今后作战。

西班牙立宪政府摆出一副和平姿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很快结束。

拉塞尔纳的日子并没有比佩苏埃拉好过多少，新的灾难使利马的军队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饥饿和物资匮乏日益严重，更可怕的是，瘟疫开始在利马保皇军中蔓延开来。保皇军中每天死亡20人，病号多达3千人。越来越明显，首都无法再坚守下去了。撤离首都是拉塞尔纳上任前就定下的决心，这是唯一可以挽救

保皇军、把战争坚持下去的措施。就在这时，从西班牙来了一位王室的特使。他是带着和平谈判的指示来的，他的到来拖延了挽救保皇军的决定的执行。这期间，保皇军胡乱调动，在调动中的损失比一次阵地战的伤亡还要惨重。

圣马丁军中的境况也十分不妙。远征军在瓦乌拉的营地中也是瘟疫横行。部队虚弱到了不堪敌人轻轻一击的地步。军中有五百名病号，另外五百人刚刚痊愈，能够手持武器进行战斗的士兵不过千人。有时一天死亡上百人，有的营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圣马丁自己也卧病7天，他身体虚弱，但精神依然格外坚强，用他的军事和政治天才支撑着整个部队，用谈判和计谋赢得时间来克服那可怕的局面。他的伟大愈是在这种危急时刻愈加突出。

海军中校曼努埃尔·阿夫雷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王室的使者来到秘鲁的，他受西班牙立宪政府的委托，来寻找和平的妥协。他于1821年3月25日到达瓦乌拉圣马丁营中，逗留4天，与圣马丁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对圣马丁敬佩不已。到了利马后，他毫不掩饰地对圣马丁及其将领备加赞赏，认为持续的战争是秘

鲁保皇派的错误造成的。保皇派不同意他的意见，但迫于政府的命令，拉塞尔纳总督不得不继续同圣马丁的谈判，中止执行撤离利马的计划。第一步，总督秘密致函邀请圣马丁派代表就悬而未决的分歧进行谈判，目的是使美洲国家恢复原有的安宁，为人民谋求幸福。圣马丁的回答很简单，回复说就西班牙人和美洲人之间的分歧进行谈判是十分严肃的事，应由官方提出公开倡议，否则谈判将是无效的。

与这轮新的外交战开始的同时，圣马丁对山地和沿海地区进行了两次军事进攻，他派米列尔率一个纵队登船南下，在考克拉内率领下对利马附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这时正是阿雷纳莱斯的山地战役节节胜利的时候，圣马丁为了这次冒险行动，命令他放弃山地，参加对利马的联合进攻。阿雷纳莱斯不同意，但不得不执行命令。无疑圣马丁这次犯了一个大错，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放弃山地。后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时，又命阿雷纳莱斯率军重新收复失地。

西班牙王室向秘鲁派遣使者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这是新的绥靖政策的开始。1820 年西班

牙国内自由主义运动后的新形势迫使西班牙安抚烽烟四起的殖民地。从这时起，美洲的革命者被承认是交战的一方。这一政策是由费尔南多七世著名的对美洲人的宣言开始的。宣言号召美洲人和西班牙人平等地进行和平谈判。但实际上，国王只允许美洲人共同享有1812年宪法规定的权利，而这是他们在宣布独立前就拒绝了的。国王最后还以民族尊严相威胁，声称如果不服从这一召唤，将诉诸武力。这股“和平”之风吹过大西洋，对美洲战争却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王室代表的使命是把起义者变为顺民，但结果适得其反，他们的到来变成了独立事业新的动力。战火又起，革命为了独立的目的更为明确，和平使者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在米拉弗洛斯谈判破裂一个月之后，玻利瓦尔在哥伦比亚和莫里略签定了一项停战协定。莫里略将军和秘鲁总督得到同样的指示，根据国王宣言的精神，照会委内瑞拉独立议会，建议停止敌对行动，实现和平与和解。委内瑞拉议会决定听一听和平建议，但坚持谈判

必须以承认哥伦比亚的主权与独立为基础。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双方在特鲁希略以西班牙政府和哥伦比亚政府的名义签定了一项6个月的停火协议，规定协定期满可以延长。在停火期间，双方互派代表进行和平谈判。西班牙要求哥伦比亚代表去西班牙本土谈判，玻利瓦尔同意了。按玻利瓦尔自己的话说是“为了把哥伦比亚人民的意愿带到国王宝座的脚下”。但他指示代表们，除独立的原则之外不能达成任何协议。

在秘鲁总督以官方身份邀请圣马丁开始正式谈判。双方商定的会谈地点是距利马25公里的彭乔卡庄园，会谈遂由此得名。在初步会谈中，双方都没有阐明各自的目的，只表示要就悬而未决的分歧进行协商，达到和平与团结的目的。

西班牙代表团的谈判立场就是王室使者带来的指示。圣马丁则针锋相对，拒绝西班牙宪法，坚持和好的实质目的，就是承认智利、拉普拉塔联合省和秘鲁的独立，如果谈判不符合这些基本精神，就不接受初步停战。

谈判中，圣马丁的代表态度坚定，坚持以

承认独立为基础，否则就不再谈判。但他们自知兵力不足，不宜立即重开战端，因此表示只要西班牙稍稍让步，就同意停战。西班牙代表没有涉及具体问题，只是重弹老调。圣马丁的代表宣布，以后不要再提及西班牙宪法，仅只这项法令的名称就是对新大陆自由的亵渎。

西班牙代表提出一项停战16个月的建议，圣马丁的代表则要求对方交出里尔·费利佩城堡和卡亚俄及其它要塞作担保。拉塞尔纳总督令人吃惊地同意了这个条件，只要求把卡亚俄要塞的20门炮撤出。双方又商定由拉塞尔纳将军和圣马丁将军举行直接会晤。

这就是著名的彭乔卡停战协定。

谈判双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拉塞尔纳在致函圣马丁要求举行会谈的前两天写信给在山地作战的将军们，表明他相信和谈将不会达成任何和解，因此命令他们必须充分利用谈判的时机，占领塔尔马、豪哈和帕斯科等军事要地，以便在停战生效时夺取到有利形势。这就说明了他为什么那么痛快地就答应已经被圣马丁困死的卡亚俄要塞为担保的停战条件。至于圣马丁的用意，他自己后来作了说明：第一，为了

使由于过山而受损的阿雷纳莱斯部队得到恢复；第二，为了使不下 1 200 人的病号康复。圣马丁很清楚，西班牙永远不会接受殖民地的独立。

彭乔卡停战协定中约定的会晤是圣马丁一生中政治上最重大的一步。尽管没有立即带来什么实际结果，但决定了他解放者生涯的方向，将会把他引入没有出路的歧途。西班牙美洲实际上已经独立了，法律上已是共和制的国家了，共和政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拉普拉塔联合省，智利和哥伦比亚已经建立了共和国。君主政体是违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的意愿的。圣马丁为巩固阿根廷共和国的独立作出了贡献，在智利建立了另一个共和国，为在秘鲁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奠定了基础。恰恰在这个时候，他公开宣布了他的思想——使秘鲁君主政体化。在米拉弗洛雷斯谈判时他已经披露过这种思想。诚然，实现这样的思想，他没有丝毫的个人野心，而只是和西班牙妥协的一项理论性提案，他并没有忽视战争。但并不能因此而减轻圣马丁应对历史承担的思想责任，也不能轻视他的君主政体化计划对其此后生活的影

响。

1821年6月2日圣马丁和拉塞纳在各自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进行了会晤。圣马丁在发言中重申了他的目的是为人民争取自由和权利，如果战争进行下去，无疑胜利是属于决心独立的人民的。随后，他提议任命一个以拉塞尔纳为首的摄政团，双方各指派一位共同摄政者，独立自主地统治秘鲁，直到西班牙王室派一位王子来担任立宪君主为止。

参加谈判的保皇分子们被这个提议惊呆了。虽然这个建议与王室的指示不符，但保皇分子们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并得到王室代表的热烈支持。总督有些踌躇，但也似乎倾向于接受。

假如这个建议只是一种灵活的外交策略，那圣马丁确实不同凡响；但无论如何圣马丁都无法回避他的建议的负面影响。一方面，这表现了他的克制，提出了在独立条件下达成和解的具体方案，非暴力地解除了殖民地和宗主国的关系；诱使王室代表及其同僚违背王室旨意；在敌人的营垒中造成了政治上的分歧；如果他的计划被接受，那倒确实是一次不流血的

胜利，尽管带有王冠的象征。能使秘鲁的独立事先得到承认；临时建立一个混合的民族政府。圣马丁所寻求的是在西班牙人的帮助下使革命取得胜利。他想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形式的政府，既能保证美洲的独立和自由，又保持了美洲的稳定。但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他没有看清、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建议的意外后果；作为军人，这样做就减弱了自己军队的战斗力；作为解放者，在新近被解放的国家面前失去了威信，违背了它们自发的民主倾向。南美洲革命失去了完全独立、实现共和的原则是仇视新大陆共和制度的欧洲君主们的胜利。欧洲的君主政体派对彭乔卡会谈表示欢迎，这种欢迎是对美洲共和政体的谴责。因此，这一步是圣马丁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一步，将把他引入歧途。

如果圣马丁的方案所面对的只是保皇派和总督身边的人，无疑它会被很快接受。但拉塞尔纳明白，没有军队的支持，这一方案是没有意义的。是军队把他推上总督的宝座的，没有军队的同意，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经过协商后，军官们宣布：不能从根本上拒绝这个方案，

但也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因为它与王室的命令不一致。王室的指示是避免流血，但明确禁止在殖民地独立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他们明白，如果在这种条件下签约，他们将有受到政府惩罚的危险。那时，他们要么背叛国王，背叛祖国，要么变成他们所反对的革命的工具。

拉塞尔纳总督把军队的意见通知了圣马丁，并借口要等待王室的决定，拖延时间，同时，他带两位反对事先承认以独立为条件的将领巴尔德斯和加西亚·坎巴去面见圣马丁，以便当面说明他们认为可行的方案。总督的方案与圣马丁的方案有一点不同：达成必要的停火协议，以便等待王室的决定。另外他还建议从东到西以昌凯河为界，独立派占领的土地由独立派管辖，秘鲁其余地区由西班牙管辖；总督本人回西班牙，向国王面陈秘鲁所发生的情况。圣马丁当即拒绝了总督的建议，并带有极大的讥讽说："……我沉痛地看到，在很短的时间内，西班牙人除了饮弹自尽之外，别无他途了。"这是最后通牒：他，圣马丁，只想在西班牙人事先承认独立的基础上谈判，否则，宁愿继续进行战争。

圣马丁不急于夺取秘鲁首都，他想等到瓜熟蒂落，让利马象一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落到他的手里。

在停火协定的掩护下，双方都在准备用武力解决问题。彭乔卡停火协定延长期满后，圣马丁决定继续作战。他对双方的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清醒地权衡了利弊，认为有把握取得胜利。但他没有充分预料到可能发生的意外。

至于西班牙的将军们，在停火以前就已作出决定，把战场转移到内地。王室代表阿夫雷乌的到来和继之而来的谈判推迟了这一行动。与宗主国的联系中断，利马成为一座孤城，弹尽粮绝的危险时刻威胁着保皇军；总督军队与市议会和人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山区告急，中部港口受到智利舰队的威胁，内地、南方和北方省份之间的交通被切断，保皇军无力进行反击。这一切都使撤离利马势在必行。如果固守利马，将失去整个秘鲁。撤出利马是自救的决策。西班牙人要把沿海不利于健康的地区丢给圣马丁和他的军队，让他们与看不见的敌人厮杀而自行削弱，自己则进入气候宜人的山地，让军队慢慢恢复战斗力。西班牙人占领了

人力、物力资源丰富的地区，招募新兵补充部队，保证与上秘鲁的联系以巩固自己的根据地。这样一来，待时机成熟时它就可以以逸待劳地击败圣马丁的进攻或主动出击。保皇军这一正确决策使战争延长了四年，消耗了圣马丁的军事实力。对这一点当时圣马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错误地认为占领了利马就会取得最后胜利。

为了准备撤离首都，拉塞尔纳总督命令康特拉克将军率军沿卡涅特谷地进山。表面看来，他是在后退，但实际上却阻止了阿雷纳莱斯继续向内地进攻，并占据了有利阵地。圣马丁也作了相应部署，把部队从安孔撤退瓦齐。

停火协定刚刚期满，康特拉克即率主力启程进山。拉塞尔纳于 7 月 4 日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放弃首都，把政治和军事领导权委托给蒙特米拉侯爵。7 月 6 日清晨，他率其余不足 2 000 人的部队开始撤离，沿卡涅特谷地向东进发。

圣马丁没有急于占领利马，他不想以征服者的身份在城里出现，而是作为救助者或保护者进城。他这时对自己的部队说："我战斗了 10

年，反对西班牙人，更确切地说是反对美洲解放事业的敌人。我唯一的希望是这个国家根据自己的法律而治理。至于将来采用的政治制度，我无权去干预。我的意图是为人民宣布独立和建立适合于他们的政府提供条件。这一点作到了，我认为我的使命就完成了，我即告退。”

1821 年 7 月 10 日晚，圣马丁按照他一贯的做法，只由一名副官陪同下微服进城。翌日，发布了几项公告，严禁侮辱西班牙人，命令商店开门营业等等。

圣马丁想进行一次和平战役，争取民心。他的最近目的达到了，占领了表面上的反革命中心——首都利马。但他过于强调了这一事实的重要性，以为敌人已无力反抗，只能在绝望的困境中耗尽最后的力量；以为依靠秘鲁本国人民的反抗即可不冒任何风险地取得最后胜利。但这只是圣马丁一厢情愿的想象。事实是这个国家没有响应解放者的召唤，除了特鲁希略的起义和围困过利马的游击队加入了圣马丁的正规军以外，无论是在上层社会还是普通人民中，对革命反应都很冷淡；在阿雷纳莱斯的

第一次山地战役中，群众表现不积极。从推理多于深刻观察的基础出发，圣马丁认为只要保存了军队并有舆论支持就可以保持已经夺取的阵地，并认为这就是确实的胜利，认为自己的力量就会壮大，而敌人就会削弱和灭亡。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战争机器会磨损，自己的驻地的恶劣气候会杀人。他认为已经被消灭的反动势力会东山再起，在气候适宜、物产丰富的地区日益壮大。因此，与查卡布科和迈普战役之后的错误一样，他没有乘胜追击敌人，而是给了敌人重整旗鼓的时间，给了敌人可能取胜的机会。最严重的错误是放弃了山地省份，敌人占领了这些地区，就完全弥补了在利马的损失，取得了战争的平衡，而圣马丁却被关进了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

这期间，西班牙的将军们在撤出利马之后，情绪大为振奋，认为应该继续作战，挽回军队的荣誉。康特拉克率先撤出利马，亲自率军爬山越岭，向山地进军。虽然途中部队受到一些损失，但正面遏制了阿雷纳莱斯的进攻，并巩固了作为其根据地的南方省份。

一个人不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圣马

丁的失误，再次证明了伟大人物也永远是人而不是神。

第二次山地战役

对西班牙人来说，占领山地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不仅关系到军队的存亡，也关系着与南方保持联系的问题。因此，拉塞尔纳上台后立即派巴尔德斯率 1 200 人前往占领山地中部省份。保皇军在山地取得了优势，阿雷纳莱斯第一次向山地进军时攻占的一些军事要地因后来圣马丁命他率所部主力参加合围利马的战斗而只能由少量部队守卫，这时被强大的敌军尽数击溃，保皇军占领了帕斯科，并向塔尔马和豪哈攻进。但这时拉塞尔纳也犯了与圣马丁相同的错误，命进山部队返回利马加强首都防卫。

执行山地作战计划的阿智联军有 2 100 多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而其指挥官阿雷纳莱斯将军更是著名的猛将。

阿雷纳莱斯冷静分析了战局，预见到敌人将放弃利马。这样，如果阿智远征军控制了海洋之后再占领了山地，那敌人在沿海地区就只

有死路一条。从这个分析出发，他产生了把主要战场转移到山地的想法，认为战争的解决最后将在山地解决——历史发展的结果证明了这一推断的正确性，南美解放战争最后要在秘鲁结束，而秘鲁的战争要在它的崇山峻岭间一决雌雄，鹿死谁手将最后取决于谁控制了山地。

因此，他向圣马丁建议，第一，除留下必要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封锁利马外，主力部队应立即进山，与保皇军在山地决战，还暗示圣马丁有必要亲自进山指挥作战；第二，向帕斯科快速推进，然后沿原路打回，攻打还未被占领的中部港口，配合远征军米列尔部在沿海地区的作战行动。

然而，圣马丁却没有采纳这些建议。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利马和卡亚俄，过分看重占领这两个城市，而只把山地战役和夺取中部港口看作是配合围攻利马的辅助行动未予应有的重视。这次，圣马丁可谓是一叶障目，未见森林。

7月初，当圣马丁把兵力从安孔转移到瓦乔和拉塞尔纳总督准备撤出利马时，阿雷纳莱斯全军集中到豪哈。

阿雷纳莱斯是秘鲁解放军的二号人物，除

考克拉内外，是唯一与圣马丁分享这次远征荣誉的将军。圣马丁称他“伙计”，很尊重他的意见，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豪哈，他得知敌人将放弃利马，并兵分两路进山。他当机立断，马上写信给圣马丁，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指出，很明显，如果拉塞尔纳与山里的部队会合，势必将向他进攻，如果不阻止这一行动，后果不堪设想，到头来，他必须放弃山区或仅凭自己单独与敌决一死战，力量上不占优势。放弃山区，其后果必然是失去舆论的支持，丢掉骑兵，损失队伍，失去 1 500 名新兵和所有辎重，最后是失去整个部队。现在急需把全部力量投入山地战场。敌人放弃利马后已无须主力部队去攻打和占领利马，用一支海上力量保卫它就足够了。所有主力都应集中到山地，粉碎敌人进行战略转移的阴谋。不然，战争将延长，其结果难以预料。阿雷纳莱斯还建议主动进攻，当务之急是切断敌军联系，不让敌军会合。为此，也必须将沿海地区的兵力调进山里。

山地将军等待着总司令的指令。他估计自己会得到圣马丁的支持，决定继续前进，准备乘康特拉克长途跋涉，人困马乏立足未稳之际

立即发动进攻，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打垮康特拉克部队。7 月 11 日，部队集结在万卡约，等待敌人的确切进军位置。是夜 10 点得知敌人直奔万卡维利卡，阿雷纳莱斯率步兵于次日凌晨 2 点即前往迎战，胜利在望。但就在天亮之前，阿雷纳莱斯得到拉塞尔纳撤离利马的消息和圣马丁的一封信。信中说，如无必胜把握，切勿贸然出战；如敌人来攻，可从帕斯科北撤或从圣马特奥退往利马。使阿雷纳莱斯更为不解的是，总司令没有说明总督的去向，只是暗示说，让敌人去吧，在没有海上联系和全国的反对下，用不了多久他们将会自己毁灭。这封信使阿雷纳莱斯停止了周密策划的行动。

阿雷纳莱斯在复信中表示反对撤回利马，他认为在利马等待他的军队的只有医院和坟墓。放弃山地会使解放事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将失去胜利的希望。此时阿雷纳莱斯头脑要比圣马丁清醒。

几个钟头以后，阿雷纳莱斯又收到圣马丁的一封信，圣马丁对自己的计划作了进一步解释，并说明了敌军运动的方向。圣马丁说他目前的任务是要逼迫卡亚俄守敌投降。山地将军

再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请求圣马丁速派游击队前来增援。

阿雷纳莱斯撤至万卡约，另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在等待他。他原指望游击队能进山有效地配合他行动，但他却收到游击队司令的信，说他们已接到总司令的命令，向首都靠拢，去维持敌人撤走后那里混乱的社会秩序。因而他们已无法完成对拉塞尔纳部队的骚扰任务。现在已不能对沿海地区有什么指望了。拉塞尔纳不受干扰地顺利撤离利马，自由自在地向山地转进，尔后与康特拉克会合，整个利马军队向山地扑来。阿雷纳莱斯只得北撤，19日占领了豪哈谷地。他决心坚守在山里。

孰料19日夜阿雷纳莱斯又接到圣马丁的命令，通知他拉塞尔纳的行踪，并第三次告诫他不要与敌纠缠，还指出几条供他选择的撤退路线。与此同时，阿雷纳莱斯得到拉塞尔纳已经过山和山地独立军失利的战报。圣马丁没有积极追击拉塞尔纳的恶果初露端倪。

圣马丁经过反省，明白放弃山地是错误的，阿雷纳莱斯是正确的。于是他作出让阿雷纳莱斯坚守山地的决定，但这个命令没有及时

送到。山地将军已无力收复失地了。正如阿雷纳莱斯所预料的，大部分新招募的当地新兵在撤退中开了小差，作战物资奇缺。根据新的敌我态势，阿雷纳莱斯提出了一项新计划：他率军去安孔港，由海军将其运至南部港口，登陆后扰敌南方沿海地区，伺机攻占阿雷基帕和库斯科，进军上秘鲁，从侧翼和后方攻击豪哈和塔尔马之敌，同时远征军主力向帕斯科等地进攻。

阿雷纳莱斯命副官带着这些报告和建议面见圣马丁，向他汇报山地军的详细情况。圣马丁听后，认为军队已无法再进山。第二天即命令阿雷纳莱斯撤回利马。在命令中，圣马丁告诉阿雷纳莱斯，卡亚俄已是唾手可得，至于他的南进计划留待以后再议。结果山地纵队撤回利马，山地将军悄悄单独进城。这时恰好秘鲁宣告独立。

秘鲁独立

1821 年 7 月 6 日，阿智远征军占领利马。南方解放者的伟大的计划已部分实现。北方解

放者正在从相反的方向实现着同样的计划和同样的理想。除了在秘鲁山地和基多以及卡亚俄这个即将投降的要塞之外，在南美洲的土地上已经没有在西班牙国旗下作战的部队了。在海上，只有三艘军舰犹如幽灵一般漂荡，这是被考克拉内打得溃不成军的宗主国最后的海上力量了。最后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只待两位解放者共同努力了。从来没有实现过地域如此之广、历时如此之长、计划如此精确的解放事业。这一事业起初被视为梦想，但最终将要实现了。

圣马丁的处境是复杂的。他具有多种身份，对于美洲来说他是解放者，他是秘鲁命运的主宰，他是两个把军队托付给他了的共和国的将军；同时他又是个政界人物。圣马丁已处于权力和荣誉的顶峰。他为之奋斗了8年的解放事业即将大功告成。但创业不易守成则更难。对圣马丁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作为政治人物，圣马丁内心世界是个谜，对于观察他的人来说都是个谜。他默默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他相信时间的作用重于相信行动本身的作用。他可能感到力不从心，

至少感到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解放大业。

在占领利马的时候，圣马丁在兵营以公报的形式发表了蒙特亚古多写的一篇文章，这是一篇提前公布的政治原则的声明。它是一个保守的革命纲领。纲领中也认为战争几乎结束了，为了维护秩序和防止无政府主义，提倡有节制的自由。这是圣马丁长期以来的政治思想，它是一个适应于从军事独裁到君主立宪各种制度的纲领。但独立是毋庸置疑的。

圣马丁把总司令部设在总督府，第一个行动是责成市议会召开正直、爱国、开明市民代表大会，代表首都居民发表意见，征询人民的意见，是否普遍赞成独立。代表大会24小时后作出答复："普遍意愿赞成秘鲁独立于西班牙和任何其它外国的统治。"人民拥护这一决定。简单的手续确定了一个事实，划出了一个时代：向世界庄严宣布了西班牙在美洲最后的殖民地独立的时代。

秘鲁独立的宣布与宣誓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件，尽管过程十分简单。1821年7月28日这天，圣马丁在利马中央广场的木台上第一次展开了他在皮斯科设计的红白两色的秘鲁国

旗。人民热烈鼓掌欢呼。待沸腾的人群安静下来，圣马丁用宏亮而坚定的声音宣布，秘鲁自由了，独立了。他把国旗挥舞了三下，高呼："祖国万岁！自由万岁！独立万岁！"人们在一片礼炮声中重复了这些口号。随后。向人们发放了解放纪念章。

圣马丁继续围困卡亚俄要塞，由拉塞拉斯将军指挥。被围困的西班牙军队几次试图突围但均未成功。要塞中的存粮仅够两个月，考克拉内率海军将海路彻底封死，给养根本无法补充。绝望的守军将港中所剩船只自己凿沉，继续固守。

考克拉内和圣马丁之间在智利潜在的不和，现在由于秘鲁独立给圣马丁带来的巨大荣誉而又一次加剧了。两位英雄之间彼此关系的破裂不会太久了，这将影响两人的历史地位和美洲的解放事业。

圣马丁的荣誉达到了顶点。他是阿根廷革命的解放原则的胜利宣传者，是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者，也是这两个共和国的缔造者。在直至当时的南美洲人中，他是最伟大的一个。他只是没有完成他的事业，否则，他将更其伟大。

唯一能与他的地位相比的同代人是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解放者以及哥伦比亚共和国的缔造者玻利瓦尔。玻利瓦尔被拥戴为解放者。圣马丁被任命为秘鲁的护国公。除克伦威尔之外，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人荣膺过这个头衔。

秘鲁宣布独立的必然结果是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府。但秘鲁不是智利，它缺乏自我治理的能力，没有建立政府的条件，甚至连建立临时政府的条件也不具备，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秘鲁被阿智联军收复的土地还不到一半，还有两支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军队在为国王而战。它的社会舆论是不稳定的，在互相对抗的种族中没有一个社会、军事、政治核心。无论在行动上还是思想上，都没有一个深孚众望的领袖人物。但现实迫切需要有一个政府。阿根廷政府给圣马丁制定的建立智利政府的准则不适用秘鲁，因为它们各自国情不同。号召人民选举的结果肯定是任命圣马丁本人，如果不是他来统治，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代替他。秘鲁人民坚决请他执政。

在这种形势下，决定在秘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起草宪法、宣布独立；以解放者的身份

建立一个文人政府，以独立护国公的身份由圣马丁领导这个政府，直到适当的时候交还给秘鲁人民。

宣布独立后，利马市议会代表会见圣马丁，代表人民请求他主持秘鲁政府工作。主要由阿智军队将领组成的劳塔罗共济会也要求他主持这个国家的全面行政工作，认为这是支持军事行动的唯一途径。圣马丁本人也相信，如果秘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国家将走向无政府主义，而这正是他最不愿见到的结果。于是他接受了这一要求。

圣马丁就这样开始就任秘鲁护国公。

圣马丁不是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他不具备管理一个国家的才能，也不具备政治家在这方面的远见卓识。他没有受过直接掌管变幻莫测的公共事务的培养。而且，他对这些事务感到厌烦。他不注重政府的形式，只使政府服从于争取独立和维持秩序的需要。他没有政治野心，他所受的教育也只适用于作战和军事管理。

他第一次主持一个庞杂的政府，千头万绪，琐屑繁芜，耗尽了他的精力，使他深感力

不从心。秘鲁护国公圣马丁不是比安第斯将军圣马丁和秘鲁解放军总司令圣马丁显得更加伟大，而是更加苍白无力、不胜其职；他的军事才能再也没能得以施展；他期待的计划似乎基于天命多于依据人算。他的意志似乎衰退了，他那被连年征战拖垮了的身体更加虚弱，他精神烦躁，坐立不安。他的荣耀就像转瞬即逝的焰火即将暗淡无光。

秘鲁护国公圣马丁：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圣马丁就任秘鲁护国公是秘鲁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宣布了秘鲁独立，建立了第一个民族政府，起草了政治宪法。但是，独立还有待于用武力来彻底巩固；国家还不具备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当时它的武装力量还不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能；当时尚存着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和人们要求自由的强烈渴望。究竟如何组织政府还是个扑朔迷离的难题。

圣马丁一被宣布为秘鲁护国公，就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美洲解放者的伟大角色。作为秘

鲁的统治者，事实上已取得了秘鲁的国籍，他原来指挥的军队所属的人民和政府的意愿就与他无关了。同时，他不能完全满足被他解放了的人民的愿望，相反，他以其固有的君主政体倾向的计划反对他们的愿望。他的权力、荣誉、声望以及所有一切的基础是他一手苦心经营起来的安第斯军和智利军，没有了军队，圣马丁再也不可能还是昔日的解放者了。这支军队必须征服仍占领着秘鲁半壁江山的敌人。唯一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从政治上联系在一起的是“劳塔罗”共济会这个由阿智联军的将领和新近参加的一些秘鲁人所组成的秘密组织。收复了智利的安第斯将军已不再是联合起来解放秘鲁的两个共和国的最高的统帅了，他也不是拥有秘鲁本国军队的最高统治者。对秘鲁来说，好像正是他把外国军队强加于它的头上；而对他的祖国来说，他则是个叛国者。

但圣马丁最大的敌人还是他的军队本身的自我毁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占领利马之后，除卡亚俄要塞外，这支纵横驰骋的远征军再也没有任何战斗的目标，安逸懈怠的平民生活不知不觉中可怕地腐蚀着士兵们的身体和精神。

由于放弃山地战役和夺取中部港口的战斗，军队收缩在利马，受到不良气候和社会的影响，正如阿雷纳莱斯所预言的那样，被疾病、无所事事和腐化堕落蛀蚀了。利马变成了阿智联军的大染缸。圣马丁本人异常地憔悴虚弱，但不是声色犬马而是身体的病痛把他的力量消耗殆尽。他似乎一切都在听任时间缓慢地发挥作用。他的将领们议论纷纷，离心离德；统帅智利舰队的考克拉内反对把远征军变成秘鲁的武装力量。

正在这时，保皇派重新开始了军事行动，坚决地向利马反攻。

在阿智联军闲驻利马无所事事的时候，保皇军在山地则重整旗鼓，休养生息。他们在富饶的山地占尽天时、地利以及人和。这时，拉塞尔纳就打算向50天前抛弃了的首都发起反攻。但这个想法在保皇军内不得人心。反攻利马，意味着沿海地区的瘟疫、在首都遭受的困厄以及隆冬时节翻越安第斯山，这一切都使他们不寒而栗。但是，卡亚俄要塞里有守军2 000人，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除了投降，只有死路一条。另外，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军火库，这

对山地的保皇军来说更重要。

反攻利马确定无疑了，由康特拉克将军负责执行这一艰巨任务，巴尔德斯将军担任他的参谋长。在保皇军中精选了一支由3 500名步兵、900名骑兵和少量炮兵组成的最精锐部队。总督率其余部队留驻豪哈。1821年8月25日，康特拉克率军开拔，向东向西过了安第斯山，从圣马特奥山口出山，向利马进军。一路之上，畅行无阻，没有任何阿智联军部队出现。

圣马丁在9月4日夜里得到保皇军来犯的消息，当时他正在剧院里看戏。他从包厢里向观众公布了这个消息，号召人民拿起武器，要求人民精诚团结，以便在决定秘鲁命运的时刻取得胜利。

安第斯将军在利马克河畔完成了他的军事部署，他把部队调到利马和卡亚俄之间，切断两地之间的道路。在利马克河边筑起炮台，部署了6门大炮。卡亚俄把保皇军无可挽回地丢掉了，康特拉克彻底失败的危险就在眼前。

康特拉克的胜利取决于他能否向卡亚俄供应粮食，而只有占领了利马才能从城里得到粮食。不战胜圣马丁的军队，夺取利马就是根本

不可能的。康特拉克认识到这点，所以他就只想撤退，丢下卡亚俄听天由命。

9月16日下午，康特拉克的部队撤离卡亚俄沿通往利马的大路，高呼着“国王万岁”向前推进。康特拉克率领一支轻装部队佯攻阿智联军阵地，掩饰其撤退企图，但从不进入炮兵火力射程之内。与此同时，主力部队偃旗息鼓，渡过利马克河，安全向北撤退。

康特拉克借着夜色的掩护，率军沿着一条满是乱石崎岖不平的小路继续北撤。17日天亮以前，全军进入利马以北17公里的通往豪哈的一条河谷，在那里停下来，稍事休整。

圣马丁眼睁睁地看着康特拉克部队的运动，无动于衷，一言不发。他坚持他的“不流血的胜利”的作战方法，等待不战而胜。

康特拉克在出征35天之后，又回到了豪哈，军队损失惨重，营救卡亚俄要塞的任务没有完成，但他临危不惧，于危难之中挽救了最后一批士兵。

孤立的卡亚俄被彻底遗弃了，要塞内的粮只能维持3天。圣马丁敦促要塞守军投降，保证尊重他们的人格和财产所有权。守军将领拉

马尔将军接受了圣马丁的建议。

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者，安第斯将军就这样不战而胜了，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军队。圣马丁所采取的战术，在以寡敌众开始远征秘鲁这一伟大事业时是慎重和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巨大战果。但后来，他没有根据战争态势的变化而随机应变，调整自己的部署，从而没能取得决定性的压倒优势。战争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不完整的胜利，尤其是那些没有士兵的积极参与而取得的半截子胜利，不会让人满意，反而常常成为指责指挥员的口实，因为人们总认为经过苦战最后取胜才伟大。在圣马丁身上就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占领利马时如此，在拉塞尔纳撤退、卡亚俄投降、康特拉克撤退时也如此。他赢得了伟大战术家的荣誉，但却损害了自己作为一名真正伟大的军事家的名誉。当机立断英勇战的将军，应该在关键时刻善于将自己的正确判断与战场上的有利时机结合起来，把胜利者血淋淋的花冠献给自己的将领和士兵们。

人们都承认从来没有人象圣马丁将军这样机敏，这样有主见，这样能够支配下属的意志，

但很多人都指责他过于谨慎，甚至是胆怯，因为可能的胜利就在身边时他却没有敢于夺取，或没有毅然决然地去追寻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这是个永远值得人们思考的历史问题。

阿智联军占领利马和撤离山地以后，停止了战斗，军队处于闲散状态，无所事事，圣马丁对此责任重大。军队的素质受损，圣马丁战斗意志麻痹。因此，当保皇军下山征讨时，他没有反击的准备。但当宣布敌人临近的第一声战鼓敲响以后，将军立即清醒过来。圣马丁开始重新把握一切，预见一切，给人鼓舞，给人信心，一切战术都运用得完美无缺，足以取得预期的效果。他不信天命，只相信自己的判断。他的部队，虽在数量上略胜敌军，但多为新兵，而对手却是富有作战经验的精锐之师，指挥者是堪与自己匹敌的杰出将军。此外，还应考虑到，保皇军是只拿一支部队来冒险，它的背后还有强大的后备军，可以在失败之后重整旗鼓。而圣马丁却只有这唯一的一支军队，它决定着秘鲁乃至整个南美解放运动的命运，经受不起任何一次的失败。因此，当康特拉克处境最被动时，圣马丁拒绝了考克拉内出击的建

议，他想寻找更有利的战机。他事先把部队调到利马和卡亚俄之间。如果敌人固守不可能久守的阵地，最后要么投降，要么孤注一掷地向他的阵地进攻，那时他则积极应战，有获全胜的把握。至此，他的谨慎是正确的，人们承认他是当时南美第一战术家。

但圣马丁应该预见到，有康特拉克和巴尔德斯这样老练而果敢的将军统帅，保皇军不可能在没有尝试其它努力之前，坐等可耻的失败或疯狂地发起自杀性的进攻。他应预见到敌军撤退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他应准备从战略上封闭敌人的退路，可以准备在饥饿无望的敌人落荒而逃时倾全力给其毁灭性的一击。然而，似乎这些应该做的圣马丁都没有去做。

尽管如此，胜利，虽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似乎仍然巩固了圣马丁作为护国公的地位，表面上提高了他的威望。然而，他赖以支撑一切的基础却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挖空了。自那时起社会舆论也渐渐对他不利。还有一种新兴的民族精神也在反对他的领导。

圣马丁在秘鲁任护国公的前半年为行政组织和制定宪法打下了基础。因此，他无愧于“秘

鲁自由的缔造者”的称号。独立的秘鲁不能自立，没有军队，解放了它的外来军队保护着它，同时也控制着他。圣马丁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为秘鲁创建一支民族军队。他建立了一个由秘鲁本国人组成的师，命名为“秘鲁军团”，包括一个步兵团，由米列尔指挥；一个骑兵团，由布兰德森指挥，另外还有一个炮兵连。

继而圣马丁开始整顿国家财政，改革了殖民主义的贸易制度。废除了印第安人的劳役制度。人头税、领主权等殖民主义制度，解放了奴隶。在学校里废除了体罚，建立了一个国家图书馆。废除新闻预先审查制，确立了出版自由。

圣马丁颁布了“临时法规”，囊括了各方面的法律和职能；建立了咨询性质的“国务会”；成立了独立的司法机构，保证行政权不干预司法权。

这个政治组织法案中，没有确定政体的形式。除了已成为事实的独立、分权原则和人民主权理论之外，没有其它基本原则，只是民主雏形的轮廓，它的模糊的线条勾画出一个立宪君主政体国家的外形。它没有明确宣布共和制

为政府的确定形式，它包含着一种隐蔽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圣马丁经久未变的信念。

同是这块大陆的伟大解放者，但在北方驰骋的那位加拉加斯人却是坚定的共和制信徒。

第四章　最后的胜利

一八一五：玻利瓦尔的“滑铁卢”

玻利瓦尔在1815年进入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委内瑞拉建立共和国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经历了1812年大地震和6年的战争，全国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在西班牙，费尔南多七世复辟，正准备派遣赫赫有名的巴勃罗·莫里略将军统率15 000人的庞大远征军来扑灭美洲殖民地起义的最后几处烽火。

巴勃罗·莫里略中将是一位战功卓著的西班牙名将。在欧洲他有着辉煌的战绩，凭自己的战功从一名普通士兵擢升至将军。1815年4月他率领西班牙为重新征服美洲而派出最大一

支远征军抵达委内瑞拉海岸。他们的任务是扫平整个反叛的南美大陆，而在这个时候更是谁也无法预料这支光荣的军队和这位威名赫赫的将军的悲剧性命运。谁会想到，美洲大陆竟然也成了他们的“滑铁卢”。

从委内瑞拉亡命出走的玻利瓦尔先到了牙买加。他在牙买加没有因失败而消沉，而是埋头读书，苦苦思索。在他心中，对未来美洲的光辉前途和南美洲自由、富强、独立的希望之光从未熄灭。在流亡期间，他开始着手制定不仅解放委内瑞拉，而且是解放整个南美洲的新计划，具体设计了以后将在每个国家建立的政府形式。他憧憬建立一个南美国家的大联邦，首都设在巴拿马。他建议开掘一条穿越中美地域的运河来促进世界贸易。由于他相信南美新独立的国家还不够成熟，不能很好地利用共和制政府来治理国家，所以计划选举一个领导每个国家的终身总统。他最得意的方案是建立一个由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联合组成的称为大哥伦比亚的共和国并终生为之奋斗。这些计划后来以《牙买加书信》的名义加以发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玻利瓦尔不仅仅是位

军人，而且也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不过，在1815年，当时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

玻利瓦尔虽然已逃出了南美大陆，但西班牙并不肯就此放过他。因为他们视玻利瓦尔为一个极端危险的狂人，一个煽动性极强的鼓动家、一个偏激的宗教异端和一个彻底地反对国王的叛逆，必须除掉他而后快。一天晚上，玻利瓦出去看望一位朋友，一夜未归。第二天早晨，当他回家时却发现自己的吊床上躺着一个人。近前一看，却是一具血肉模糊的男人的尸体。玻利瓦尔大吃一惊，仔细查看，才认出那是他在哥伦比亚的一位老朋友。原来，这位同样流亡出走的朋友当晚恰巧来看玻利瓦尔，见他迟迟不归，就舒舒服服地爬到他的吊床上睡去了。但他哪里料到，月黑风高之夜，几个手持寒光闪闪的匕首的黑衣蒙面人，鬼影一般在夜色的掩护下蹑手蹑脚地潜进玻利瓦尔的住宅。摸到吊床前，见一人正在酣睡，便在黑暗之中几人的匕首手起刀落，将床上之人活活捅死，连哼都没哼一下。事后玻利瓦尔才查清，是他身边的一个黑人侍从被西班牙的特务收买，里应外合，放进了杀手。但他却未曾知道，

当晚玻利瓦尔跟谁都没打招呼孤身去会友，或许是巧合，那位朋友也正好来访，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作了玻利瓦尔的替死鬼。

这次未遂的暗杀事件使玻利瓦尔猛然意识到虽然逃离了大陆，但仍然未脱西班牙的魔掌，牙买加也不安全。于是他再次逃亡，逃到了早已挣脱了西班牙殖民枷锁的黑人共和国海地。

海地此时仍处于分裂之中。在南方，黑白混血种人亚历山大·佩蒂翁担任当时在美洲新大陆除美国外还存在着的独一无二的共和国的总统。他接纳玻利瓦尔在海地避难并向他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作为对这种援助的回报，玻利瓦尔保证他在南美登陆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放所有的奴隶。

其他一些正在流亡中的革命者纷纷从加勒比海的一些岛屿来到海地同玻利瓦尔会合。巴勃罗·莫里略的远征军重新占领了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但在一些地方仍有抵抗运动存在。那个曾经顶撞过玻利瓦尔的哥伦比亚青年军官桑坦德并没有同其他人一起外逃，他带领一部队转战在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的深山里。

曾同西班牙人一起反对独立起义的平原人首领托马斯·博维斯已经战死。莫里略和他的将领们看不起这些平原人，这极大地伤害了强悍的平原人，他们在新领袖何塞·派斯的领导下正转战于平原之上，掉转枪口打西班牙人。

1815 年终于结束了。尽管这一年中玻利瓦尔似乎经历了一个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痛苦和挫折，但一线转机终于艰难地出现了。

知难而进的人

为了把爱国者们重新集合在争取祖国自由独立的大旗下，玻利瓦尔必须解决导致独立革命内部分裂不和的 3 个难题：一是要消除在许多考迪罗之间存在的相互对立甚至仇恨，把他们各自的力量疏导到革命大业上来；二要改变政治家和法学家们的态度。他们认为革命的失败是由于考迪罗们自行其是，但他们的非议和不切实际的重整宪制计划也只能使地方割据的混乱局面更为严重；最后则必须肃清革命阵营中的阴谋家和投机分子，他们的危害极大。

1816 年 3 月，重新集合到革命旗帜下的共

和派革命者们在海地的列凯镇召开大会，宣布玻利瓦尔为最高统帅，任命他为委内瑞拉和新格纳达的军政首长，开始进行打回委内瑞拉去的远征。这次远征因此称为列凯远征。3月31日，远征军驶离海地拉贝亚塔港，开向委内瑞拉东海岸的玛格丽塔岛。

这次远征看起来是一次真正的唐·吉诃德式的冒险。只有六条临时拼凑起来的小船和一门炮，总兵力不足250人，都是军官，没有士兵。但这次远征对解放委内瑞拉的重要性是不能仅从它的规模来判断的。这是1814年革命失败后第一次东山再起的努力呵。

远征军到达了委内瑞拉东海岸。西班牙的一双桅帆船和一艘快船发现了他们。战斗开始了，爱国者们决一死战，冒死登上那艘双桅帆船，同敌人展开白刃战，敌船长战死。不久，敌快船也投降了。俘获西班牙的两艘军舰后，远征军在玛格丽塔岛稍事休整，又率军开向委内瑞拉东岸。

在委内瑞拉东部，起义者从未停止抵抗。他们在莫里略庞大的远征军到来之后也没有放下武器，而是继续在从遥远的圭亚那直到北部

沿海广大地区坚持游击战争，他们的几位领导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考迪罗。

玻利瓦尔的这次远征，迫使莫里略从新格拉纳达撤兵回击玻利瓦尔，而不再继续向美洲大陆的其它地方进军。玻利瓦尔得知敌军正在从海上和陆地向他攻来，于是决定进攻委内瑞拉中部，相机拿下加拉加斯。但在那种敌人占据绝对优势的形势下，玻利瓦尔的进攻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玻利瓦尔又一次回到海地。他并没有被这一次失败击倒。他遇到过很多挫折和失败，今后还将继续咀嚼失败的苦涩，但他从未服过输。

玻利瓦尔立即着手准备下一次行动，重返委内瑞拉。

这次，玻利瓦尔不仅再次得到海地总统的大力援助，他在英国的朋友们更向他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巨大帮助。拿破仑在欧洲失败以后，反法同盟国家成千上万的士兵被遣散。西班牙士兵被派往南美镇压殖民地的独立战争，但无数的英国和爱尔兰士兵在国内却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流落街头。这些在欧洲大陆同

拿破仑的法兰西军团进行过浴血奋战的老兵被招募到玻利瓦尔的麾下，这次他们要同过去的盟军一争高下。

1817年元旦，玻利瓦尔再次率军乘船开往委内瑞拉。这次，他不再直接进攻加拉加斯，而是同已在委内瑞拉东部站稳了脚跟的马里尼奥和皮亚尔取得联系，率部驶向东部的奥里诺科河河口，再溯河而上200英里，占领了森林地带的安戈斯图拉城。在那里，玻利瓦尔的军队可以靠从上游开来的船只获得给养，并同内地的其他起义队伍保持联系。

到这个时候，玻利瓦尔的领导地位仍然是不稳固的。他的每一次失败都会使一些考迪罗失去对他的领导的信心和尊敬。尤其是那些独占一方、很有实力的考迪罗，更是跃跃欲试，企图取而代之。马里尼奥和皮亚尔是最危险的两个。皮亚尔尤甚，在安戈斯图拉，他终于向玻利瓦尔发难。最后，他被以“不服从政府，临阵脱逃，阴谋造反”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次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玻利瓦尔暂时可以安心谋划解放大业了。

过去无数次失败的痛苦经验教育了玻利瓦

尔，他认识到直接进攻敌人重兵把守的委内瑞拉沿海城市是行不通的。他制定了新的进军计划，先溯奥里诺科河而上，进入委内瑞拉内地；在内地平原站稳脚跟后，再把那里当成作战的根据地，从内地平原向沿海城市推进。这样不象过去那样从海上正面进攻，而是迂回到城市的背后进攻。而这一计划能否实现则完全取决于玻利瓦尔能否得到阿普雷平原剽悍的平原人的支持。

平原人的领袖："赤发鬼"派斯

正是在1817年年底，阿普雷平原的考迪罗何塞·安东尼塞·派斯决定率领他那支英勇善战的平原人队伍归顺玻利瓦尔。

派斯举行的归顺玻利瓦尔的仪式，简直象是十字军出征的一个场面。派斯自己说，仅仅是为了国家利益。他考虑到玻利瓦尔的军事才能，他的甚至已经得到国外公认的威名，尤其认识到有一个最高权威和一个中心来统率各地的考迪罗这一做法会带来的好处，他才决定把自己的权威置于玻利瓦尔的权威之下。他集合

起他的队伍，请来了当地一位著名的神父主持这次仪式。派斯请神父当众领着他宣誓承认玻利瓦尔将军为最高统帅，同时让在场的官兵也照着他的样子来宣誓。与此同时，派斯命令他在其它地方的部队也都进行同样的宣誓。

之后，派斯通知玻利瓦尔两军会合的地点。玻利瓦尔知道，过去在博维斯领导下同他作战的平原人现在正在派斯的统率下以同样的勇猛打击西班牙人。但他们又是不可预测的。或许仅仅因为不喜欢他的外表，他们还会转而反对他。

玻利瓦尔率领他的队伍沿奥里诺科河向上游走了 400 英里。奥里诺科河这条委内瑞拉最大的河流汇聚了全国所有的主要河流，安戈斯图拉则像这条大河的心脏。到达奥里诺科河与它的一条支流阿普雷河的汇合处，玻利瓦尔率部队又沿阿普雷河向西北前进，奔向阿普雷平原。一路之上，他们的衣服鞋子全都磨破了，每人携带的不多的口粮吃光了，只能靠从河边沙地里捡来的龟蛋来充饥。当玻利瓦尔的部队跋涉了一个多月，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地来到阿普雷平原腹地的卡尼亚菲斯托拉牧场时，派

斯已和他的部下 2 000 多人在那里等待着他们。

派斯端坐在战马上，看上去令人敬畏。他宽宽的双肩，肌肉发达；短粗的脖子上支撑着硕大的头颅，深栗色的头发短而卷曲；棕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只是在他下马以后，才能发现他的双腿又瘦又长，同强壮的躯干和大脑袋不太成比例。他手下的士兵也是千奇百怪的。他们光背赤脚地骑在马上，穿着用兽皮做的紧身裤子，头上包着五光十色的头巾，手中只有用硬木削成的长矛作为武器。但玻利瓦尔知道他所面对着的是南美最优秀的骑手。他和派斯谨慎地互相打量着对方，过了一会儿，他们的眼中突然迸发出友情的火花，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双方战士一片欢呼。

这时派斯年仅 29 岁，比玻利瓦尔小 5 岁。他是一位贫困的印欧混血种农夫的儿子，17 岁时因打死了一名拦路抢劫的强盗，犯下命案，被迫逃进平原。他当过好几年牛倌，艰苦的生活把他磨练成为勇敢、机智的斗士。20 岁时，他参加了由西班牙人组织的平原团，后来又在博维斯的指挥下战斗。当莫里略率领他的在欧

洲战功卓著的远征军来到委内瑞拉后，他们都犯了瞧不起衣衫褴褛的平原战士的错误。平原人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们回到了平原地区，在派斯的领导下重新组织起来，同西班牙人战斗。

作为一位游击战争的指挥者，派斯是出类拔萃的。他富于进取精神，足智多谋，行动果敢迅速，他率领的人越少却越令人胆战心寒。他特别喜欢使用的战术是在炎热的夏季，把西班牙引诱到象干柴一样的平原上。然后在草原上放火，把西班牙人包围在火海之中。

玻利瓦尔的高傲潇洒的举止征服了派斯。派斯对玻利瓦尔满怀敬意，这应该是他们真诚合作的基础。

桑坦德获悉派斯和玻利瓦尔在平原会合后，也率领他的哥伦比亚士兵下山同他们合兵到一处。

3人会合后，玻利瓦尔又开始率领这支军队向东挺进，打击西班牙人。他们东进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西班牙人重兵把守的河宽流急的阿普雷河。玻利瓦尔手中没有任何船只，甚至连扎制木筏的木材也找不到。而西班牙人在河中

则停泊着七艘满装的炮艇。玻利瓦尔从河岸踱来踱去时，派斯一直注视着他。他纵马上前，询问玻利瓦尔为何这样焦急不安。玻利瓦尔对他说："我情愿以整个世界来换取那支西班牙舰队，没有它我就无法渡河，军队就不能前进。"派斯回答说："1小时之内它就将属于您。""不可能的！"玻利瓦尔喊道。"我来负责！"派斯说着便疾驰而去。几分钟之后他带来了自己的仪仗队，从这支300人的精兵中最后挑选出50名骠骑兵，自己第一个纵马跃入河中，50名骑兵紧随其后。他们用嘴叼住长矛，一只手划水，一手搂着马脖子，嘴里高声呼喊，驱散河里的鳄鱼，慢慢向敌船靠近。西班牙人开火了，但他们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仍在策马向前。终于来到船边，在派斯的带领下，他们从马背上一跃而起，跳到船上，与西班牙人展开了白刃肉搏。最后派斯和他的勇士们占领了所有敌船。这样的战斗是看惯了欧洲正规军整齐划一的阵地战的西班牙人和玻利瓦尔的欧洲雇佣兵们闻所未闻的。

这就是在牧场放牛时被工头称为"赤发鬼"的派斯，同样是他，后来成为彻底独立了的委

内瑞拉共和国的总统。

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

由于派斯和桑坦德的加入，玻利瓦尔率领的爱国军力量壮大了。再加上内地其它优秀的爱国将领们的配合，玻利瓦尔于1818年初从南方的瓜里科平原出发，第三次进军加拉加斯。这次战役开始得极为顺利，在卡拉博索城附近，玻利瓦尔截击并打败了莫里略，使他只好仓皇撤往中部地区。

一切都预示着玻利瓦尔将重振1813年辉煌的雄威。莫里略好容易才在乌里奥萨和桑布雷罗两次阻止战中阻止了爱国军的追击，得以撤往中部地区。保皇派一片惊慌，许多人赶到拉瓜伊拉乘船逃往国外，加拉加斯当局也销毁了大部分档案。然而莫里略的顽强精神丝毫不逊于玻利瓦尔本人。当玻利瓦尔打到阿拉瓜谷地时，保皇军三支实力强劲的队伍严阵以待地正在那里恭候着他。

恰在最关键的时刻，派斯拒绝到平原以外去继续作战，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不得而

知。他是平原人的领袖，他和他的士兵们都极不情愿走出平原。他的队伍不适于在丘陵地带作战，平原人的战马马蹄软嫩，从没挂过掌，肯定走不了阿拉瓜谷地崎岖多石的道路。这一切都可以成为理由，但似乎也都不足以成为抗拒玻利瓦尔的充分理由。总之，玻利瓦尔在最危急的时刻无法使用他最精的兵力。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玻利瓦尔被迫撤退，并在普埃尔塔这个爱国军曾两次受过致命打击的地方，于 1818 年 3 月 16 日又一次被莫里略和莫拉莱斯打败。这次战斗十分激烈，玻利瓦尔和莫里略都亲自上阵。莫里略还身负重伤。

然而，爱国军在这次战斗失利之后，便认为整个战役也都失败了。尽管玻利瓦尔再次率军发起进攻，在奥尔蒂斯进攻保皇军拉托雷部队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但两败俱伤，未分胜负，双方都撤退了战场。这场战斗使爱国军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更为渺茫了。

局势已经十分不妙，这时驻扎在托罗角的玻利瓦尔又遭到暗算。4 月 17 日夜间，西班牙人从一名爱国军逃兵那里搞到了他们当夜宿营的口令，于是选择了这个机会来刺杀玻利瓦

尔。当晚爱国军宿营后，玻利瓦尔把部队交给桑坦德负责指挥，自己到树林里的吊床上去休息了。深夜，营外走来几个人，为首一个穿着共和军的军官制服，其余几个是士兵打扮。他们求见玻利瓦尔说带来了重要信件。他们穿过外围警戒线，一直来到桑坦德的面前。

桑坦德也几乎上当。他把他们带到玻利瓦尔的吊床附近，开始以正常的口气报告："将军，一位信使来……"就在此时，桑坦德突然警觉起来，他的声音最后变成告警的语气。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名军官拔出腰间手枪向吊床连发五、六枪，枪枪命中！但是桑德坦告警的声音使玻利瓦尔有了提防，他一跃跳到地上，竟奇迹般地逃脱了这场厄运。

共和军营地一片大乱。清晨，共和军再次受到保皇军的进攻，军无斗志，很快败退下来。玻利瓦尔率部队继续向平原地区的首府阿普雷河畔的圣费尔南多撤退。玻利瓦尔因病耽搁了几个星期后，让派斯继续从平原那里不断骚扰莫里略，自己返回了安戈斯图拉。

尽管攻打中部地区的战斗遭到失败，但在1818年末，玻利瓦尔在长期奋斗、重建共和国

这个任务临近完成之时，做了两件大事：削平山头，消除了考迪罗各自为政的局面；重建了国家的法律制度。此外，爱国军攻占安戈斯图拉城，这也大大有利于重新制订法律。那是一座远离战区的城市，交通便利，既可联系国外，也能便利到达共和军占领之下的边远地区。

玻利瓦尔虽然只控制着委内瑞拉的一小块领土，革命虽然屡遭挫折和失败，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能使玻利瓦尔放弃他认为最主要的两项计划：在安戈斯图拉召开国会，稳固地重建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出兵新格拉纳达，那里将和以往一样，向爱国事业提供兵员和新的资源。

国会选举于 1818 年底举行。1819 年 2 月 15 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为了阐明自己关于制订一部什么样的宪法才最适合于委内瑞拉共和国的想法，玻利瓦尔发表了一次演说，最全面、最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

他强烈地坚持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委内瑞拉不能继续步美国国会的后尘，更不能保留委内瑞拉 1811 年的宪法，因为这部宪法不仅维持一种松散的联邦制，而且还设立一个软弱无力

的多头执政机构。他没敢一开始就提出这些人家不爱听的原则。他首先对美洲的一些政治事例作了无情地剖析，继而又一般地谈到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是怎样历经磨难和波折才使得自由民主制度最后巩固下来。他说："我们美洲人民在愚昧、暴政和恶习这三重桎梏下生活，没有知识，没有权力，也没有美德。"他预见到"无知的民族会盲目地充当自我毁灭的工具。一些人的野心、阴谋，会对那些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知识的人们的轻信和幼稚加以滥用，纯粹的幻想会被当成现实，放荡不羁会被看成是自由，叛逆会被认为是爱国，睚眦必报会被当作是伸张正义。这样的人民就象一个身强力壮的瞎子，他感到自己力大无比，像最心明眼亮的人那样信心十足地向前走去，结果东撞西碰，就是不知道究竟应该往那里走。"

他认为，人民所以会走上这样的歧途，都是殖民制度造成的恶果。他把殖民制度当成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加以谴责。他再三指出，殖民制度不仅使人民没有知识、没有经验，而且使他们思想堕落。而"一个堕落的民族，一旦获得自由，也会很快重新把它丢掉，因为人家无法

使它明白这样一些道理：幸福在于实行美德；法律决无通融的余地，所有的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是为了他们好，所以，法律的权威胜于暴君；法律的支柱是良好的风尚而不是暴力；遵守法律就是行使自由。”

他的基本结论是：“委内瑞拉政府已经是，现在还是，而且必须是一个共和政府。这个政权的基础应该是：主权属人民、权力分散、保证公众自由、取缔奴隶制，以及取消君主制和特权。我们需要平等，用它来把各种人种、政见和社会习尚重新融合成一个整体。”

1819 年 2 月 25 日，在安戈斯图拉建立了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玻利瓦尔被选为总统，著名学者弗朗西科·塞亚当选为副总统。

进军新格拉纳达

玻利瓦尔一面忙于从政治上、行政上重建共和国的工作，一面在准备出兵新格拉纳达。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将彻底改变战争的进程。

为此，他准备请他早已物色好的新格拉纳达军官弗朗西斯科·桑坦德同他合作。桑坦德

才能出众，善于组织人民，为人正直，忠于祖国，意志坚定，严守纪律。从革命一开始，他就曾在新格拉纳达和委内瑞拉作过战。他先是玻利瓦尔最好的合作者，后来被选为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又成为他最可怕的敌手。1818 年 8 月 12 日，玻利瓦尔提升桑坦德为准将，任命他担任与委内瑞拉的阿普雷相接壤的新格拉纳达的卡萨纳雷省省长兼部队总司令，拨给他 1 000 条步枪外加弹药和军服，筹建先头部队。3 天后，玻利瓦尔在一份通告中向新格拉纳达的居民们宣布："在太阳转完这个周期之前，祭祀自由的神坛将遍及你们的土地。"没等到下一年期满，就在 1819 年 8 月 7 日，玻利瓦尔取得了博亚卡之战的胜利，实现了他的诺言。

1819 年 4 月 2 日，出兵新格拉纳达前，玻利瓦尔的共和军在克塞拉斯又取得了一次传奇性的大胜，这无异于一次奇迹，是为共和军远征新格拉纳达最好的壮行礼。

在克塞拉斯，莫里略和玻利瓦尔的部队在阿普雷河隔岸对峙。莫里略占有兵力上的很大优势，因此玻利瓦尔不敢贸然与其决战。前几天他只是派部队从远处骚扰保皇军，打击他们

的补给线。但派斯决心进行一次大胆的冒险。

从一个西班牙军队的逃兵嘴里，他得知莫里略已下定决心，如果派斯再去挑衅，他就要用全部力量活捉他或杀死他。莫里略的决心不仅没有吓住派斯，反而使他产生了消灭敌人全部骑兵的设想。

派斯挑选了150名最优秀的平原长矛手，和他一起泅渡过河。到了对岸，他们重新上马，直扑敌阵，一直进入保皇军的步枪射程之内。果然，盛怒的莫里略调集了精锐部队向派斯杀来。派斯见敌大军扑来，开始不慌不忙地组织撤退。他把自己的长矛骑兵分成20人一组的小分队，只留10人在自己身边，命他们用长矛向敌人发起冲锋，在敌人的两部分骑兵形成合围之前及时撤回来，待敌人的骑兵集中在一起之后再发动下一次攻击。如此反复，将追兵引得离主力部队越来越远。派斯的长矛骑兵忽而从两翼打击敌人，忽而又四散奔逃，似乎马上就要溃败，却又突然组成密集的方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敌人的步兵或骑兵。终于，派斯看到敌人的骑兵只顾一心一意追击自己，早已把步枪兵远远丢在后面而使其成为一支孤

军，只听他一声大喊："回马！"所向披靡的平原战士立即纵马扑向措手不及的保皇军阵中大砍大杀。保皇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只是由于天色已晚，莫里略又凭借一片树林及时撤退，西班牙人才免于全军覆灭。

这次大胜无疑极大地振奋了全军的斗志。但接着而来的向新格拉纳达的进军却再也没有这样鼓舞人心过。进入五月，热带草原上漫长炎热的旱季结束，雨季开始了。连绵不绝的大雨把整个平原变成了一个大沼泽。莫里略把他的部队撤出平原，退到海边舒适的城市里等待雨季的结束，因为在雨季里是无法作战的。整个平原都留给了玻利瓦尔他要面对水乡泽国一般的平原，将近半年时间不得逃脱。饥饿、开小差和疾病将使部队严重减员。

玻利瓦尔没有坐以待毙。在一次作战会议上，他宣布了他的向新格拉纳达进军的大胆计划：派斯继续留在平原上坚持游击战争，自己率领主力同桑坦德部队会合，向西翻越安第斯山，进军新格拉纳达。趁雨季西班牙人收缩防线，翻越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山，能收到意想不到的奇袭效果。但这个计划太大胆了，大家听

后都哑口无言。突然，一个爱尔兰雇佣军的青年上校跳起来发誓说，如果必要的话，他将跟随玻利瓦尔一直打到合恩角。他的激情感染了众人，大家都赞成了玻利瓦尔的计划。

于是，玻利瓦尔率领他的部队及少量平原人向西部高山进发。他们白天趟着有时齐胸的水前进，晚上找些稍稍干燥的地方露营。平日的口粮只有没加盐的白水煮肉。跟在他们后面的还有一支妇女和小孩的队伍。在由本地人组成的军队中，家属总是跟着军队一起行动。

部队终于和桑坦德会师，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第一次可以晒干自己的衣服。应该记住一点从每年5月开始，直到11月，正是南半球这个地区的冬季，玻利瓦尔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季节率领这支远征军翻越海拔三、四千米的安第斯山。

远征开始时部队所走的地方与其说是陆地不如说是一片汪洋。从6月22日开始又碰到了另一种障碍。一般认为在这个季节是不能通行的雄伟的安第斯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挡住了部队前进的道路。现在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大自然。一连四天，部队艰难行进在悬崖峭壁般

的崎岖山路上。平原人看到这些高山险峰感到惊诧不止、无比恐惧，他们奇怪，居然还有和他们故乡如此不同的地方。越往高处去，每翻过一个山峰，他们的惊奇就增添一分。他们原以为已经登上了最后一个山峰，可接着而来的却是一个又一个更高的山峰，再往远处眺望，仍是层峦叠障、无边无际望不完的高耸入云的群山。许多人开了小差。驮武器弹药的骡子在重压下倒地死去，到行军的第五天，只有少数马匹还活着。先锋师的死马阻塞了道路，更增添了后续部队前进的困难。雨，不分白天黑夜地下个不停。气温随着地势的增高而越来越低。部队大部分都患了腹泻。重重困难似乎要联合起来摧毁玻利瓦尔的希望。这些困难中，哪怕是最小的一个，也会使意志稍稍薄弱一些的人丧失信心。只有玻利瓦尔这样坚强的人在这样的逆境中仍然坚定不移地追求自己既定的目标。他身先士卒、事事带头，以自己的榜样鼓舞部队的士气。玻利瓦尔告诉士兵们荣誉正在前面等待着他们，他们前去解放的地方是一个富饶的国家。士兵们高兴地听着他的鼓动，重新振作起精神继续艰难跋涉。

7月2日，玻利瓦尔率军来到安第斯山最后一道山峰脚下。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已被西班牙人扼守住，只有另一条路，通过的拉皮斯巴隘口无人把守。但这条路据认为只有在夏天才能通行，因此保皇军才疏于防守。也恰恰因为这点，玻利瓦尔决定走这条路。他说，只要山羊能去的地方，部队也能过去。山路崎岖险峻，由于连日大雨不断，变得泥泞不堪，更有些地方发生滑坡，山路坍塌，十分危险。每个士兵都领到了够吃四天的肉和蔬菜作口粮，但他们把绝大部分口粮都扔了，随身只携带着武器，因为这些山空手攀登已十分吃力，他们不愿再为自己增加困难。幸存下来的马匹在那一天都死得差不多了。下半夜时，部队来到拉皮斯巴隘口下，就在那里露营。那是一个可怕的夜晚，茫茫荒原，找不到一处栖身之所可以挡风遮雨。宿营在露天，连绵的小雨夹着冰雹，凛冽的寒风吹个不停，篝火刚刚点燃就被浇灭。战士们几乎赤身裸体，而且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出生在委内瑞拉炎热的平原地带。他们所遭受的困苦很难用语言来描写但很容易想象。第二天，他们穿过了荒无人烟、由于地势

太高而寸草不生的隘口地区，那一天，许多士兵倒在刺骨的寒风中，在这里，只要有100人的保皇军，就可以把玻利瓦尔的部队全消灭掉。战士们赤着脚行军，鲜血染红了只能单人通过的狭窄山道。跟在他们后面的是衣衫褴褛的妇女和儿童，个个虚弱得象随风飘动的稻草人。

7月5日，先头部队经过一个半月的跋涉终于完成了从委内瑞拉平原开始的远征，开进了安第斯山西侧山脚下通哈省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象欢迎凯旋的英雄那样迎接了他们，为他们送吃的、送衣服、装备，还特地为失去战马的骑兵们到处寻马。为了使行动不失去突然性，玻利瓦尔只允许部队在此休整四天，当部队开拔时，全村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决定从军跟随玻利瓦尔一同前进。

7月25日，玻利瓦尔率军与保皇军会战于巴尔加斯沼泽。共和军是经过了长途奔袭的疲惫之师，但士气高涨、不怕牺牲，而保皇军以逸待劳，已舒舒服服地休整了很长时间，但却被共和国军的士气所震慑住了。玻利瓦尔一开始就处于不利地位，西班牙人占据了居高临下

制高点，用密集的炮火猛轰共和军。玻利瓦尔的英籍雇佣军团勇敢非凡，两次收复了步兵阵地，但都没能保住。似乎一切都已经输定了。这时，玻利瓦尔奔向尚未投入战斗的胡安·何塞·龙东上校和他的来自平原高地的骑兵，高声喊道："上校，拯救祖国在此一举！"此刻保皇军的骑兵正向爱国军冲来准备最后结束战斗，龙东立刻率队发起反冲锋，冲散了敌人骑兵，又打垮了上来支援骑兵的敌步兵。与此同进，爱国军另两名骑兵指挥官也发起了同样勇猛的冲锋。保皇军开始全军动摇，共和军的步兵乘势反攻，终于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8 月 7 日，经过短期休整的共和军再次主动出击，终于在博亚卡桥截住了正在过河前往博亚卡的西班牙主力部队。抢在西班牙人开炮前，玻利瓦尔命令骑兵和步兵发起联合冲锋。当时已时过正午，战斗短促激烈，玻利瓦尔亲自冲锋陷阵，一直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整整一个下午，共和军终于取得全胜。1 600 多名保皇军被俘，其中包括这支保皇军的司令官，全部辎重都落入玻利瓦尔手中。新格拉纳达总督闻讯逃离波哥大。10 日，玻利瓦

尔占领该城。博亚卡的胜利结束了西班牙在新格拉纳达的统治。

解放委内瑞拉

一占领波哥大，玻利瓦尔就开始筹划向总督辖区的北部和南部进军。在北部，他准备解放新格拉纳达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对委内瑞拉开辟一条新战线；在南部，他的目光越过千山万水，投向群山深处的利马。他和南方的解放者殊途同归，最后都要到秘鲁来完成他们的事业。

委内瑞拉正在发生的情况却使他感到不安，第三共和国的文官政府处于危机之中，派斯等考迪罗对政府采取了积极抵制的不合作态度。玻利瓦尔远离委内瑞拉第三共和国的临时首都安戈斯图拉，雨季使一切道路都被淹没了，而战争又使交通通讯极不可靠。这一切使玻利瓦尔实际上处于被隔绝的状态。他只能根据经过3个月才得到的消息来发布命令，而这些命令还要再经过3个月才能到达安戈斯图拉。他决定返回安戈斯图拉，顺路到阿普雷再

见一次派斯。他在波哥大总共才呆了1个月零10天。

不过，到这时玻利瓦尔最向往的目标之一已经实现：委内瑞拉、新格拉达和旧基多检审庭辖区已经联合组成一个国家。新的国家叫哥伦比亚，原来米兰达企图建立大美洲联盟时就想取这个名字。安戈斯图拉议会于1819年12月17日批准了建立哥伦比亚。玻利瓦尔强烈地感到三国的联合是牢不可破的，以至在此后他极少单独提到委内瑞拉、新格拉纳达或基多。对他来讲，只有哥伦比亚。只有哥伦比亚壮丽的大自然使他感到极其振奋。他也谈到美洲，好象对他来讲美洲要比自己的祖国委内瑞拉更为具体。只有米兰达曾和他一样，强烈的美洲大一统的感情使他们神驰美洲大地，并把自己的想象当成了现实。

博亚卡胜利之后，在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已相对地停顿下来，玻利瓦尔可以亲自推动向新格拉纳达北部和南部的进军了。

1820年初西班牙国内自由党人的革命取得了胜利。这次革命使得原来要派去征服美洲的一支新的远征军无法出发了。另外，费尔南多

七世不得不宣誓接受1812年的宪法，这部宪法当然也应在殖民地生效。西班牙政府向在新世界的将领发出了指示，要他们开始和共和派进行谈判。

莫里略也早看到西班牙在美洲的统治已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他对土生白人的看法也在迅速改变着。开始时他对这些“叛乱分子”深恶痛绝，而且不把他们放在眼里。那些人衣衫褴褛，分明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竟敢提出那些要求，实在令人难以容忍。不久之后，他就逐渐认识到这些人有勇气。莫里略是否终于认识到他所蔑视的寒酸而散漫的土生白人部队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恰恰就是脱胎于当年西班牙人民为本国独立而斗争时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牺牲精神这一点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到1820年时，他就毫不犹豫地把玻利瓦尔所进行的作战活动称之为奇迹，并承认美洲大陆北部海岸是“骁勇善战的美洲”。

但是，当他接到命令要他和共和派谈判时，他还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把共和派人士争取过来，或者在他们中间制造分裂。因此，他分头与玻利瓦尔，与其他一些主要的军事领导人

和安戈斯图拉政府接触，向他们建议宣誓效忠于西班牙颁布的宪法、并派代表去参加西班牙的议会。这两点他都没有成功。安戈斯图拉政府和各位军事领袖都回复说，玻利瓦尔是唯一受权代表他们大家来谈判的代表。

玻利瓦尔深信不疑，如果马德里成立了一个自由派的政府，这个政府就会承认美洲各国人民有获得独立的权利。于是玻利瓦尔和莫里略各派代表进行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停战6个月的协议，于1820年11月25日在特鲁希略城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举行最终签订和约的谈判创造条件。文件签署时明确承认这是哥伦比亚政府和西班牙政府之间的协议。

这样，共和国的地位也就得到承认，哥伦比亚从此开始同它过去的宗主国平起平坐了。自然，西班牙的指挥官们这时已把玻利瓦尔作为新国家的总统来看待了。现在玻利瓦尔是一个伟大国家的合法代表，这个国家的疆界从奥里诺科河河口起直到秘鲁的边界为止。

签订停战协定的第二天，根据协定中一项条文的规定，双方又签定了一个称为作战守则的协定，它把双方之间的斗争限制在人道主义

和国际法的原则范围之内。

两个条约都由双方的全权代表签订，但文件刚刚签订，莫里略就提出要亲自会见玻利瓦尔，玻利瓦尔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会晤于11月27日在玻利瓦尔占领的特鲁希略城和莫里略军队控制的卡拉切镇之间的桑塔纳镇举行。在会谈后几天，莫里略就把委内瑞拉的政权和军权交给米格尔·德·拉托雷将军，并于12月17日启程回西班牙，亲自去说服费尔南多七世停止在殖民地的战争。此外，多年戎马生涯之后，他也想退役了。

根据停战协定的规定，解放者任命了两个全权代表，外交部长何塞·拉斐尔·雷文加和波哥大省长何塞·埃切维亚，到西班牙去商谈最后承认哥伦比亚共和国及恢复和平问题。玻利瓦尔给他们的指示是绝不能接受西班牙政府可能提出的由一位波旁王朝家族的成员来作哥伦比亚的国王，即使附带了优厚的条件也不能接受。不仅不能接受波旁王朝的人，欧洲任何王室的成员都不能接受。哥伦比亚一定要成为独立自主，不受外来统治的国家，否则就会灭亡。

玻利瓦尔想利用这段停战时期亲自前往基多。1821 年 1 月他到达波哥大。尽管停战协定包括了整个哥伦比亚，他仍然任命了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将军来代替巴尔德斯担任南进部队的总指挥，准备新的战争的爆发。

恰恰在委内瑞拉就发生了人们没有预料到的事件，使战争又重新开始。马拉开波市本来是属于保皇军的占领区的，该市人民于 1821 年 1 月 28 日起来反抗保皇部队，并向驻扎在附近的一支共和国部队求援。该地共和国驻军的指挥官埃拉斯少校不待政府的指示就占领了该市，于是西班牙人认为这是违反停战协定的挑衅行动。

实际上西班牙在哥伦比亚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了。1820 年 10 月共和国南端的城市瓜亚基尔市已经宣布独立。在委内瑞拉，土生白人组成的保皇游击队一天比一天多地投奔到爱国者的旗帜下来。拉托雷将军认识到他必须孤注一掷，进行一次决战，共和国军队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干一场。双方都在磨刀霍霍。

最后，双方于 1821 年 4 月 28 日重新开战，此时，玻利瓦尔和拉托雷准备进行野战的迹象

已很明显了。拉托雷决定把他的部队集中在委内瑞拉中部，解放者也命令他在南方和西方活动的3个师集中起来由他亲自指挥。3个师的领导人是派斯、塞德尼奥和乌达内塔。但乌达内塔患病，他的部队改由安布罗西奥·普拉萨上校率领。贝穆德斯将军所率领的东部爱国部队奉命由东向西朝着加拉加斯进军，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占领该市，或者牵制住加拉加斯的保皇军队。

在加拉加斯以西100公里的卡拉博博平原，拉托雷严阵以待，等候玻利瓦尔的到来。6月24日清晨战斗开始。拉托雷在他的阵地三面布置了六路步兵和三路骑兵，互相呼应、各为犄角，炮兵的大炮都对准了这三面。保皇军阵地的背后是一片森林，拉托雷把它当成天然的屏障和依托，没有布置任何防守，认为那里是万无一失的。玻利瓦尔恰恰选择了这里进攻，真正是出其不意，攻敌不备。他命主力部队避开正面战场，绕到和敌人阵地背后，发动进攻。派斯花了3个小时在枝叶横生的密林中开出了一条小道。但是小道窄得只能容下一人通过，这使部队出击速度大大降低，进攻的突然性大

打折扣。敌人利用宝贵的时间紧急调整部署，玻利瓦尔的先头部队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进的，伤亡很大。当“阿普雷勇士营”刚接近敌阵地，一股优势敌军立即居高临下向他们扑来。幸而“英国营”紧接着进入了阵地，虽然其营长和接替指挥的副营长先后牺牲，但战士们仍坚持在阵地上没有后退，这使更多的部队得以投入战斗。敌人终于开始溃退，玻利瓦尔取得了卡拉博博战役的彻底胜利。

卡拉博博之战给玻利瓦尔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的三名师长中有两位在冲锋陷阵中牺牲，只有派斯幸存。但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卡拉博博一战奠定了解放委内瑞拉的基础。

共和军在卡拉博博战役后又取得了一系列胜利。7 月 3 日拉瓜伊拉敌军投降；10 月委内瑞拉东部重镇库马纳光复；10 月 1 日新格拉纳达北部重镇卡塔纳赫守敌投降。这样，除卡贝略港和科罗省还有一些西班牙部队的零星抵抗之外，到 1821 年底，整个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都已获得了解放。

玻利瓦尔又一次凯旋而归，回到了阔别七

年的故乡加拉加斯。但解放者的这次衣锦还乡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欢乐。加拉加斯为了自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1812 年大地震中的许多残垣断壁仍凄凉无限地独立在那里。市民死了三分之二。那些幸存者忧郁冷漠地呆立在街道两旁，看着玻利瓦尔的部队入城。

在组织了加拉加斯市政府后，玻利瓦尔启程返回库库塔。途中，他在他家庄园的废墟前停留了片刻。他回忆起童年时无忧无虑的生活，特别是他结婚以后同年轻美丽的妻子在一起度过的虽短暂但永生难忘刻骨铭心的幸福时光，一时间心中升起无限的惆怅。

但解放者毕竟是解放者，他是人，但又非一般人。心中那丝惆怅只是一闪而过。片刻之间，他挥开了种种儿女情长的回忆，上马，永远离开了他的家园。

哥伦比亚共和国国会于 1821 年 5 月 6 日在库库塔召开了制宪会议。当玻利瓦尔在卡拉博博浴血奋战时，国会正在讨论宪法。8 月 30 日颁布了哥伦比亚的第一部宪法。波哥大被定为共和国的永久首都，玻利瓦尔和桑坦德分别当选总统和副总统。

这一年年底，玻利瓦尔率远征军南进。在他背后，留下的是飘扬着共和国旗帜的2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这片土地的自由，他十年中跑遍了它的山山水水，每一角落。

瓜亚基尔会晤：历史之谜

当玻利瓦尔身边再度升起一颗明亮的解放战争的名将之星时，他所领导的南美大陆北部争取自由的斗争已经到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阶段。

玻利瓦尔曾有过许多合作共事者，但唯有这个人，安东尼奥·何塞·德·苏克雷将军才是他最信任、最倚重的。也正是苏克雷代替玻利瓦尔将结束西班牙300年殖民统治的战争在美洲大陆上进行到底的。玻利瓦尔用父辈的慈严目光注视着苏克雷。

苏克雷于1795年2月3日生于委内瑞拉东部的库马纳市。1810年苏克雷仅15岁时就参加了共和派的军队。从1814年他19岁时起，就任贝穆德斯师的参谋长。1817年他升任上校，已经历了20余次大小战斗。随后他又担任

库马纳师参谋长。这以后，由玻利瓦尔本人明确任命，苏克雷又出任整个东部军的司令官。

玻利瓦尔像信赖自己一样地信赖苏克雷。而苏克雷也始终没有辜负这种信赖。

1821 年 5 月 7 日，苏克雷率军到达瓜亚基尔，准备从这里再向北进攻保皇军盘踞的基多。但这时他是一支远离了作战基地的孤军，如果没有玻利瓦尔从北向南的进攻作配合，他将一事无成。1821 年底玻利瓦尔率军南进。1822 年 5 月 24 日苏克雷率军在皮钦查山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占领了群山之巅的山城基多。玻利瓦尔进入基多时受到了苏克雷组织的群众的盛大欢迎。

这时，瓜亚基尔问题和秘鲁问题在玻利瓦尔面前格外突出起来。

苏克雷向瓜亚基尔和基多的进军的使命是军事性的，同时也带有很浓的政治色彩。瓜亚基尔在 1820 年革命后宣布处于圣马丁和玻利瓦尔的保护之下，而基多已被视为哥伦比亚的一部分，苏克雷的任务是就瓜亚基尔并入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问题与圣马丁方面谈判。

当 1821 年 5 月苏克雷率领他的部队到达

瓜亚基尔时，瓜亚基尔省已宣布了独立，并建立了政府。但政府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派主张并入哥伦比亚，一派主张并入秘鲁。瓜亚基尔本身的军事力量薄弱，如果没有秘鲁或哥伦比亚的支持，它就无法生存下去。

这种情况下实力就变成政治天平上最有份量的决定性的砝码。苏克雷深谙此道。表面上不介入瓜亚基尔的政治问题，不动声色地进行增强军事实力的工作。他成功了，哥伦比亚的部队成了瓜亚基尔最大的军事力量，这种不容质疑的军事存在决定了此后瓜亚基尔的政治命运。而圣马丁则由于秘鲁的内部问题无力谋划瓜亚基尔问题。

随着独立斗争形式上的简单化，革命运动从整体上说是越来越复杂了。对立、冲突出现了。

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将在他们的军队取得胜利后相继退出南美洲的历史舞台。

瓜亚基尔的归属问题是南美洲争取解放的斗争中的一个小波澜，它很快就在更大的历史潮流中湮没无闻了。但它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圣马丁、特别是玻利瓦尔关于美洲

和睦统一的理想的破灭。

决定圣马丁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他的不得人心的秘鲁君主政体化计划，这个计划使他背离了秘鲁本国的舆论。圣马丁在秘鲁的最近目标只有两个，即使秘鲁获得独立和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他认为这两个目的可以通过建立自由君主政体来实现，同时解决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理性上说，他认为并且宣布过，共和制是政府最合逻辑的形式，但不是最实用的。这样一来，圣马丁就背离了他的使命，否定了他的事业，脱离了他曾大力推动的美洲革命运动。他没有看到拥有强大力量和巩固根据地的玻利瓦尔已经在哥伦比亚建立了共和国，他忘记了他必须与北方的解放者一起在共和的旗帜下共同完成他们的伟大事业。他没有看到美国支持新大陆的共和制。他没有看到英国和美国一起反对神圣同盟，准备承认南美洲的共和国。

代表当时大陆两个联盟的哥伦比亚解放者和秘鲁护国公之间的瓜亚基尔问题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是南美洲共和国之间出现的第一个边界纠纷问题。另外，它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

和政治意义。

瓜亚基尔宣布独立，秘鲁护国公予以承认，而哥伦比亚解放者予以否认，双方都有自己的打算，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基多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没有瓜亚基尔港就成不了完整的领土，即使从地理的角度来看，玻利瓦尔也有理由坚持拥有瓜亚基尔。这就是为什么秘鲁护国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观望沉默态度，而哥伦比亚解放者采取主动而坦率的态度的原因。

玻利瓦尔不会让步，让步就意味着他创建的共和国将残缺不全。圣马丁明白，他的直接干预会挑起可能导致他和玻利瓦尔的联合破裂的冲突，而这对于维持不稳定的独立，对于他们两人的计划都是一种障碍。

国际关系中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实力对比。圣马丁明白，在基多战役中获胜的哥伦比亚军队比他更容易控制瓜亚基尔。如果他坚持干预，会使天然盟友变为对抗力争。他最好是让步，而不挑起有害于南美洲解放事业的冲突。

地理上哥伦比亚更需要瓜亚基尔港，而拥

有漫长海岸线的秘鲁不需要它。哥伦比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是一部装配得很好的美洲战争机器，因此瓜亚基尔在哥伦比亚手中更合适，瓜亚基尔将使它更有力量，能够更有效地在秘鲁支援南美洲的最终解放。

从各方面考虑，最现实的态度，最有利于美洲独立事业的做法，是圣马丁不再坚持瓜亚基尔独立，放弃把它并入秘鲁的想法，心甘情愿地让它并入哥伦比亚。

在这种令人不安的不祥征兆下，将要开始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之间的会晤，地点恰恰是在使两位解放者之间产生深刻分歧的地方。两人把胜利的旗帜插在一起并有力地拥抱之后彼此的心灵却永远地分开了。

瓜亚基尔会晤，玻利瓦尔抢先了一步……

在华盛顿之后，圣马丁和玻利瓦尔是唯一进入世界英雄名人录的两个美洲人。有人说，要确定美洲这两位英雄的伟大，必须先测量一下亚马孙河和安第斯山。

然而，这两位伟大的美洲英雄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却扑朔迷离、不欢而散。此后，他们中的一位开始悄然退出历史的舞台，另一

位则在不久之后达到了荣誉和权力的巅峰。

玻利瓦尔占领基多以后，秘鲁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边界冲突日益尖锐，解决瓜亚基尔的正式地位问题越来越迫切，此外，美洲大陆的最后解放有待于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联合。为了这一切，他们需要一次会晤。

圣马丁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必须把最后一个西班牙士兵赶出南美大陆。这时他认识到，没有玻利瓦尔的援助他无法打败西班牙军队。阿根廷和智利已经枯竭，并且也是内部问题丛生，无法再支持他完成解放整个南美的伟大计划了。只有取得玻利瓦尔的帮助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他们选择了瓜亚基尔这个地方举行他们的会晤。他们是否想以此暗示要在他们的分歧开始的地方来结束他们的分歧？

但他们最终失败了。他们的这次会晤也最终失败了。只不过这种失败被圣马丁此后不久的引退冲淡了一些。

1822 年 7 月 26 日，圣马丁乘坐“马塞多尼亚号”抵达瓜亚基尔。在此之前，玻利瓦尔已先他到达。这次会晤的目的就是解决瓜亚基尔问

题和签订共同结束战争的军事协议。

随着玻利瓦尔的到来，瓜亚基尔在事实上已成为哥伦比亚的土地，玻利瓦尔见到圣马丁后的欢迎词是："欢迎您来到哥伦比亚的土地。"玻利瓦尔已经把自己当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

现在，这次圣马丁寄予了厚望的会谈还没有开始就已失去了圣马丁原来所想的重大意义。其实，会晤还没有开始可以说就已经结束了。

会谈的主要目的，讨论瓜亚基尔的地位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玻利瓦尔在圣马丁之前站到了瓜亚基尔的土地上。圣马丁无法改变的事实是，玻利瓦尔抢先了一步……

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短暂的会谈中只能就许多美洲问题泛泛地交换看法，这不会产生任何重大的意义。而任何一方都没有表示希望延长会谈的时间。

这次会晤的性质同样扑朔迷离。圣马丁和玻利瓦尔是以私人身份来进行会晤的，他们都无政府的授权，因此他们所商定的一切都不具

备法律效力。他们只是在发挥自身巨大的影响，对圣马丁而言更是如此。

圣马丁自己很清楚，他的实力比不上玻利瓦尔，他缺少强有力的支持。秘鲁已经起来反对他，阿根廷也被内部的派系斗争闹得四分五裂，不能向他提供任何援助。

同沉默寡言的圣马丁相反，玻利瓦尔具有催眠术般的说服能力。圣马丁基本素质只适于作一个军事统帅；而玻利瓦尔既是军人，又是政治家，曾就政治问题有过广泛的论述，并且根据他长期的政治计划，为他所解放的各国起草了宪法。

玻利瓦尔当时年仅 39 岁，正是春秋鼎盛。圣马丁则已 44 岁，由于连年征战，伤病缠身，体衰力竭，甚至他自己也常常感到日暮黄昏的无限凄凉。

就是这样两个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猜测和想象的天地。

这次会晤的经过很简单。唯一产生神秘感的就是玻利瓦尔和圣马丁的两次秘密会谈。但会谈的内容当时虽然只有玻利瓦尔和圣马丁两人知道，而他们又都守口如瓶，对别人只字不

提，可随着此后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时间逐渐廓清了覆盖着这次会谈的层层迷雾，勾画出了它的大致轮廓。

1822 年 7 月 26 日中午，圣马丁抵达瓜亚基尔。玻利瓦尔组织的欢迎仪式是隆重而热烈的，与圣马丁的身份很相称。

圣马丁的船将靠岸时，玻利瓦尔的两名副官已在码头上恭候。上岸后，从码头到圣马丁一行下榻的宾馆沿途有一个营的士兵列队警卫，圣马丁走过时向他们致军礼表示感谢，士兵们则向将军致持枪礼表示由衷的敬意。进了宾馆，玻利瓦尔已身着将军礼服，在参谋人员的簇拥下等候在楼梯脚。两位英雄互相走近，有力地拥抱在一起。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南美洲的两位伟大人物携手走上楼梯，进入一间事先布置好的大会客室。其他人都离开以后，他们把门关上，开始了第一次秘密会谈。大约一个半小时以后，门开了。玻利瓦尔走了出来，脸上表情沉重而难以捉摸。圣马丁随后出现了，表情同样复杂难解。他陪玻利瓦尔走到楼下，两人友好地告

别了。

晚餐之前，圣马丁在随行人员陪同下回访了玻利瓦尔。只半个小时后他们就离开了。这是纯粹礼节性的回访。

第二天，圣马丁命令把他的行装准备好，宣布在当晚的舞会之后即刻启程返航。下午1时，圣马丁一行又来到玻利瓦尔的官邸，两位领导人又开始了他们的单独会谈。这次密谈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玻利瓦尔和圣马丁在会谈结束后立即出席了一个盛大宴会。当他们两人同时出现在宴会大厅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玻利瓦尔神彩飞扬，圣马丁表情凝重。

解放者首先祝酒："为南美洲的两位伟大的人物：圣马丁将军和我，干杯！"圣马丁随后祝酒，滞缓沉重，"为早日结束战争；为本大陆各个共和国的建立；为解放者的健康，干杯！"

晚7时，盛大舞会开始。九时，两位南美洲最伟大的人物又同时出现。玻利瓦尔旋即投入了欢快的华尔兹中，圣马丁则心事重重地冷眼旁观。次日凌晨1时，圣马丁悄悄离开大厅，与玻利瓦尔永远地分别了。

瓜亚基尔：圣马丁的“滑铁卢”

秘鲁护国公上任时曾说过，要让秘鲁人民自己选择认为合适的政府形式。但又是圣马丁自己提出了使秘鲁君主政体化的思想。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出，是圣马丁的君主立宪思想毁了他自己。

当时，秘鲁的爱国舆论坚决主张共和；秘鲁的前途、甚而整个美洲的前途等等都将由与西班牙的尚未结束的战争来决定，而秘鲁一半的国土尚在西班牙人手中；圣马丁许诺的全国议会还没有召开，他所颁布的临时法规又规定，只有全国议会有权制定永久宪法和确定国家政府的形式。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圣马丁擅自决定秘鲁将是一个君主政体的国家。

在任职将满五个月的时候，圣马丁召开了国务会议。会议决定派代表团去欧洲，谈判与英国结盟和争取英国的保护，接受英国皇室的一位王子来担任秘鲁君主国的加冕国王，条件是接受秘鲁国民代表将要制定的宪法。如英国政府不同意，可向俄国沙皇提出同一建议。还

可以接受法国或葡萄牙的王子。如果这些都不能实现，最后可以请阿根廷以前的一位王子卢卡。

这时海军司令考克拉内率领智利舰队撤回了国内。舆论纷纷支持海军司令的行动。圣马丁想用以创造奇迹的计划，遭到了他最忠实的朋友奥希金斯的非议，他失去了他最好的同盟者的支持与合作。他身边忠实追随者的圈子越来越小。

加西亚·德·里奥本来是君主制的积极拥护者，圣马丁命他率代表团去欧洲寻求支持。但在这次欧洲之旅的第一站智利他们就遇到了障碍。他感到圣马丁大势已去，不久将会在南美洲解放的大舞台上消失。基于这些想法，他建议圣马丁体面地引退，免得以后被迫辞职。惨淡经营的计划遭到最可靠最知己的朋友拒绝，这使圣马丁受到极大震动。考克拉内的不辞而别使他失去了海军这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身体每况愈下，心情日益沮丧。这些因素促使圣马丁后来引退。但这还不是他自动退出南美解放这个大舞台的根本原因。

瓜亚基尔会晤后，1822 年 7 月 29 日玻利

瓦尔给哥伦比亚共和国副总统桑坦德的一封私人信件透露了会谈的一些情况。

玻利瓦尔在信中说：圣马丁将促使秘鲁和哥伦比亚的边界问题得到解决，并表示自己将不干预瓜亚基尔的事务。

玻利瓦尔认为圣马丁无意当国王，但也不想实行民主，而是希望有一位欧洲的亲王来治理秘鲁。

圣马丁对玻利瓦尔说他要退隐到门多萨去，他没有带来什么计划，他也没有向哥伦比亚提出任何要求。

玻利瓦尔在这封信中还提到了他在瓜亚基尔会晤中所取得的几个重要成就：第一是南方的解放；第二是瓜亚基尔、基多和其它各省都并入到哥伦比亚了；第三是圣马丁和秘鲁对哥伦比亚的友谊；第四是摆脱了秘鲁和哥伦比亚联军这件麻烦事。

在圣马丁与玻利瓦尔会晤期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坚定了圣马丁已经做出的永远脱离社会生活的决定。

利马人民暴动了，反对护国政府。虽然暴动没有直接指向圣马丁本人，但暴露出他的政

权和军权的基础已遭到破坏。

1822年7月25日，利马人民集会，要求政府总理蒙特亚古多下台。蒙特亚古多是替罪羊。人们不敢正面攻击护国公，于是就寻找一个牺牲品来代替他。

局势进一步动荡起来。政府实际上不存在了，利马市政府成了自治机构，这无名的革命控制了整个城市。这次运动复杂而混乱，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确定的计划、但有其发生的道理。反对外人执政的民族感情，反对政府的君主政体计划的共和情绪，反对护国政权的无声抵抗，这些都赋予这次运动深刻的政治意义。

29日，市政府要求护国政府把蒙特亚古多驱逐出境，以便平息可能引起更大混乱的市民们的骚动。政府满足了这一要求。军队批准了这个决定。

圣马丁从瓜亚基尔返回利马时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形势。他清楚地看到人们已厌烦了他的统治；军队不再对他忠心耿耿、俯首贴耳；他本人已经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而可能是尽快结束独立战争的障碍。在这种情形下，他的

引退就是为美洲事业作出的贡献。于是，圣马丁决定自动引退。

为掩饰引退的真正原因，圣马丁写信给奥希金斯，以健康为由说明他引退的原因："你会责备我没有完成我所开创的事业。你很有道理；但我更有道理。我厌烦人们叫我独裁，说我想作国王、皇帝甚至魔王。另外，我的身体很不好；这个国家的气候会把我拖进坟墓。总之，我牺牲了我的青年时代为西班牙人服务，牺牲了我的中年时代为祖国服务。我认为我有权力支配我的晚年。这将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

而在8月29日给玻利瓦尔的一封信中，圣马丁却如是说："……，总之，将军，我已下定决心。下月20日，我将召开秘鲁第一届议会会议，议会成立的第二天我就启程到智利去。我相信我在这个地方是妨碍你率领你的军队到秘鲁来的唯一障碍。……"

1822年9月20日秘鲁第一届议会开幕。圣马丁在会上摘下象征着护国公权威的两色绶带。当晚，圣马丁登上"贝尔格拉诺号"双桅船，永远离开了秘鲁海岸。

夺取最后的胜利：玻利瓦尔在秘鲁

瓜亚基尔会晤刚一结束，关心秘鲁命运的玻利瓦尔立即向秘鲁提出派遣新的哥伦比亚援军的问题。玻利瓦尔希望这次反对西班牙最后一战能把南美洲各国人民象兄弟一样地团结起来。玻利瓦尔在他全部的军事生涯中一直梦想率领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向利马胜利进军，把这看作是美洲所有解放了的国家在美洲心脏的大会师和大团圆。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秘鲁人对于那些打算解放他们的国家的外国人产生了怀疑和反感。这时他们的反感猛烈地转向解放者和刚刚到达秘鲁的哥伦比亚军队。玻利瓦尔提出的愿意给予各种帮助的建议被他们几乎是轻蔑地拒绝了。

秘鲁人希望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独立，因为第一批外国解放者踏上他们的国土后没有给他们留下愉快的记忆。

圣马丁在就任秘鲁护国公后建立了国务委员会，其着眼点不在于被任命人员的行政才

能，而是他们对外的代表性。部长、将军和军队总参谋长、法院院长、主教为当然成员，另外还有印第安人的三位伯爵和一位侯爵。这与其说是个共和机构，不中说是一个等级制的贵族机构，适于为加冕服务，或者是君主政体的一个点缀，是准备在道义上批准专制制度的特别措施，而不遵守在政府形式方面已宣布的政策。圣马丁认为，秘鲁的贵族，虽不是一个社会机构，但有应该利用的影响。在开始远征时，圣马丁以将军的身份发表过一次声明，表示南美洲的政治革命不是为了消灭特权，允许秘鲁贵族继续保留他们的权利。

同时，圣马丁设立了“太阳勋章”。这是对拿破仑的“荣誉军团勋章”的模仿。勋章可以继承到第三代。圣马丁认为这样可以激励人们的斗志，可以使功臣们的业绩永垂不朽。勋章的获得者享有规定的各种特权。同代人谴责这种制度，后来人只是作为痛苦的教训来回忆它。

这些做法表面看来是纯行政性的，但它是一种贵族制度的种子，一种空想的君主政体的种子。就连在生活简朴得如斯巴达人一样的圣马丁本人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恶劣的影响。在政

府大厅中，他的画像代替了原来的费尔南多七世画像。在与公众见面时，他坐在6匹马拉的豪华马车上，卫队前呼后拥，其排场不亚于从前的秘鲁总督。

圣马丁谋求建立君主立宪制，但没有个人野心。他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把秩序和自由融合在一起，克服无政府主义，以便完成独立的大业。

然而，在建立等级制度的同时，他把统治阶层、特别是军官的薪金也提得很高，这在当时就受到了舆论的谴责。这一切都表明了腐朽的开始。

从这时起开始有人把加冕称帝的野心贴到圣马丁身上。人们在歌曲和印第安人的民谣中拥戴他作皇帝。军队的主要将领开始反对他，私下里都称他"国王何塞"。瓦解也开始了。

现在，圣马丁离开秘鲁远去了，但马上又要再进来一位哥伦比亚的解放者，秘鲁人能接受吗？

永不休止的动荡使秘鲁人厌烦透了。这种社会环境为潜伏下来的保皇分子提供了最好的

时机，他们可能煽动人民的情绪，力图使人民再沉溺于昔日安于天命的心理。这种心理过去在表面上似乎使秘鲁过了许多年的和平与安逸的生活。

圣马丁辞职后的秘鲁陷入了深深的混乱之中。国库空虚，物价飞涨，人民怨声载道。最后政府不得不发行纸币，但这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贫困和不满。军事上也一败再败。一个由阿根廷人和智利人组成的 4 000 人的部队在阿尔瓦拉多将军的率领下，在托拉塔和莫克华战斗中被西班牙军彻底击败，损失惨重，部队最后还剩 900 人。共和派部队的这次惨败又引起了另一场灾难，长远来看其后果更为严重，那就是军队强迫政府任命何塞·里瓦·阿奎罗为总统。他与议会的矛盾日益尖锐，挑起了内战。

这种内乱，为保皇军的反扑提供了良机。1823 年 7 月，保皇军在坎特拉克将军的率领下杀回利马，把全城洗劫一空。几乎与此同时，共和军圣克鲁斯的部队在上秘鲁又遭惨败，溃不成军。

这时，秘鲁才不得不向玻利瓦尔求援。玻利瓦尔立即下令，整装待发的 6 000 军队在曼

努埃尔·巴尔德斯将军率领下开往秘鲁总督区。此外，玻利瓦尔还派苏克雷将军作为他驻秘鲁的全权公使。但是巴尔德斯和苏克雷在秘鲁遇到的却是混乱不堪的局面，他们俩也无法收拾这一团糟的国家了。

秘鲁总统里瓦·阿圭罗于是派遣第二个代表团去见玻利瓦尔，请他亲自出马指挥战争。秘鲁议会也通过了决议，向解放者表示感谢，又派了第三个代表团来，送来了议会的决议，宣告议会也请玻利瓦尔到秘鲁去主持政务。

但玻利瓦尔身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的总统不能擅自行动。他到秘鲁去指挥作战要得到哥伦比亚共和国议会的批准。他和秘鲁都必须等待。当哥伦比亚议会的批准书终于送到玻利瓦尔手里时，秘鲁政府所派的第四个代表团也到了。不过这次是已经取代里瓦·阿奎罗出来执政的托雷·塔格莱侯爵所派的代表来吁请玻利瓦尔去援助秘鲁。

玻利瓦尔终于在1823年8月7日启程前往秘鲁，9月1日在卡亚俄登岸。

在秘鲁等待着玻利瓦尔的是什么呢？

与议会矛盾重重，最后终于被议会罢免的

前总统里瓦·阿圭罗，手中掌握着 3 000 军队，在秘鲁北部城市特鲁希略与利马的合法政府分庭抗礼。虽然坎特拉克的保皇军将利马洗劫一空后又撤回了山区，利马合法政府这才得以重返首都，但阿圭罗的威胁丝毫不亚于西班牙人。

这时，哥伦比亚共和国南部的高原城市帕斯托又发生了叛乱，把瓜亚基尔和基多与北方遥远的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陆路联系切断了。

阿圭罗在特鲁希略可以随时切断秘鲁与哥伦比亚之间的联系。

秘鲁议会发现阿圭罗与保皇派在秘鲁的最高领导人拉塞尔纳总督联系，遂宣布他为叛国者。9 月 2 日，议会交给玻利瓦尔的第一个军事任命是率军镇压这个被罢免的总统。

玻利瓦尔一向对同族相残十分反感，他说过，凡是同族相残，罪责总是落在战胜者和战败者双方。

命运好像再一次嘲弄了这个无法摆脱困境的人。玻利瓦尔不得不领导一次秘鲁人反对秘鲁人的同室操戈的战争。

玻利瓦尔率军前往特鲁希略。支持阿圭罗的军队司令得知阿圭罗与西班牙人联系后软禁了他，和玻利瓦尔签订了投降书，条件是要保护阿圭罗的生命安全。但里瓦·阿圭罗不愿向玻利瓦尔投降，于是军队司令允许他出走瓜亚基尔，阿圭罗从那里去了欧洲。

平定了阿圭罗的叛乱，玻利瓦尔还是不能进行他所期待的向西班牙人的最后进军。1823年底他描绘了利马的情况：秘鲁分成了两个地区，南部是同西班牙保皇军作战的战场，北部则是内战的战场。在合法政府手中的只有断壁残垣、十室九空的利马。空虚政府没有别的，只有满身的债务。

基多和瓜亚基尔是新近并入哥伦比亚的地方，玻利瓦尔本来担心这里的人把他当作“外国人”看待，现在这两块地方却不得不担负起对战争的主要物资供应和兵员支持。

玻利瓦尔不能指望从秘鲁获得到他想要的一切。秘鲁本身已是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了。再者，这里的人民过去即便是在殖民统治之下，也一直是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的，因此他们把任何负担都看成是苛捐杂税。他们憎恨这

种负担，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外国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负担，目的是养活一批外国军队。

秘鲁的局势日益恶化，各种困难一齐向玻利瓦尔压来。他要求哥伦比亚派遣的 12 000 名军队没有到来。此外，秘鲁似乎也不可能维持一支足以和西班牙人相匹敌的军队，不管是秘鲁自己的也好，借来的军队也好。

玻利瓦尔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的共和派领袖发生摩擦和冲突，他们中间有阿智联军的圣克鲁斯将军、海军中将吉赛以及秘鲁总统托雷·塔格莱本人。如果这时保皇军来进攻，他们肯定可以再度占领利马，而且很可能把那一小批哥伦比亚军队和散漫的联军一扫而光。

现在，玻利瓦尔身为阿根廷、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四方联军的最高统帅，他的显赫和声名甚至超过了圣马丁，但他却比圣马丁更无奈。人们各行其是，这使最坚定的人也感到束手无策。对他来说，战场在整个南美洲，敌人不只是西班牙的保皇军。看得见的敌军实力雄厚，仍然十分强大，而看不见的敌军实际上更可怕。敌意、仇视、民族情绪这些都是玻利瓦尔用刀剑和枪炮征服不了的。他的军队来自不

同的国家，士兵们信念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语言、思虑、准则和利益，玻利瓦尔无力将这些都统一到他自己的伟大事业中来。

他想，大概只有上帝那无所不能的手指才能把这么多不和谐的音符组织到一曲美妙的圣乐中来。

最使玻利瓦尔头疼的是内部的倾轧。智利军队离心离德，一部分部队已退回国内。军队中的将领们都是各怀心腹事。保皇势力的影响还出乎意料地十分强大。形形色色的对独立事业不忠，敌视甚而仇恨的人乘机四处活动。一切都似乎是要毁灭这个国家。当玻利瓦尔向北进军时，南方失陷了；等到他挥师南下时，北部地区又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

玻利瓦认为秘鲁政府应该要求议会制定法律严惩叛乱分子。但他不是秘鲁人，他不能也不敢随心所欲地做他认为正确和必要的事。人们会把他所作的一切看成是哥伦比亚的决定，看成是一个抱有敌意的人的决定。他希望秘鲁政府承当起责任，不要由于他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大家就把仇恨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

绝望之中，解放者求助的目光只好转向哥

伦比亚。他虽身为总统，但他远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他不便命令，只能请求，为了秘鲁的解放事业，也就是为了整个美洲的解放事业，哥伦比亚给他派援兵来。副总统桑坦德在主持哥伦比亚政府的工作，玻利瓦尔在秘鲁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由他来掌握的。一切都取决于玻利瓦尔在人民中的声望能给他换回多少实际的支持和援助了。

十几年来不停的奔波和永无休止的征战耗干了玻利瓦尔旺盛的生命力。在前往特鲁希略平定阿圭罗的叛乱时，他和部队要翻越海拔很高的安第斯山，那里常年刮着高寒缺氧的山区特有的风，“甚至连信纸也要冻成冰块”。而返回利马时他们的行军路线上不再有高山，却要经过北秘鲁荒无人烟的沿海热带沙漠。玻利瓦尔终于病倒了。

他失去了知觉，高烧，呓语，并伴发有间歇性痴呆。但当他刚一清醒过来，他深陷的双眸又迸射出光芒，第一句话就是坚定无比的：“夺取胜利！”

那些日子里，解放者好象已经被这个国家特有的高原缺氧风吹干了。他才刚刚进入不惑

之年，但甚至他自己也感到年迈苍苍，不胜重负了。他头上包着一块白布，肥大的裤子更显他瘦削的膝盖和干瘪的大腿。他的声音空洞而无力，面色如死尸一样灰白。这再也不是过去的玻利瓦尔了。

但就在这时，他胸中正在孕育着另一个决战的计划。他已下令在特鲁希略组织一支强大的骑兵，派人到昆卡、瓜亚基尔和特鲁希略去订制马掌。征用全国的强壮马匹，禁止苜蓿饲料输出。他只待自己体力稍稍恢复，就要亲率大军重返特鲁希略。

胡宁之战：结束战争的曙光

时间已到了1824年。为了赢得宝贵的时间来准备他的结束美洲战争的作战计划，玻利瓦尔走出了一着险棋。孰料，他玩火却烧着了自己。

玻利瓦尔需要时间，需要不受西班牙军队干扰全力准备他的最后之战。他向秘鲁总统托雷·塔格莱提出请求，让他向西班牙提出停火的要求。这当然是玻利瓦尔的一个缓兵之计，

目的是要争取宝贵的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玻利瓦尔全部希望寄托在四至六个月后才能到达的哥伦比亚军队身上。为此，他要让这次停火要求表演得极其逼真。要让保皇军相信，一旦停火，哥伦比亚军队将土崩瓦解，而秘鲁人不得不和西班牙重归于好。

如果西班牙人愿意停战8个月，10个月以至12个月的话，哥伦比亚的队伍将会士气低落不攻自破，因为他们的士兵无饷可领，苦不堪言，到那时，秘鲁政府和人民，除了同西班牙兄弟们握手言和之外，别无选择。

人们普遍地、热烈地要求和平，哪怕是让魔鬼统治他们。

这就是玻利瓦尔用来蒙骗西班牙人的花言巧语。他想险中求胜。

但是，玻利瓦尔却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他一手策划的这场骗局的这样一个结局：托雷·塔格莱总统和他的政部的大部分行政人员假戏真作，干脆投入西班牙人的怀抱。

其后，军队随着发生叛变，卡亚俄港落入保皇军之手。其它部队也发生哗变，甚至一部分炮兵也倒戈投敌。最后，整个投敌部队超过

了 1 000 人。

这就是1824年2月的多事之秋。利马又一次陷落了。

玻利瓦尔撤到特鲁希略。遭此挫折，他仍然没有绝望。

援军迟迟不来。波哥大的政治家们也许同秘鲁人一样，对解放者取得胜利没有信心，也许是因为认为他的远征使哥伦比亚守备空虚，也许是玻利瓦尔与苏克雷日益增长的声誉使桑坦德越来越不舒服，所以他们迟迟不肯再派出更多的援兵。

桑坦德对玻利瓦尔不断的对援助的要求回答得公事公办。他说："我只是哥伦比亚的而不是秘鲁的行政官。法律只授权我如何管理好我自己的共和国，同秘鲁并不相干。虽然哥伦比亚的总统到他的国领土上带兵作战，但我的职权的法律性质并未改变。我已经向南方派遣了一些队伍，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是做过了头。当时我这所以如此，不是因为有什么法律规定我必须这样做，也不是有什么法律规定我必须遵照您的命令行事，也不是有什么法律规定必须有求必应地向秘鲁输送去您所要求的支援。"

当时，国际形势确曾一度紧张起来。欧洲反动的“神圣同盟”在欧洲大陆上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扑灭了许多国家的革命。人们也普遍担心“神圣同盟”要来干涉拉美的独立革命。如果那样的话，哥伦比亚共和国将首当其冲。

但 1823 年美国总统门罗发表了著名的“门罗宣言”，提出了“门罗主义”，警告欧洲大陆的列强，不许它们插手美洲事务。英国也支持美国的立场。因此，外国干涉的危险微乎其微了。

直到 1824 年 5 月初，桑坦德才向哥伦比亚议会提请批准派出部队增援秘鲁。

值得庆幸的是，所有这些挫折与失败都没有消磨掉玻利瓦尔的斗志，反而激励他更努力。他迅速重整旗鼓，准备那即将到来的决战。

自 1824 年 2 月 10 日起，秘鲁国会已授予玻利瓦尔独裁官职务。他于 2 月 13 日任命苏克雷为联军司令。

作为秘鲁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玻利瓦尔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对于部队，他更是无微不至，甚至连骑兵部队使用的马蹄铁的质量都考虑到了。他对骑兵怀有绝对的信心，而骑兵也确实是他在关键时刻制胜的法宝。

这时，玻利瓦尔只控制着秘鲁北部的沿海地带，其它地区和上秘鲁还在保皇军的控制之下。玻利瓦尔就是要从这里的穷乡僻壤出发，打下整个南美洲。

以饱满的热情同时做好各项工作，这正是玻利瓦尔取胜的秘诀。一场场的战斗，是他所指挥的这部宏大的民族解放的交响乐中一个个的华彩乐章。这段时期已迥然不同于过去的1813年至1819年的时期。那时，战争还只是局部的、分散的、以游击形式为主的战争，从未进行过战略决战。1818年以后，战争的性质已完全改变，游击战变成了大规模的阵地战，玻利瓦尔的军事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玻利瓦尔还在苏克雷身上找到了自己性格上最完美的补充。他们在军事上的合作非常完美，玻利瓦尔更能从苏克雷那里得到提醒和忠告。苏克雷是一位良友、诤友，玻利瓦尔事业的一部分是依靠他才实现的。

1824年6月，玻利瓦尔的军事进攻已基本准备就绪，眼前最大的障碍是如何越过挡住他的去路布兰卡山，主动寻找保皇军主力决战。

安第斯山脉在秘鲁以北分为三条支脉进入

秘鲁后在布兰卡山区汇聚起来，自北向南蜿蜒而至的山岭盘结，群峰错落，自此向南又变成两条大的支脉。玻利瓦尔必须翻越的这个山地，海拔平均都在 4 000 米以上，其中必经之路上的雅纳萨利亚斯山口高达 5 000 多米。高山上空气稀薄，令人窒息。人到了这样的高度时高山反应十分强烈，头晕、目眩甚至昏迷，稍作剧烈运动即可能丧命。一场雪崩或暴风雪就可以使整整一营的兵马顷刻间死于非命。

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玻利瓦尔和苏克雷进行了周密的战前准备。他们首先把部队分别在不同的出发地点，待进军开始后再逐渐会合。苏克雷又在各进军路线上设置了兵站和后勤仓库，以保证部队给养，减轻士兵随身装备的重量。

最重要的是要使士兵们具备在这样的高海拔地区进行作战所特别要求的体能素质，这才是取胜的关键。为此，早在 1 月，玻利瓦尔就命令部队每周进行两次全副武装的越野训练，提高士兵们在高原地区的身体素质。此外，每周还要组织一次山地进军的实战演习，翻越崇山峻岭，野外宿营休整，力求使部队达到最高的

作战水平。

进入8月，进军终于开始。各路大军同时并进，互相之间用号角联系。一时间，此起彼伏的号声响彻群峰深谷之间。

8月6日下午，玻利瓦尔亲率一支部队沿胡宁高地上的胡宁湖西岸南下寻找保皇军。恰逢保皇军一支部队在勇将坎特拉史将军率领下也正在沿湖东岸北上寻战玻利瓦尔。双方几乎同时发现了对方。这时玻利瓦尔的部队已远离根据地，并且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迟疑，当即命令部队向东南急进，切断保皇军退路，将其歼灭在湖边。

坎特拉克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玻利瓦尔在这种不利的战场态势下竟然还敢主动向自己进击，大吃一惊。他首先在气势上被解放者震慑住了。眼看退路将被截断，坎特拉克命令部队急速后撤。

但坎特拉克并不是要逃跑。他本人的勇气和胆略并不次于玻利瓦尔，他是保皇军中的一员猛将。从圣马丁率阿智联军远征秘鲁开始，他就转战于秘鲁的群山之间，职务为山地将军，他顽强地支撑着西班牙在秘鲁的战争机

器。共和军的将领们是深谙他的厉害的。

坎特拉克是一位精明的将领，他的后撤是为了占据胡宁高地上的有利地势。他自恃兵力多于玻利瓦尔，装备好，火器多，大炮更是厉害，主动退到了胡宁湖东南一片开阔的草滩上，摆开其战阵。准备用他的大炮和步枪彻底打垮玻利瓦尔。

岂料坎特拉克的如意算盘完全落了空。玻利瓦尔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将军，他根本不想以己之短攻敌之长，与敌展开阵地战。反之，他见敌主动后撤诱己追击上当，便将计就计，不等步兵，自己先率骑兵飞速压向敌军，乘敌后撤之势一举冲入了敌阵。

保皇军不曾料到玻利瓦尔的骑兵转瞬之间便似从天而降，穿着奇形怪状，口中杀声冲天动人心魄的美洲人裹挟着阵阵疾风呼啸而来。他们一边冲锋，嘴里一边发出惨人的怪啸，活像一支从地狱里杀出来的不知道什么叫危险，恐惧为何物的军队。打惯了规规矩矩一板一眼的阵地战的保皇军哪里见过这种没章没法不顾死活的冲锋，立即乱了阵脚。

可怜坎特拉克明白的太迟，对付这样一支

军队，欧洲那种斯斯文文的作战方式是完全无效的。他的大炮、步枪完全排不上用场，刚刚听见几声枪响，敌人便已经到了自己中间，只见到处都是敌人，到处又都是自己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时如果开炮，自己的步兵会和敌人同归于尽。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以肉体对肉体的白刃战！

枪炮这时完全失去了威力。肉搏战与白刃战是玻利瓦尔军队的拿手好戏，保皇军却完全是在以己之短拼人之长。共和军手中的长矛大显神威，那些从委内瑞拉随玻利瓦尔转战到安第斯山的平原长矛手在胡宁高地再一次为他们的军旗增添了新的光辉。

胡宁高地海拔达到了 4 200 米，在这里进行这样的战斗等于向魔鬼挑战。玻利瓦尔潜水训练部队的高原作战能力的成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完全显现出来了。

战斗很快结束了，坎特拉克不愧为一位真正的战将，遭此重击，他还是尽力将主力撤出了战场。虽如此，他还是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胡宁之战的胜利，使玻利瓦尔打开了进入

利马的门户。对秘鲁人民和保皇派来说，这次胜利的政治意义都远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

胡宁之战之后，保皇军还没有完全被消灭，但玻利瓦尔和他的军队、他的人民已经在精神上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阿亚库乔：美梦成真

胡宁之战，只是结束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统治的最后一战的开始。保皇军的主力仍然隐匿在群山之中，只要他们还存在，伟大的独立战争就不能结束。

但此时南美洲争取自由和独立的事业的最后胜利已不可逆转，最后消灭西班牙军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玻利瓦尔厉兵秣马，准备亲自完成这光荣的最后一战。

不料风云突变。玻利瓦尔最后的辉煌与他失之交臂。

从波哥大传来了哥伦比亚共和国的命令。议会决定收回玻利瓦尔指挥哥伦比亚远征军作战的权利，要他离开军事指挥岗位，因为他是

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议会担心他在战斗中牺牲，会导致共和国的生存危机。

玻利瓦尔很想再次违抗议会的这类命令，但他现在负有更重大的职责，因此他还是尊重哥伦比亚共和国政府的决定，把军队指挥权交给了年轻的苏克雷将军。

那些随同玻利瓦尔奔波转战、从赤道以北一直打到赤道以南的战功卓著的宿将们对受制于这样一位年仅29岁的总司令耿耿于怀。一位老将干脆以抗议的口吻喊道："我只愿为解放者献出生命！"

玻利瓦尔立即回答："那么，我现在就命名安东尼奥·苏克雷为解放者。你刚才已经对我宣誓说要追随解放者。"

苏克雷在以后的4个月中，不断地在群山峡谷中调动军队，寻找保皇军主力决战。玻利瓦尔则坐阵利马，保证对苏克雷的供给，免除他的后顾之忧。1824年12月9日，苏克雷终于率军在秘鲁南部群山中的阿亚库乔高地抓住了敌军主力。双方都投入了全部兵力进行决死一搏。苏克雷最后大获全胜。

阿亚库乔一战，西班牙在南美的军事力量

彻底崩溃，保皇军主力终于全军覆没了。此一役，苏克雷俘敌 2 000 多人，其中包括拉塞尔纳总督和坎特拉克两位上将，以及以下大部分军官；敌军阵亡 1 800 人，负伤 700 人；所有辎重物资，悉数被共和军缴获。此后，整个南美大陆上只有两处西班牙军尚未最后放下武器。一处是卡亚俄港，直至 1826 年才最后向围城的共和军投降；一处在上秘鲁，是小股流散部队，不久即在苏克雷向上秘鲁的进军中被一举剿灭。无论如何，这两股小小逆流当时就根本无法改变西班牙殖民统治彻底覆亡这一事实了。

阿亚库乔胜利的消息传到利马，玻利瓦尔闻之欣喜若狂。美梦终于成真，300 多年以来西班牙的统治从此彻底结束了！

1824 年 12 月 30 日，苏克雷从秘鲁的古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向玻利瓦尔报告。苏克雷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正好在 1824 年之内，秘鲁已肃清了所有外来之敌。玻利瓦尔向各国人民许下的要在这一年内结束战争的诺言，终于实现。苏克雷向玻利瓦尔献上了一份厚礼——300 年前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时带到首都库斯科来的一面军旗。现在它只是一堆破布，但它

的价值在于它是征服秘鲁的象征。

1824 年 2 月，正是秘鲁灾难最为深重之时。几乎所有的领土都在西班牙军的占领之下；国库空虚，物价飞涨；最精锐的部队已被歼灭；人民心灰意冷，政府分崩离析；玻利瓦尔本人又身罹重病。

可谁又能想到，不到一年的时间，经过两次辉煌的胜利，共和军已经夺取了当初美洲的征服者皮萨罗的军旗！

现在，秘鲁获得了解放，这不仅由于收复了自己广阔的国土，而且还由于社会各个阶级又都重新焕发出爱国精神、民族热情与民族自信。

玻利瓦尔又一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美洲英雄。秘鲁国会请求他再行使一年最高权力，主动提出要奖励给他本人和军队各一笔巨款，授予他终身总统的荣誉和“秘鲁之国父与救星”的称号，还把特鲁希略城命名为玻利瓦尔城。授予苏克雷阿亚库乔大元帅的称号。玻利瓦尔在一定程度上把美洲解放事业的最高荣誉让给了苏克雷，他在一项公告中说这位统帅获得了“新大陆的武装力量历次胜利中最为光荣的一

次”。

玻利瓦尔拒绝接受秘鲁给他的巨款。但在秘鲁所给予他的一切荣誉之中，最使他感动的是这个国家赠给他的一枚奖章。上面镌刻着“献给我国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解放者，这个早在11年前加拉加斯人就向他奉献过的称号，现在扩大了范围，一直伸展到了智利的边境。玻利瓦尔无比激动，十分珍视这个称号，因为它是责任和信赖的标志，比王冠还要高贵。

利马变成了玻利瓦尔的天堂。到处是鲜花、赞誉和欢呼的人群。但玻利瓦尔并没有沉溺于荣耀之中。1825年4月，他即动身亲往秘鲁南方各省作巡视旅行。他希望借此机会亲眼看一看这些地方的实际情况，并到那里去进一步开展从他刚到秘鲁就开始进行的整顿政府的工作。

玻利瓦尔当时认为，这个国家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社会各个阶级间存在着的极其悬殊的财富和地位的差别。从1815年他发出了牙买加书信以来，他一直强调，这种阶级差别对于重建秘鲁共和国是一个严重的不和谐因素，

更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绊脚石。现在，他亲身经历，所见所闻，证明实际情况比他原先估计的更为严重。

早在1824年3月8日，玻利瓦尔就在特鲁希略颁布了要在土著人民中间平分土地、废除酋长统治的命令。1825年7月4日，他又充实了有关措施，宣布永远免除印第安人的一切强制性劳役。对这些土著人来说，生活无异于在地狱中受苦受难。甚至连宗教的安慰也是要拿黄金来换取的。解放者凭他的威望，现在要来解放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他颁布法令，禁止一切未经双方事先自愿签订合同就强迫印第安人从事任何劳役，违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过去完全由印第安人承担的公共工程的建设，现在应由其他公民平等地与之分担。

玻利瓦尔每天都在殚精竭虑地致力于秘鲁全体人民的公共教育，就象他在哥伦比亚所做的一样。他在特鲁希略城创建了一所大学。他还向政府建议选派十名青年到英国去学习欧洲的语言、公法、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交往中的专门知识。命令在各省省会建立一所师范学校。玻利瓦尔特别重视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因为这对那些从来没有机会获得知识和生存技能的人们来说更为现实也更为重要。

两位英雄，一个国家

阿亚库乔战役后，苏克雷乘胜挥戈上秘鲁。那里的保皇军残部群龙无首，新败之师无可言勇，苏克雷挟阿亚乔的余威，如秋风扫落叶般荡平了上秘鲁。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恰恰是玻利瓦尔和苏克雷两人在上秘鲁陷入困境的开始。

上秘鲁在军事上被解放了，但它在政治上应如何存在呢？

追溯既往，上秘鲁的政治地位和归属就十分微妙。自被西班牙人征服以来，很长一个时期，上秘鲁曾隶属利马的秘鲁总督区管辖。但自 1778 年起，上秘鲁就划归拉普拉塔总督府的统治下。这样秘鲁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对这个地区的行政管辖权都可以提出同样合情合理而又同样成问题的要求。苏克雷不赞成在这么一大片土地上实行单纯的军事统治。假如干脆成立一个军政府来管理上秘鲁。那倒是省去

了一切麻烦，但那绝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府，也决不是当地人民所期望的胜利果实。

苏克雷本着这种精神，决定召开一次上秘鲁诸省代表会议，目的是要为这个地区组成一个临时政府机构。他还郑重宣布，他的军队到上秘鲁来的唯一的任务是把上秘鲁诸省从西班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并把权力交还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各省人民的内部事务共和军无权干预。1825 年 2 月 9 日，苏克雷特为此发布了一个法令。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一贯亲密合作的玻利瓦尔和苏克雷却产生了分歧。玻利瓦尔不同意苏克雷关于上秘鲁政治命运的安排。他的理由不无道理，召开代表会议本身就是一件上秘鲁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行为，而这样做势必会引起利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两个政府的不满以至纠纷。

玻利瓦尔和苏克雷这两位在战场上于刀光剑影中所向披靡的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如果把上秘鲁依照 1778 年后的隶属关系划归阿根廷所有，将产生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难

题；这样无异于公开站在与秘鲁利益截然对立的立场上；另外一些原属拉普拉塔总督区的省份已宣布自治，并成立了自己的代议机构，有此先例，上秘鲁亦应照此办理；上秘鲁诸省坚决反对和阿根廷联合。

如果把上秘鲁划归秘鲁，玻利瓦尔和苏克雷对上秘鲁的远征就带上了露骨的征服性质。更重要的是，这将破坏以至根本推翻占有地保有原则这个唯一尚能维持南美洲各国人民间的和平的领土纠纷准则。

在这个棘手问题上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在等着玻利瓦尔。

好消息，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已经向苏克雷明确表示，阿根廷政府完全尊重上秘鲁省对其政治前途的选择，一切问题由其自己解决。

坏消息，秘鲁却不象阿根廷那样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它甚至要求，如果真的把上秘鲁诸省从它的版图上划分出去，那么这个地区新成立的政府应向秘鲁偿付为解放这几省所付出的代价。

总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找出一个皆大欢喜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后，玻利瓦

尔终究不得不接受了苏克雷的意见。5月16日，他在秘鲁南部城市阿雷基帕颁布一项命令，批准苏克雷2月9日作出的关于召开上秘鲁代表会议的决定。

玻利瓦尔深感处境微妙尴尬，以致他一时都不想赶往上秘鲁，免得卷进该地区代表们正在进行的争议中。他还向苏克雷提议，代表会议的会址所在地，不应再驻有共和军部队，军队必须撤至20公里以外的地方。任何军人都不应在该地活动，该地一切事宜均应由一名地方民政官员负责管理。苏克雷本人最好也远离该地。

1825年7月10日，上秘鲁诸省代表会议在丘基萨卡开幕。宣布胡宁战役的纪念日8月6日为上秘鲁独立日，并决定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命名为玻利瓦尔共和国，不久即改为玻利维亚。其首都，则用它的另外一位解放者的名字命名为苏克雷。

玻利瓦尔和苏克雷，美洲历史上两位杰出的英雄，就这样永远地与一个新生的国家结合在一起了。

代表会议特地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拜谒了

当时尚在秘鲁内的玻利瓦尔，解放者至此才决定前往这个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国家作一次访问。时人称颂玻利瓦尔，亲手缔造了三个共和国；一切前人之业绩都无法和他的贡献相媲美。后人若想与他一争高下，则必先找到另一个尚未获得解放之世界。为其所诞生的三个共和国，将以它们的光荣永远纪念玻利瓦尔的千秋业绩。

玻利瓦尔的这次访问，实为一次凯旋旅行。所到之处，人们或朴实、或隆重但同等真诚地向玻利维亚的国父表达他们的景仰之情。

玻利维亚的代表们请玻利瓦尔为他们新生的共和国起草宪法。1826年年初，解放者决定返回秘鲁。2月，他启程前往利马。5月，他就将宪法草案及用演讲形式发表的对这一草案的说明寄给了玻利维亚的代表们。

解放者拟就的这份宪法草案中，设立了终身总统一职，作为国家的最高代表以及均衡各种权力的核心。他认为，对于没有等级的国家制度来说，比别的特定的政治制度更加需要这样一个核心。

玻利瓦尔所设想的，国家权力的真正含义

并不是体现在这样一个终身总统身上。他并不施加什么影响；他既不任命什么行政或司法的官员，更谈不到指定什么教会中即使是职位很低的神职人员。作为国家元首终身总统的权力受到种种制衡，而全体人民则由社会上行使各项最重要的职能的人分别管理，教士们管人的心灵，法官们掌管生命财产与名誉问题，行政官吏则统管一切社会活动。他们的地位、荣誉和财富完全来自人民，总统不能指望把他们当作自己野心膨胀的工具。

玻利瓦尔将立宪制度的中心放在了那些实际上管理社会生活的立法机构和应当充当公民权利的真正保卫者的司法机构上面。

首先，由公民们直接提名产生的各省的选举团。代表人民的要求和利益，对行政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起诉；有权提出诸如法官、省长、市长、教区牧师或者代理牧师等几乎一切公职的候选人。

其次，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的三个机关。每四年选举一次的评议院，任期八年的参议院和成员任职终身的监察院。

至此，玻利瓦尔在这个以他的姓氏命名的

国家的政治出生证上打下了他自己的深深印记。

玻利维亚，玻利瓦尔荣誉和事业的顶峰。但与此同时，也是他衰落的开始。

“你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的事情你做不到”

当阿亚库乔战役结束的枪声宣告西班牙在美洲统治也就此结束时，这片大陆的南方的解放者圣马丁在哪里？美洲解放的荣誉里是不是也应该有他的一半？

1822 年 9 月 20 日晚，圣马丁在安孔登上“贝尔格拉诺号”双桅船，永远地离开了秘鲁海岸。他在公开声明中说：“现在，我已不再是个从事社会活动的人，……我对我为之奋斗的各国许下的诺言，已经付诸实现。”

圣马丁先到了智利。这时他发现他的名字在这里象一个刽子手的一样受到人们的诅咒。奥希金斯的政府也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从那里圣马丁也得不到一点安慰和帮助。

卸任的秘鲁护国公在智利感到心力交瘁，

剧烈的咯血使他卧床不起，一病就是两个月。秘鲁政府得知他贫病交加，寄给他 2 000 比索，作为他的薪金。用这点儿钱再加上另外筹措的一些钱，圣马丁才勉强于 1823 年初回到了祖国的土地，阿根廷共和国的门多萨市。他在那里像一个普通农民样的过着贫苦的日子。

不久，在门多萨，圣马丁得到了奥希金斯被推翻、流亡秘鲁的消息，紧接着又获悉他的妻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

阿根廷已不再有它昔日的英雄的容身之地。圣马丁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朋友们的资助下，安葬了他亲爱的妻子雷梅迪奥斯·埃斯卡拉达·圣马丁。然后，他手携唯一的亲人，年轻的女儿，流亡欧洲。

圣马丁先到布鲁塞尔，后在巴黎郊外的一座农庄中度过余生。他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教育他唯一的女儿，直到她立业成家。

在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年中，圣马丁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谈到他希望有一天能重返美洲。特别当 1824 年玻利瓦尔的军队最后战胜西班牙，圣马丁在巴黎得知这一消后，他的愿望更为强烈。但是，终于获得解放的南美各共和国

并没有建立起圣马丁所设想的有秩序的政府。1830年，玻利瓦尔被推翻，在流亡的路上死去。两年后，奥希金斯也在秘鲁避难中去世。从此以后，圣马丁彻底沉默了，再也没有提起归乡的心愿。……

自1826年起，一股反对玻利瓦尔的暗流已在表面的寂静中汹汹涌动。

新获得独立的各共和国中民族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切都开始转而反对玻利瓦尔。人们喃喃地报怨他正在变成一个独裁者。现在他们的国家已经取得解放，人民要组织自己的政府。而不是那种别人替他们设计好了的政府。

1826年6月22日，玻利瓦尔苦心孤诣所倡导的象征着拉丁美洲新的共和世界的团结合作的巴拿马大会历尽波折终于召开，但只有墨西哥、中美联合省、哥伦亚和秘鲁4国参加。

在哥伦比亚共和国国内，副总统桑坦德多年来在玻利瓦尔东剿西讨、南征北战的时候代行总统的职权，早已不甘于继续生活在玻利瓦尔巨大的阴影中。现在他要走到台前来。派斯和桑坦德长期不和，终于酿成一场政治危机。派斯要带领委内瑞拉退出哥伦比亚联邦。

在秘鲁的玻利瓦尔宣布他将返回哥伦比亚以恢复秩序，但秘鲁人民又在警告他，如果他离开秘鲁，秘鲁政府就会土崩瓦解。

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终于说服派斯继续留在共和国内。但当他回到波哥大时，秘鲁的凶讯传来。正如人们警告过他的那样，秘鲁政府被推翻了。

玻利瓦尔尚未从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又获悉玻利维亚也发生变乱，苏克雷已辞去终身总统职务引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玻利瓦尔长年转战在外，哥伦比亚的人民已将自己的信任、尊重和爱戴转而献给了每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桑坦德。他们不愿意再接受玻利瓦尔给他们制定的新宪法。玻利瓦尔却没有及时体会清民意，当立宪会议无法通过他的新宪法时，他运用铁腕，解散了政府，自任独裁官，掌握国家全部权力。

铁腕也已经不能力挽狂澜。1828年9月25日午夜，一队叛乱者杀进总统府，要用暴力结束玻利瓦尔的统治和他的生命。卧病在床的玻利瓦尔勉力支撑，在谋杀者找到他之前从卧室

的窗户上翻出，逃到一座小桥下隐藏起来。直到忠于玻利瓦尔的部队赶来，才平息了这场暴乱。

这是一次阴谋，欲致玻利瓦尔于死地的策划者之一就是桑坦德。当玻利瓦尔看到参与这次阴谋的人员名单时，不知他作何感想，但是，他并没有处死桑坦德，而只是把他流放了。

此时，秘鲁和哥伦比亚之间的边界纠纷愈益白热化。终于，秘鲁向有争议的瓜亚基尔发动了进攻。1829 年 2 月 1 日，秘鲁军队攻占了瓜亚基尔。玻利瓦尔只得又一次率军南征，可是，他的健康已不胜指挥作战的重任。幸而这时苏克雷已从玻利维亚返回了哥伦比亚，玻利瓦尔于是任命苏克雷负责在南方几省的军事指挥。苏克雷不负众望，取得了胜利。

玻利瓦尔返回波哥大。虽然是凯旋归来，但人民对他的出现反应十分冷淡。南美人民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战乱之后，现在渴望和平，而对他们来说，玻利瓦尔已成为永无休止的战争的象征。

玻利瓦尔终于觉察到这一切。为了哥伦比亚，他在 1830 年 1 月 2 日召开的国会上辞职，

4 月 27 日得到批准。

圣马丁和玻利瓦尔的政治生命就是这样结束的。不同程度地，他们两人都没能实现自己最崇高的理想。

但是，当我们回忆起这两位南美洲最伟大的英雄时，永远也不应忘记歌德的这句话：“你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的事情你做不到。”

第五章　尾　声

在本书中出现和没有出现的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著名领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

玻利瓦尔辞职后仍不能平静地生活。哥伦比亚共和国担心他在南美洲的存在本身就会使这片土地永无宁日。解放者被迫也要流亡欧洲。1830 年 5 月 8 日，他离开波哥大，前往卡塔赫纳。准备前往欧洲。在那里他一直呆到 12 月 1 日。此间，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2 月 1 日，他乘船到达圣玛尔塔，经医生诊断，他已病入膏肓。

1830 年 12 月 17 日中午，玻利瓦尔在圣玛尔塔郊外的一座庄园中孤寂地去世，年 47 岁。

1830 年 6 月 4 日，苏克雷在哥伦比亚南部

城市帕斯托附近被部下杀害，年35岁。

1832年，奥希金斯在流亡秘鲁中去世。年54岁。

1850年8月17日下午3时，圣马丁在女儿的身旁与世长辞，年72岁。圣马丁至死都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而是客死于巴黎郊外的住所中。

而南美解放运动的伟大先驱米兰达，则早在1816年7月14日就在西班牙加的斯监狱的地牢中去世，年66岁。

南美独立战争胜利结束了，但那里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却没有完结。新生的共和国还要在风雨飘摇中努力奋斗，求得生存。

民族主义随着独立战争的胜利迅速兴起，各民族主权国家相继形成。

玻利瓦尔逝世后，哥伦比亚联邦共和国分裂成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三个分别独立的国家。

何塞·派斯成为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他在平原人部队的支持下，掌握委内瑞拉政权33年之久。

弗朗西斯科·桑坦德流亡归来，就任哥伦

比亚共和国总统。

原为瓜亚基尔辖区的南方几省独立为厄瓜多尔共和国，原为玻利瓦尔部下的胡安·弗洛雷斯就任总统。

原为拉普拉塔总督区的属地的巴拉圭和乌拉圭分别于1814年和1825年独立。

过去曾为危地马拉都督区的各国建立了自己的联邦——“中美联合省”。1814年解体，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分别成为独立国家。巴拿马继续作为哥伦比亚的一部分，直到1903年宣告独立。

所有这些新共和国内对立派别之间的斗争比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危害更甚，频繁的军事政变和政权更迭所引起的混乱严重阻碍了这些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20年争取自由的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战争使大多数拉美共和国土地荒芜、民不聊生。西班牙300多年的殖民统治的恶果流毒甚远，一时难以肃清。政治和经济的困难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领导。许多新生共和国的领导走上了独裁统治的道路。

大多数国家的首任总统都是军人。军权和

政权的结合成为拉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大特色。

五百年弹指一挥间。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今日的拉美，机遇与挑战并存。

政治上，虽屡有反复，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已摆脱了军人独裁统治，建立了民选文官政府。拉美的民主化进程已是不可逆转的，并且正在跨越一个历史的里程碑。

经济上，大多数国家正在努力摆脱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地型经济结构的束缚，改变单纯依赖某一种农产品或原材料出口而生存的国民经济，大力发展本国民族工业，成效显著。

国际合作更是生机勃勃。“美洲国家组织”在协调美洲国家间关系、谋求共同发展方面成绩斐然；区域经济合作更是欣欣向荣。

100 多年以前，玻利瓦尔和圣马丁所领导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揭开了拉美历史上的新篇章。

19 世纪由拉美独立革命的枪声来宣告这将是革命的 100 年。

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今天，在由玻利瓦尔和圣马丁所开创的这片共和的广袤大陆上，拉美人民将用自己的双脚跨入下一个新世纪。